

集 卷 之 三 第 七 號



第 三 十 九 卷 第 七 號

三十二年

商務印書館

出版新書

五月份

法國崩潰日記 張君勳譯 定價國幣一元陸角	中國糧食地理 吳傳鈞著 定價國幣二元	伊斯蘭日本之回教政策 文化叢書 楊敬之著 定價國幣八角	教育概論 范任子著 定價國幣三元五角	曾南豐先生年譜 王煥鑑著 定價國幣一元八角	中蘇文化協會叢書 普式庚論集 李巖 鄭錄芷譯 定價國幣三元	機關管理一得 黃炎培著 定價國幣一元	巴夫洛夫紀念集 徐治等撰 定價國幣一元七角	機械化戰爭論 英國佛勒者 李志純譯 定價國幣二元七角	太平洋開戰後第一 年內世界大事日記 徐 斐編 定價國幣一元六角	文史叢書 中國農佃問題 章柏雨 汪蔭元著 定價國幣二元	蜀道散記 梁乙真著 定價國幣一元二角
本書原著者爲阿赫斯脫朗氏。阿氏直至巴黎陷落爲止，常有人供給以法國情報，故所記較之其他法國作家所寫更爲可信，而能動人，國人讀此日記，可知法國所以大敗於德之故。	著者根據地理之立場，就我國主要糧食作物之生長環境，分佈，生產，運輸，銷售以及與民生之關係等，作多方面之綜合研究，理論與事實並重，關心我國戰時糧食問題者，不可不讀。	作者二十年來專門研究回教問題，前曾親赴敵後視察，本其實際觀察所獲資料，著爲此編，爲同盟國及方面研究回教問題之重要作品。	本書分爲理論及實際兩部。理論部，乃討論教育與其他科學之關係，並說明教育之內容。實際部，則述及教育機關，教育行政制度，教材與課程，教育的方法與教育之考核以及關於教育的經費與人事等，可作爲師範專科學校及師範學院之參考書。	曾南豐先生之文爲世所重，布帛菽粟者垂七百載，本譜周詳縝密，足爲知其人論其世者之藉。	普式庚創造了俄國的文學語言，亦爲現代俄國文學的創立者。本書刊載評述普式庚之作十五篇，讀者可由此獲知普式庚之生平及其在俄國文學史上之偉大價值。	黃任之先生以其修學及服務所得之可貴經驗，詳述治人治事以及處理物品，錢，地與時的方法，無論機關管理者，或被管理者皆應一讀。	蘇聯巴夫洛夫教授於神經生理學上開闢新徑，研究替代反射垂四十年，世稱蘇聯巴夫洛夫教授於神經生理學及中華自然科學社，其紀念巴夫洛夫教授逝世之文章十五篇編成，教授之生平及其偉大成就，可於本書窺見一斑。	英國兵學家佛勒所著 On Future Warfare 一書，爲歐戰後兵學界劃時代名著之一，專論陸軍機械化之理論，方今我國國軍機械化運動正在創始，本書之譯，可資參考。	本書所記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開始，迄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所有關於國際政治之發展，或戰事得失之關鍵，皆可一檢得之。	研究農佃問題的目的，在考察佃租問題的現象，分析其原因，估量其經濟的和社會的意義，改善佃農的經濟關係及建議足以改進佃農的立法事實依據。本書對於上述各點，皆有簡明扼要的說明。	著者於三個月內，長途跋涉，以其旅途中所見所聞：情景、幽澗、古寺、廟碑、漁歌、機唱、民情、物俗等，以及一切可驚可愕，可歌可泣之故事，連篇成日記十六篇，風趣盎然。

以上各書均照定價十倍發售 印刷地點另加運費

東方雜誌

第三十九卷 第七號
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十五日發行

與雲五先生商榷戰後國際和平問題……張君勸（一）

我國戰後財政政策和金融措施的商榷……

論戰後歐洲的重建……陳鍾浩（五）

……楊湘年（三五）

進攻歐洲的前奏——地中海之戰……吳澤炎（一〇）

為職業學校青年呼籲……黃覺民（四〇）

北非勝利的重要……張印堂（一三）

六月星座神話……陳遵嫻（四一）

由突尼西亞看德國崩潰……龔德柏（一五）

雲南民族之溯源及發展……范義田（四三）

三論中國人的組織力……范任（一七）

論意境……許君遠（五三）

古代政治上的揖讓與和平……成惕軒（二一）

論中國戲劇批評……田禽（五六）

如何實施憑券購物制……龍大均（二五）

關於劇本「安娜·卡列尼娜」……陳北鷗（五八）

限價政策之檢討……姜鵬翊（二八）

與雲五先生商榷戰後國際和平問題

張君勳

雲五先生：讀大著「戰後國際和平」之文，上溯國際組織思想之原始，下舉第二次戰後英美兩方所擬之具體計劃，最後嚴以尊見四項組織方法，曰國際武力，曰殖民地，曰經濟與教育。此與亮偉臨先雲鯁生諸先生所發表之戰後世界改造之文章，均為關於此項問題之重要文獻也。竊以為吾國二千餘年思想史中最顯著者，無過於大同思想之流傳，上自漢儒禮運墨子非攻，下及於近人之作，如康南海之大同書，如胡石青之人類主義，皆有意於超越現代列國對峙之局，而進大同之治，或曰世界政府。然上次大戰之後，有所謂國際聯盟，此國際聯盟之機關二：曰行政院，曰大會，一切決議，除盟約中別有規定外，須得一切會員之同意，此即尊重各國主權之意，不欲輕以決議強令各國遵行。一切決議，既須得各會員之同意，則國際聯盟即等於國際會議，而與超國家之世界政府迥乎不同。尊意以為全體同意制應取消，不妨採用多數決議制，或以四分之三為法定額云云，他日各國誠討論及於公所主張之各國軍用機及巨型軍艦潛艇移歸國際組織之日，苟僅由弱國之多數或四分之三之法定額而獲通過，而關係國之擁有海空軍如英美者，竟不得其同意，則此種議案即令通過，如何施行？可知全體同意制，乃關於國家主權之根本問題，一旦取消，則各國便受一種上層機構之拘束，非復最高主權之國家。方今國際間所達之階段，僅止於此，非世界政府，亦非吾國思想家所夢想之大同，則同意制之不易一朝易轍，有斷然者。仲言之，今後之國際組織，祇能為由主權國家達於世界政府之過渡，而決不能成為掌握海陸空軍政之世界政府也。然世界經此第二次大戰之後，定有進一步之結合，鄙人所見正與公同。上次大戰後，有國聯之設立，約稿初定，倡議人威爾遜

所代表之美國首先反對，已令此國際之世界性，失去大半，僅賴西歐之英法等各國支撐其間二十載之久。雖其第十條中明言各會員相互尊重並保全各國之領土與政治獨立，然其對地球上之各國，心理上孰親孰疏，究不免於此疆彼界之分，其於日本之占領東四省，意大利之奪取亞比西尼，嘗有調查之文與制裁之舉，而終視之為隔岸之火，不干涉己事。獨於德法角力之場，則英政府宣言曰「英國之保衛線在蘭因河上」，此即法國領土之保全，為英所必爭，與中國之東四省不同，亦即各國雖在一個國聯之中，無利害一體之感覺之謂也。各國間既疏分親疏，而非利害一體，侵略者乃為蹈瑕抵隙之計，先就其疏者而奪之，疏者既奪，親者亦難自免。奧亡捷亡之後，英人於東歐各國之疆界，向視為不值犧牲英人之性命者，亦不得不起而負保護之責，此英波英羅英士保證條約之所由訂，英卒因此諸約而與德戰。蘇俄初本不願牽入，故曾拒絕英法同盟之議，轉而與德訂互不侵犯條約，經二載之後，德既播蕩西歐之強敵，又起而向俄宣戰，而蘇俄之本欲作壁上觀者，亦隨英法後而為交戰國之一矣。其介乎此兩時期之中者，德於既據波蘭之後，為西綏上作戰之便利計，嘗侵佔挪丹荷比諸國，及乎法國休戰，對俄宣戰之前，又為意大利去其臥榻之旁之敵人，嘗肅清希臘南斯拉夫二國；其甘於俯首如羅馬尼如保加里者則早樹降旗於兵不血刃之中。除歐洲天涯地角之國家如西如葡如瑞士如瑞典不足為害者外，固已無一不陷入漩渦之中矣。以上僅就歐羅巴一洲言之，然德為進行世界戰爭計，早與日本訂反共條約，日本於巴黎陷落後，更羨德之聲威，進而與德意結三國同盟，其約文之規定曰：「苟三國遭受一未參加於歐戰或中日戰爭之國家之攻擊，則三國互以政治、經

濟、及軍事方法相援助。『明白言之，則爲美國。自有此三國同盟之後，歐亞兩洲之戰，本爲截然兩事者，今則賴此一橋之貫通，而美國之加入，而戰爭之全球性，已爲不可避免之數，然三國同盟之成立，雖由於日德之發起，亦美國之租借法案有以促成於先也。及乎珍珠港事件之後，則此三洲之戰，竟合一爐而冶之矣。由是言之，此次戰爭範圍之日拓日廣，實非常人意料所及。以云參戰之各國，其地位原各不同，有本爲正面之敵，而無法逃避者，如亞洲之中國，如歐洲之波英法，有爲旁及之敵，如荷比希南等是，有因功成而連累以及者如蘇俄，有爲攔阻野心者之路而被累者如美國，合此種種則地球上雖有五洲之分，然一旦大戰發生，則各國無一可以幸免，故曰利害一體之感覺，經此次戰爭之後，當爲各國所同具者矣。惟其然也，戰後之世界，必有一種國際組織。其同於國聯乎，其異於國聯乎，今尙不易斷言。邱吉爾近言將設所謂歐洲會議亞洲會議，分洲會議之設，所以謀同題之地方化，不令其因一洲而累及他洲。然除此分洲會議之外，假令別無超於其上之全世界共同組織，則各國利害一體之感覺，絕未表現而出，而所以限制戰爭於一隅，所以維持世界和平者，仍不可得而達。此所謂問題者一。第一次大戰後之國聯之第一任務，厥爲裁兵，蹉跎數年，一無成議。其後希氏藉口於各國之不裁兵，起而重整軍備，其所以遷延歲月者，罪不在戰敗之德奧，而在戰勝之法國，法國因其人口之日減，難與德國抗衡，故力圖維持軍備，且與蘇俄，小協商諸國結爲同盟，以圖自保，證之巴黎陷落之速，則法國之所以慄慄危懼者，自有理由，非故意留此軍備圖侵略他國也。此次戰後軸心國軍備之被裁，與英美兩國之樂於裁兵，爲休養之計，自爲絕無疑義之事，然戰後復興之法國，是否需再建國防，介於德俄間之波蘭，是否需再建國防，吾國於戰事終了後，是否須確立國防，俄國於戰後所以實行裁兵之程度，視其東西兩敵之情況如何，凡此諸國之中，苟甲國之所爲，引起乙國之疑慮，則雙方與其他國之裁兵，即難於降至最低限度，而全世界之裁兵受其影響矣。至於公漸次以海空軍中之重者要

者移交國際組織之主張，竊以爲英美兩國決不肯放棄此種武器，則他國尤而效之者，又有其可以藉口者在矣。此所謂問題者二。其與裁兵問題相關聯者，爲國際警察，世人所同期望者爲國際組織，負起警衛世界之責，一如國內之地方警察，沿街警吏執棍指示，行人翕然從之，偶有口角，立爲排解，其有互毆相打者，則拘之警署中而秩序如常。他日國際警察能如國內警察之執行其職，正世界各國所禱祝以求。然此種國際警察，應屬之誰手，其屬於國際組織之手乎，抑屬之今日聯合國中二三國之手乎？如屬於國際機關，此項警察組織方法如何，人數如何，下令執行之際是否經各國決議而後執行，是否受全體一致之限制，即令紛爭國在除外之列，而大國之中如有不同意者則如何。倘以此種職務隸屬於國際團體，不免於以上種種牽制，而遂令聯合國家中之英美俄之有兵力者任之，則此等國家所以執行之者，不論其受國際團體之委託與否，要不免於以強凌弱之嫌，而因此引起大國間之紛爭或弱小諸國之不平。此事之嚴定規繩，以爲執行之標準，實爲其成敗關鍵所繫。此所謂問題者三。國聯初設之際，各國鑒於第一次大戰前各國聯盟政策之激起戰爭，乃有外交公開條約登記之規定。各國間即有類於同盟之協定，如羅卡諾條約，如俄法同盟條約，仍保持其與國聯之關係。然依吾人觀之，兩國間因其利害共同而成立之盟約之效力，遠超於其隸屬於國聯下之盟約之上，如英法同盟如英波條約之所發揮者，實勝於羅卡諾條約與法俄捷三國盟約，良以協定之隸屬於國聯者須經國聯會議之程序，遠不如兩國直接所訂者之易於執行也。然逕許各國之自訂盟約，不免於相互勾結促成戰爭之病，其不許之乎，則以國際組織之空洞，常流於具文而不切當前之利害，如何能防制一觸即發之戰禍，此所謂問題者四。國際間各國之實況，不能無強弱貧富智愚治亂之分，因而強攻弱，智欺愚，富凌貧，治取亂，自爲勢之所必至。然求之國聯盟約則有第十條之規定，各會員相互約定尊重保全各會員之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此條在強與強之間，自能遵守，而不至違犯，以云強者之於弱，如意大利之於亞，德之於

奧捷，日本之於吾東四省，則有第十條與無第十條等耳。此等問題倘再演於今後，論者必曰應有國際警察或其他方法以制裁之，然此乃弱不能自躋於強，貧不能自躋於富，亂不能自躋於治，以致貽累於世界之強者富者與治者，以云強富而治之國，樂於干預，以他人之事為己事，甘於負此責任，未必然也。國際團體之中，勢難阻遏自強自富之國之發展，而不令弱者亂者受人欺凌。吾人以為徒有第十條靜態之規定，而無自強自振之國得於平和中伸展之動態規定，則世界上之新陳，如何代興。此所謂問題者五。近人常將世界上之國家，分之為「有」之國家，與「無」之國家，其屬前者為英、美、俄，其屬後者為德日，各國中既有資源而善利用之者，為富且強者，其貧於資源而又不知所以用之者，為貧且弱者，其智力發達而資源缺乏者，則日夜思所以攘奪他人之有為己有，如日本之奪吾四省奪南洋羣島，即此之故。英美人亦嘗提議，將以殖民地之資源，公開於各國平均利用，此為彌縫一時計，不得謂為非一策，然欲恃此為弭兵之計則未見其有效。何也，殖民地之資源，即令讓入公開利用，然數量有多少，作戰時輸出輸入是否不受限制，運輸之便利如何，皆為各國參謀部所深思熟慮者，倘彼等感及依賴他人之不可，必求其併之於本國領土之內，則侵略之謀起矣，此所謂問題者六。凡此六項僅舉其重且大者言之，以云細節，姑付闕如，然即此已可見戰後國際和平問題之障礙重重，初非可一蹴即幾者也。大文中就其應如何方面言之，我則就應如何方面之難處指而出之，所以使人不因今日之過存奢望，而免於他年之失望而已。抑吾更有欲言者，是為國際間不平等之真相。地球上之各國，強弱大小不一，惟各為主權國，各有政府，互派大使公使也，訂約也，簽字也，各居於平等地位，絕無高下之差，然就其實際言之，各國之中，占地最廣，執次之，海陸空軍力最強，執居其次，各國工業，執最發達，執次之，戰時軍火產額執最多，執次之，因此領土大小，兵力強弱與富力厚薄，而各國在國際舞台上發言權主持權因之而高下。世界上苟有大問題發生，如吾國庚子之拳亂，其參加之者

德、英、俄、法、意、美、日也。上次大戰之主要國家，則英、法、俄、德、奧、意、美、日也。此主要國所以為主要國，惟其能派遣海陸空軍，能貸人以鉅款，能製造武器與工業品，能海上運輸，能按時有科學的發明，而貧弱與愚昧之國視之，則瞠乎後矣。各國之生存於同一地球之上，可比之於一個萬萬元資金之大公司，股東入股，有占五千萬者，有為二三千萬者，亦有僅加入二三萬者，股本之大小不一，故發言權與管理權之大小因之不一，有被選為總經理者，有為董事者，亦有僅在每年召集之股東大會中投票一次而已。公司中股東權力之分配如此，而地球上各國權力之分配，何獨不然，此吾所謂為不平等也。昔日各強國之所以立，有以陸軍為主者如德法，有以海軍為主者如英，有二者並重者如日本，空軍為新式武器，其重要性為人所共見，然尚未有特之以獨力作戰者。此次大戰後，各國所以發展三種兵種者，重海而輕陸乎，重陸而輕海乎，或重空而輕海陸乎，視其地理位置如何，富力厚薄如何而決，其必有輕重之分，可以斷言。此為武力之不平等。舉世界之富國，必推英倫，其資金之富，甲於各國，投資之多，及於全球，故倫敦為世界之票據交換所，各國大借款大投資，惟英之馬首是瞻，他國望塵莫及焉。此為富力之不平等。美俄兩國領土連成一片，有海洋為之屏障，國防資源之富如鐵如汽油，無一不具，雖缺少橡皮等物，不足為大害，英國雖富於煤鐵，然糧食汽油仰給於外，每屆戰時，則競競以保持運道為慮，德國與日本所感痛苦，更甚於英。此為資源之不平等。其次號為強國者，其政府，能內保治安，外圖擴張，雖制度不同，有為民主者有為專制者，然其能保持國內秩序人民安居樂業則一。如吾國者，雖稱地大物博，然乏煤鐵之富厚礦藏，尤缺汽油等之戰略原料，重以清末以還，內亂連年，外人每當舉變之生，藉口治安，於平日駐軍之外更派遣軍隊以資彈壓，蓋國之不能自治者，其受人凌辱，有自取其咎者在矣。此之謂治國能力之不平等。因此種種，各國之地位，有為強國者，有為弱國者，有為大國者，有為小國者，有雖大而實小者，有雖小而足與大國

抗衡者，有爲與國者，有爲亡國者。偶有一二能自振拔之國，砥礪奮發，憑其微薄之天資，於刻苦中求生存之道，卒亦自勵於強大之林，繼焉懷抱野心，以盜竊鄰國土地爲事，而戰事起矣。故吾以爲各國之能自立自強，勿授強鄰以口實，尤爲國際和平之第一要義。執此點以責備捷克、波蘭、荷蘭、比利時，尙不免過於苛刻，而吾國人之應以此反躬自省，不可一刻或懈，則萬無可疑者也。甲午以來舊名此方針曰自強，今日易其名辭曰自由解放，其實一也。吾國抗戰以還，國內團結一致，國際地位因以日高，今後惟有自勉爲強國富國治國，內力既充，其對外也，自能從容應付。倘戰後世界更有較善之國際組織，以保障領土，以維持和平，自爲吾國所樂於贊助，若徒恃國際組織爲弭戰之具，而忽其本身自治其國之義務，則今日之戰未了，而來日禍根已隱伏於其中矣。此義在公在全國上下定謂爲然，故敢引而伸之。專此祇頌撰安。

五月十九日張君勛

謹按君勛先生對拙作戰後國際和平問題之商榷，所舉各端有爲吾所絕對贊同者，有爲吾所相對贊同者，亦有爲吾所略持異議者。絕對贊同者即其結論「倘戰後世界有較善之國際組織，以保障領土，以維持和平，自爲吾國所樂於贊助；若徒恃國際組織爲弭戰之具，而忽其本身自治其國之義務，則今日之戰未了，而來日禍根已隱伏其中矣」一段；蓋不自振作之弱國對戰爭應負之責僅次於黷武侵略之強國，此爲吾夙所主張，故對於君勛先生之結論完全同意也。相對贊同者即君勛先生所舉永久和平之種種困難，而對於國際和平之第一要義，君勛先生注重弱國之自強，吾則兼望強國之自覺。前者吾絕對贊同，有如上述；後者則因強國之結果若係以多年之準備，供一時之孤注，如上次大戰之德國與此次大戰之德日等軸心國，於已於人均無是處。況僅恃各國自強，則弱者固強矣，強者亦將更強，於是強與強之間仍有差等，苟較強之一國不克自覺，戰禍殆仍不免。故吾主張雙方並進。嘗

諸樂路焉，兩端同時施工，則成功之速自較一端施工者加倍也。至於略持異議者則爲關係國際組織國際武力等具體問題，君勛先生注重現實，認爲今後之國際聯盟恐仍等於國際會議，未能遽達超國家之世界政府；於是對全體同意權之取消，恐於各國主權有損，對各國軍用機及巨型軍艦潛艇，均移歸國際組織，恐關係國之擁有海空軍如英美者，倘不得其同意，則議案縱令通過，實施仍難有成。吾對於此種困難，雖亦承認其存在；然以二十年之間，兩遭戰禍之慘痛，英國於敦克爾克撤退之初，美國於珍珠港遭遇打擊之際，其國家之危險狀況如何，痛定思痛，能勿悚然？與其於戰後競修軍備，不久恐難免重膺慘痛危險者，何如作一時之犧牲，以望永久之息兵。今勝算已穩操於同盟國掌握，英美於解除戰敗國武裝後，率先作則，以各自所有之武力，歸諸維持國際秩序之國際新組織，而使此組織成爲一有力之超國家機構，並使得依大多數之決議而行使其維持和平之職權，不致如前此因全體同意權而僵持，則對於傳統的主權縱稍有犧牲，好在犧牲者係舉世各國，彼此仍爲平等，而對其傳統的主權加以拘束者係世界大多數之國家，而非一國。爲安全則不能不有賴於集體；而既有集體，則各分子不能不放棄其一部分之自由，而換取永久廣汎之自由。吾雖明知此等問題之解決固有其困難，然仍深望其能解決者即以此故。總之，各國宜振作自強自保不易之理；然振作自強之結果如爲舉世與自國之繁榮，則此結果爲有意義；若結果竟爲強凌弱，大併小，則強中更有強者，冤仇相報不已，世界前途與人類前途尙堪問耶？吾深信君勛先生對此定有同感；特君勛先生之立場在勉國人以自強，吾前撰之文，則在期望諸強之能自覺。在國際安全保障下之自強，則一切努力盡趨向於繁榮人類之標的，反之，在國際危機四伏中之自強，則一切努力盡趨向於摧殘人類之準備；同樣努力而結果大異矣。君勛先生以爲如何？

王雲五 五月二十日

論戰後歐洲的重建

陳鍾浩

一 序言

記得法國名詩人王日禮(Valéry)說過：「歐洲不是一個洲，僅為亞洲大陸西南部的一個半島。」這個半島的北面，有黑海與波羅的海，再北有斯堪德那維亞半島。西面隔着北海，有英倫三島與冰島。歐洲的東面，很難覓得天然的境界；因為政治疆境變動頻仍，所以從萊茵河到烏拉山，從亞德里亞海到裏海，歐亞兩洲的分野，也不甚明確。現在的政治地理學者，每以下列的界線從烏拉山、裏海、橫過高加索，經黑海越波羅的海峽，經東地中海歷蘇彝士運河，達紅海，做歐亞兩洲的分界。

一一 歷史上的途程

從歷史上去檢討，歐洲的版圖，時有變化，歐洲的政治重心，時有轉移。而維持歐洲和平的方法也時有不同。遠古歐洲，以希臘為中心，希臘與波斯的戰爭，可以算是歐亞間的第一次大戰。那時歐洲以東地中海為範圍，黑海的北部，萊茵河的西岸，地中海的西南區域，都不占重要地位。後來亞歷山大，以武力東征，直達印度，打破了歐亞界線，建立了空前的歐亞帝國。

羅馬帝國時代，隨着帝國勢力的發展，歐洲的範圍，日益擴大，沿地中海的四圍，成了帝國的版圖，薰陶着羅馬文化。萊茵河與多瑙河構成羅馬帝國東北面的天然疆界。愷撒大將會率兵越英倫海峽，遠征不列顛。當時的羅馬帝國，在今日的西南歐及北非一帶，樹立了「羅馬的和平」。至紀元前四七六年羅馬帝國分裂，巴爾幹與歐羅巴

分離，西羅馬帝國的重心，轉移到西歐羅巴，以拜占庭(即君士坦丁堡今稱伊斯坦堡)為部城的東羅馬帝國成為歐亞間的緩衝國。

西羅馬帝國崩潰，北方的日耳曼民族漸次南侵，後來查理大帝建立了日耳曼帝國，包括了今日德法的國土，溶化了拉丁及日耳曼文化，大不列顛漸與歐陸發生密切關係，歐洲的疆界北移，易白河成為歐羅巴的東面疆界。

喀羅林王朝(Carolingian Empire)傾覆，羅馬教皇取得了歐羅巴的統治權，此時的歐羅巴的疆界，也就是羅馬教的宗教境界。東北的立陶宛，波蘭，匈牙利，都入了天主教信仰的範圍。十世紀的十字軍時代，歐洲曾以宗教為中心，形成一個政治軍事單位。與東方的回教國鬭爭，英諾森三世(Innocent III)是最英明的教皇，當時成為歐洲的領導者，他有權威驅使其他歐洲的君主。

教皇統治下的歐洲，十六世紀宗教革命，歸於破壞，北方民族如日耳曼，荷蘭，信仰新教，南方民族如西班牙，法國等仍信仰天主教，因為信仰的不同，歐洲引起了長期的紛爭，以宗教統治歐陸的企圖從此失敗。後來神聖羅馬帝國，也是名實不符，毫無實力的組織。

十七世紀的末年，到了歐洲史上的啓蒙時代，民族國家興起，英、法、西、葡成了現代化的國家。重主權，尚武功，開了縱橫捭闔的外交局面，不利於歐洲的統一。另一方面：俄國在彼得大帝領導下全盤歐化，從一個蒙古式的東方帝國，成為一個西方的近代國家，歐洲的疆界，亦隨俄國的接近西方，益趨擴大。

到了十八世紀末年，拿破崙想以武力恢復羅馬，查理大帝與英

諾森時代的局面，同時他又有統一歐洲的偉大理想。一八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拿破崙在聖海倫島的時候，對拉加斯(La Cassa)追述他的志願，他說：「原欲將全歐簡單化，以便統一法典主義、輿論、情緒、意見、與利益。並向全人類發射光彩，形成美利堅會議或希臘會議式歐洲大聯合。」他的理想隨着他的事業失敗，歐洲又墮入羣雄並立的形態。

維也納會議後，野心勃勃的奧首相梅特涅所領導的四國同盟，想以局部連合維持維也納條約的局面。另一方面：富理想愛誇張的俄皇亞歷山大又倡導以基督教為中心的神聖同盟。他們既無建立過去帝國的志願，更無前人宏大的氣概。後來意人馬志尼別出心裁，欲以其和制統一歐洲，他的理想成為意大利統一的理論基礎，固無裨於歐洲國際間的合作。此時歐洲國家的勢力日益膨脹，在其他各洲，擁有廣大的殖民地，歐洲文化，成為世界性的文化，雖則美國獨立後，復標榜門羅主義，阻止歐洲勢力侵入。然十九世紀的歐洲，仍維持世界的霸權。可是在歐洲本土，列強紛爭，各不相下。一八七〇年普法發生戰事，大陸兩強不能合作，歐洲益無寧日。三國同盟與三國協商互爭雄長，歐洲墮入紛亂局面，終於一九一四年，發生大戰。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大戰後，法國欲維持凡爾賽條約的優勢，除一九三〇年左右，一度倡導歐洲聯邦，以種種方法維持法國霸權外，他如一九二二年計劃互助公約，一九二四年訂立日內瓦議定書，一九二五年締結羅加諾條約，方法大都消極，思想顯見偏狹。她沒有化敵為友的氣量，又缺乏永久使敵屈服的武力，法國式的和平，終難維持長久。一九三〇年以後，德國復仇思想，意大利修約運動，兩次匯合來進行推翻和約的工作，破壞歐洲的秩序，更不惜與歐洲以外的侵略國家，日本連合，來打倒法國的優勢。英俄兩國，並非完全的歐洲國家，其言利為世界帝國的中心，不列顛形成國際的聯合國。她雖關切歐洲，尤其是西歐和平，確不願受過分的事前的約束。俄國領土跨歐亞兩洲，具有獨特的政制，想望世界社會主義的實現。他們各有立場

與政策，對歐洲未負全部的责任。在第二次戰前的紛擾局面下，奧人加萊基(Kalergi)的「歐洲合衆國」，與白里安的「歐洲聯邦」，都成了烏拉邦理想國。

三 第一次大戰中的歐洲

在第二次大戰進行的三年中，歐洲局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第一納粹德國侵佔了大部份的歐洲：在戰前，希特勒已合併奧地利，不戰而佔領了捷克，戰事發生的初期，德軍佔領波蘭，一九四〇年侵入比荷、盧、丹麥、挪威，法蘭西也在六月間屈服。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又席捲巴爾幹半島，希臘、南斯拉夫受德國侵佔，羅馬尼亞，保加尼亞也屬於納粹軍威，參加了軸心集團。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他更發動侵蘇戰事，侵佔了波羅的海三國領土及烏克蘭，軍力直至高加索的邊境。意大利也在這次戰事中，漸次失了重力，淪為德國的附庸，這些被破滅的國家，大都流亡到英國，樹立自由政府，維持象徵的獨立，號召同胞繼續反抗。另一方面，希特勒卻在佔領區內有計劃的徵發與掠奪，實施他的所謂「新秩序」。德國在大部分歐洲，樹立了暫時殘暴的軍事統治。第二、法蘭西勢力的沒落：強盛的法國，原是歐洲一個主要因素。自一九四〇年六月巴黎淪陷，二十二日在香港締訂休戰條約，德國不僅佔領了法國沿海海洋，以及北部的領土。僑促於一隅的維琪政府，在精神上及事實上，都受德國的壓迫，不能行使職權。海外的若干領土，如敘利亞，馬達加斯加等，相繼參加反侵略集團，安南受日人蹂躪。自去年十一月美軍在北非登陸後，阿爾吉利亞，摩洛哥等地，脫離維琪重行抗戰。十一月十一日，德軍破壞休戰條約，開入非佔領區。不久停泊於土倫的殘餘海軍，又自行毀滅。受納粹操縱的賴伐爾成為貝當的繼承人，維琪獨裁者。雖則法國的愛國志士，在暴力下，不斷反抗，戴高樂與吉羅德，兩抗戰政權，不斷的會商，建立統一政府。法蘭西的前途，仍然光明。可是在現在，甚至在最近的將來，法國確不易恢復過去的地位。第三、英美蘇對德的聯

合作戰。自希特勒對巴爾幹戰事結束後，歐洲全部幾陷於停戰狀態。後來蘇軍在歐洲東北部力拒德軍，英美以及法國聯軍與軸心軍在北非作戰，在現在的戰事階段中，是歐洲及非歐洲的國家，與歐洲的強國，在歐洲的邊區或歐洲的鄰近作戰。向來不易參加歐洲紛爭的英國，已動員國力並發動整個帝國的人力與資源和納粹作戰。一向標榜和平的保甲有徵拾和約的蘇俄，也策動歐洲兩洲的國力與德肉搏。人力，號召整個美洲來與德力戰。英美蘇對德決戰的結果，不僅關係交戰國的存亡繼絕，亦且為將來歐洲甚至整個世界前途光明與黑暗的關鍵。前兩個事實——德國霸占歐洲與法國的衰落是暫時的，無決定性的現象。第三個事實，英美蘇與德決戰的結果，才是決定性的因素，因為這個因素可以肯定，同時可以否定以上兩個現象。根據我們希望與事實，同盟國的勝利，應不成問題。

四 歐洲的出路

綜上所述，無論戰局若何發展，歐洲的前途，不外三個的可能：第一、是獨霸的路。就是未來戰爭中，交戰國的一方，獲得最後勝利，在歐洲樹立霸權操縱整個歐局。聯合國方面，羅斯福宣言明白表示民主國沒有領土的野心，尊重各民族的意志。英美蘇的興趣，不完全在歐洲，他們不是或不完全是在歐洲的國家，他們除保障本國安全，樹立經濟關係外，不致對歐洲以武力行獨霸式的統治。只有納粹勝利，歐洲人民陷於黑暗的希特勒的新秩序。他將以「我的奮鬥」為基礎，參照實際情況，建立以日耳曼為中心的第三帝國。其他民族如斯拉夫人，拉丁人都成了日耳曼人的奴役，以上民族的祖國，都劃入希特勒的「生存空間」，歐洲文化將受摧殘，歐洲自由，將受悶塞，歐洲將受一個新黑暗時期，一切愛好自由和平的人們，不願也不讓納粹實現他的計劃。

第二、是均勢的路。如果這次戰事，打得不徹底，勝負不分明，

交戰國的雙方，在分子上此勝彼負，在地域上甲在此勝在彼負，乙在此負在彼勝。或交戰國彼此有顧忌，不願拼到底，中途妥協，則歐洲的和平即將為不妥協式的和平，歐洲會重返到同盟外交勢均衡的舊道，或還有人恐怕聯合國在未來和會上，不能徹底合作，或竟有人怕德國打敗了又來一個第二德國，彈扶弱抑強的舊調，在歐洲再成立均勢，不過此種可能性並不大，因為在戰時蘇美英已一再表示作戰到底，不計及和約修正者，直至敵人無條件屈服為止，無單獨媾和中途妥協的可能。在戰後，聯合國應能和平共濟，處置敵國，消滅他的武力，使他不能復仇，保障和平，使侵略國不能再度破壞國際和平。過去的均勢政策，已不適用。均勢為戰前的備戰，武裝的和平，不能維持和平，也非真正和平，這又不是歐洲應走的路。

第三、是聯合的路。歐洲為要在戰後——當然為聯合國勝利的戰後，維持較長期的長治久安，勢必有一種聯合的組織，這種組織，從形式上說約有三種：第一、為「邦聯」(Confederation)，即歐洲各國，維持本國的主權，以獨立的資格出席定期的會議，討論外交經濟等重要問題。以協議方法，解決政治經濟上的紛爭，一切議案無絕對的束力，各國可以自由參加或退出，略似德國統一前的佛蘭克福(Frankfurt)會議或現在的泛美利堅會議，此種集合，組織不堅，收效不宏，不能維持和平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第二、區域協定。即歐洲各國以地理環境的鄰近，及歷史民族關係的接近，利害關係的密切，自行聯合。譬如過去的南斯拉夫，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均為奧匈帝國的繼承國家，有維持和約的需要，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的組織小協約。巴爾幹半島上的羅馬尼亞、希臘、土耳其、南斯拉夫為維持巴爾幹和平，在一九三四年成立巴爾幹協商。一九二五年的羅加諾，英、法、意、德、比五國參加，也是西歐的一種區域公約。在將來，東南歐洲的拉丁民族，法國西、西班牙、葡萄牙，泛黨推翻新後之意大利可能成一集團。巴爾幹斯康的拿維亞也可各成一集團。捷克、波蘭、南斯拉夫等也可能成一集團。各集團的國家，參照巴爾幹協商或小協約的前

例，締結公約，定期集會，規定仲裁程序，商訂經濟合作，確定軍事互助。在外交政策，已採取一致態度，然後再由各集團為按照國家數目及人口比例，各出代表組成歐洲聯合委員會，求各單位間工作上之聯絡，為歐洲對外的代表。這種形式最合實際，有很大的可能，然非歐洲人的最高理想。第三、聯邦 (Federation) 之路。即各國聯合成立歐洲聯邦。此為一切歐洲倡導團結歐洲人士努力以赴的目標，從僧侶聖彼得 (St. Peter) 至哲人康德 (Kant) 都立論鼓吹過歐洲民族的連合，以維持歐洲的和平。一次大戰以後，歐洲聯邦計劃曾有兩次的嘗試，一次由奧人加萊基鼓吹，一由法政治家白里安提倡，前者曾為一種時尚的運動，後者且成外交上的實際行動。我們現簡略介紹其內容，與評議其得失，加氏的「泛歐羅巴」 (Pan-Europa) 計劃中，認為泛歐羅巴運動的實現，應經過數個步驟：第一步由一個或數個以上的歐羅巴政府，召集泛歐羅巴會議。他認為中立而富國際性的瑞士或荷蘭，都可擔任這種工作。泛歐羅巴會議的議程，必須事先妥為訂立，組織各種委員會，分別計劃仲裁，保安裁兵，少數民族，關稅，金融，債務與文化等問題。第一次會議，規定以後如泛美利堅會議一樣舉行有定期會議。設立泛歐羅巴局，為統一運動的中央機關。實現泛歐羅巴的第二步即為歐洲各國締結仲裁條約，和保安條約。實現泛歐羅巴的第三步為設立歐羅巴關稅同盟。泛歐羅巴的權力，可以步美利堅合眾國的後塵，在歐羅巴合眾國的憲法上，規定清楚。泛歐羅巴對與其他各洲或世界列強的關係，為一單位。聯邦中各國都享受高度三百議員，一人代表一百萬人民，國家總數則有二十六人，一人代表一國。加氏明白確立他的目的為免除「赤色和白色俄羅斯的侵略」，「對美洲與不列顛的工業競爭，在將來也可以和東亞與俄羅斯的工業競爭。」他雖則說他的計劃可以「避免歐羅巴的國際戰爭」，又說：「世界大戰中，歐羅巴可以中立，」然而這種運動，卻充滿了反他國及反他洲的機關精神。一九二三年以後，泛歐羅巴運動曾熱烈展開，

一九二四年四月，並成立機構，發表宣言，在羅加諾條約的先後，泛歐羅巴運動極度活躍，惟以未獲各國政府的重視，始終是一種民間的思想運動。至於白里安提倡的歐聯計劃，內容見於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七日白里安向歐洲二十六國提出備忘錄。他主張成立一種歐洲聯邦，特點如下：(一)新組織並不在國聯之外，乃基於國聯原則，受國聯指揮的一種範圍較狹，效力較大的集團，並不反對他洲。(二)締結普通約章，確立歐洲精神之聯合。(三)成立下列具體機構，執行聯邦工作。甲、代表的及責任的機構，名為「歐洲會議」。乙、執行機構為一永久政治委員會。丙、秘書廳綜理事務的機構。(四)聯邦基本性質為一種「聯合」 (Union) 非單一性 (Unity)。各邦保持獨立主權。(五)締結經濟協定，實行關稅同盟，謀全歐人民之福利。(六)合作事業之範圍，如一般經濟，工業建設，交通運輸，財政勞工，衛生，文化事業，議會同盟等。歐洲各國對法國建議，先後回答，原則上均表贊同，辦法上各持異見。英國以領土遍佈五洲，恐「歐聯」引起他洲之疑慮與反感。荷荷亦謂歐聯應不減少祖國與其殖民地之關係。德與意大利認聯邦應請蘇聯與土耳其參加。至於新機構之成立，英國恐與國聯相混合，德國、愛爾蘭自由邦、荷蘭、瑞典、認為至必要時再行設立。西班牙、盧森堡、葡萄牙，謂可於第一次歐羅巴會議時，從長計議。從各國的回答，反響出各國政策的不一。即法國內部意見也很紛歧。白里安便不得不將計劃範圍縮小，先討論經濟問題。又不得不將性質變更，較前空泛，設立研究機構。及至白氏歿後，歐聯運動，更無人注意。歐聯運動之失敗在於意識不清。白氏一方有創立新機構維持歐洲和平的雄圖，一方要利用新機構維持法國的霸業，這是第一個矛盾。一方希望歐聯能切實有效，保障和平；同時又規定各國保持獨立，與主權之完整，這是第二個矛盾。在性質上歐洲聯邦明明是在國聯以外，另起爐灶，在文字上卻又規定與國聯保持密切關係，這是第三個矛盾。顧名思義，歐洲聯邦既由歐洲各國組織，便不必規定國聯會員才能參加，在歐洲有領土的蘇聯與土耳其，便不被邀請，

這是第四個矛盾。無怪這個矛盾重重的計劃，不待希特勒興起，已註定了失敗的命運。所以戰後歐洲的重建，當然以歐洲聯合為最理想。惟求其成功一定要避免重蹈覆轍，確立新原則。

五 歐洲聯合之幾個重要原則

未來的歐洲，如要維持相當時期的和平，勢必避免過去的錯誤。

我們不願越俎代庖的為歐洲確立周詳的聯合計劃。現在祇願對歐洲未來聯合的性質，提供幾個重要原則，備供計劃重建歐洲人士的參考。

一、未來的歐洲聯合，應儘量民主化非強國操縱的集團：組織方法應依各政治單位，及人口比率，決定代表數目。如由兩院組織，上院可代表國家，下院可代表人口，如此可免強國操縱，成為圖窮的工具，或成為少數強國支配弱國的集團。這樣才可獲得小國的同情，樂於參加，強國居於精神上或事實上（因強國多為大國，人口較多）的指導地位，惟對小國無獨斷權力及支配權，不致成為拿破崙式的「大陸體制」，或維也納會議後的「歐洲總裁制」（European Directorate）。過去德意等國不熱烈贊同歐洲聯邦，多半為着恐懼法國，利用她來維持凡爾賽條約的優勢。小協約國竭力反對一九三三年的英、法、德、意協定，也是深怕因強聯合仲讓歐洲的國際政治，因此今後的歐洲聯合要免受強國利用，要小國樂於參加，牠的組織勢必民主化。二、未來的歐洲聯合，應使時代精神，積極謀國際合作，而非戰勝國維持條約優勢的工具；一般講來，戰後局勢，多受戰勝國操縱，戰後的和平即是和約規定的局勢。有人破壞條約，戰勝者即責稱破壞和平。羅馬帝國，保持武力造成的結果，維持了「羅馬式的和平」。一八一五年，英奧普俄四國，要保持拿破崙戰事的結果，就維持維也納條約的和平。普法戰爭後，佛蘭克條約，樹立了德意志的和平。一次歐戰後，凡爾賽條約，樹立法蘭西的和平。和平與和約混為一談，是過去和平不能維持的原因。勝利者的武力消失，戰敗者便發動戰事，來推翻條約。一旦戰事，她也以衛道的口吻，主張維持和平了。一次大戰後，國際

盟約與戰後和約，載在一起。國聯又受和會的委托，處理若干戰後事務，戰敗國又不能參加國聯，和平機構有戰勝國操縱的嫌疑，所以國聯不易得着戰敗國的支持，即美國也否決了和約，同時拒決加入國聯。今後的新和平組織，應絕對與對敵和約分開，和約以取得戰勝者應得的權利為目的，可以對敵提出澈底條件，解除敵人武裝，使侵略者不敢也不能破壞和平。和平機構以謀戰後國際合作為目的，應使每個國家均可參加誠意接受和平新局面。如確實證明敵人已無破壞和平的意志也不應拒絕加入。和約為武力勝利的結果，是霸道的。和平機構以維持和平為出發點，是人類文化的進步，國際意識提高的表現，是王道的。武力可以使敵屈服，仁義更可化敵為友。正誼與武力的配合，霸道與王道的並用，是一切戰勝國應採的途徑。一次戰後，協約國之失，即在凡爾賽體系，未能徹底解除敵人武裝，新建的國聯，又未能使戰勝國與戰敗國以平等地位共謀國際間合作。羅加諾條約，雖有「化敵為友」的作用，惟未能澈底。今後的歐洲組織一定要避免感情用事，要免除戰勝國與戰敗國的界限，方不致重蹈以往的覆轍。三、新歐洲機構，應有強制性，而非一空洞無力的諮詢機關：在過去的國聯中，各國政府保持獨立主權，議案須一致通過，盟約雖有制裁規定，惟多不易實行。國聯本身無武力，不能執行議案。本身無最後決定權，不能發號施令。在白里安歐洲聯盟計劃中，他一面主張各國享受聯合的利益，解決政治糾紛，同時申明歐聯為各國之聯合，各國享受獨立與主權。加氏的泛歐羅巴計劃也規定各國保有最高自由權。因此計劃中的新機構並無實力。在未來的組織中，各國應犧牲一部份主權，讓新機構具國際警察權。如確定某國違法，違法者應有受懲戒的義務，無參加討論的權利。如一國受侵略，受侵略者要有接受和平機構處理的義務，並有受援助的權利。如此才有實際効力，不致淪為議論盈庭毫無辦法的國際議會。四、未來的歐洲集團，應為國際和平之一單位，非反對他國或反對他洲的團體：歐洲向為戰禍的淵源，國際政治之重心，歐洲不治世界不安，此為事實。未來的和平機構，應為

世界組織之一部，歐洲集團與世界組織，應有密切關係。歐洲聯合應以世界組織為依據，成為世界組織中的區域性之組織。時代演進，歐洲已不能代表世界。過去國聯為歐洲性組織，國聯乃至失敗。歐聯運動，又強將歐聯與國聯混為一談，歐聯又未成功。現在的歐洲已非惟一國際中心，亞洲、美洲乃至澳洲均有左右國際政治的力量。何況歐洲的國家利益，常常超過歐洲界限，英國的領土遍及世界，不以純歐洲國家自居，恐以此失去與其他自治領及殖民地的連繫。歐聯無英國參加，一切問題不易解決，歐洲集團如要英國參加，即不能帶反對他國的色彩。蘇聯在歐亞兩洲均有領土，他的注意力集中歐亞。他的興趣普及世界。歐洲集團如無蘇聯參加，實為一大漏陷，如為反蘇聯的集團，更失維持和平的本旨。美國為世界強國，國際和平的支柱，過去的國聯，無美國參加，為世界和平的重大損失。戰後的歐洲，有賴美國協助，歐洲的重建需要美國的合作。英美蘇為民主國家的健將，歐洲集團不能反對他們，英蘇為歐洲國家，同時為國際國家，歐洲集團又不能限制他們。加萊基的歐聯運動，帶有充分的反英美及蘇聯的色彩，白里安與歐聯聯邦，未邀蘇聯參加，結果毫無成績。現在賴佛爾為要徹底對希特勒屈服，也無恥的叫出歐洲聯邦的口號，來

進攻歐洲的前奏——地中海之戰

吳澤炎

反蘇，反英美，更不足道。未來的歐聯，果能實現，一定在英蘇調協美國支援下成立，並構成國際和平機構的一部。五、未來的歐洲聯合應謀各民族間之合作，非操縱或統治其他非歐洲民族的工具；歐洲的國家，在他處擁有重要土地。一次大戰以後，國聯又以委託代管的名義，將德土的土地，托協約國代管。現英國委託代管地如伊拉克等已成為獨立國。他如敘利亞及法屬北非各地，命運未定。法國越南，西非北非等地，均發生變化，歐洲國家與殖民地關係勢必重行調整。歐洲的面積，英蘇除外，約為五、〇〇〇、〇〇〇方公里，歐洲的殖民地有一九、七〇〇、〇〇〇方公里，被歐洲統治的土地，三倍於歐洲。這確是一個重要問題。

我們暫不討論殖民地的歸宿，但是我們贊同居里（Curry）的言論：「殖民地問題必須解決，現時的情勢不可實用，不可維持。」未來歐洲聯合不應成為加強歐洲對殖民地統治機構，應重行確定過去殖民地的地位，使今後殖民地問題，不致為歐洲紛紜的源流。最後吾人深盼歐洲和平的建立，來做世界和平的保障，重建的歐洲，不復為世界和平的威脅。

一月十四日至二十四日卡薩布蘭加會議所決定的最高戰略，是以全力擊潰納粹德國，然後再解決日本。怎麼去執行這個最高的戰略呢？英美官方並沒有加以具體的說明。這是盟國軍事秘密的一部份。不過如果我們追憶自去年十一月七日美國陸軍在西北非登陸起迄最近

止的一連串事變，盟國行動的粗枝大葉的輪廓，也是不難看出來的。那就是在儘可能的最短時間中，肅清北非的軸心軍，然後再進攻歐洲大陸，實行開闢第二戰場。羅斯福總統早在突尼斯戰役開始時，便說：「盟軍在北非的勝利為實際進攻歐洲的先奏，牠們並不掩飾在歐洲登陸的意願」。三月二十七日美國兵工署署長甘培爾的宣稱盟軍一旦控制北非即將進攻歐洲大陸，這很可代表一般人的看法。最近（五月六

日)美國戰時情報局長台維斯公開表示「今夏盟軍可以進攻歐陸」，不啻爲這種看法添加一個說明。事實上北非軸心軍的負嵎掙扎，也毋寧在於儘量延宕時間，使德意能夠從容肆應，布置防守「歐洲堡壘」的本身。

一一

由北非的肅清，或完全控制北非軸心的殘餘勢力，以至於在歐洲大陸另開一個或多個新戰場，中間包含許多必須克服的技術上的困難，並不如「坐在太師椅上的戰略家」(arm chair strategist)所設想的那麼輕而易舉。不說別的，單是如何裝運數十萬具有現代化配備的大軍，安全登陸，突破敵軍的縱深陣地獲得一個根據點，已經儘夠使盟國參謀本部人員絞盡腦汁了。第厄普登陸的經驗，便是一個例證。當然任何技術的困難都不足以永遠遏阻盟軍的行動，在戰爭中意志與決心可以突破技術上的障礙，而創造出在乍視之下幾乎不可能的奇跡，例如法蘭西之戰後鄧肯克三十萬英國遠征軍的安全撤退。但同樣確鑿無可疑的，根據盟國統帥部過去認定後動的作風，以及盟國領袖的氣質，除非開闢第二戰場的種種技術上的障礙，已經減少到盡人事的可能，是決不會以數十萬大軍的生命輕率的作孤注一擲的。如果這一個論斷不錯，我們就有理由可以相信，在北非戰事的結束以後與進攻大陸的軍事發動以前，一定還有一個或長或短的準備時間。這一個準備時期的特色，不是軍事活動的沉寂，毋寧是盟軍利用一切的力量，爭取一切可以使進攻大陸得以順利推行的有利條件。地中海的全部控制，應該而且必定是條件中最重要迫切的一項。

控制地中海是進攻歐洲大陸的一般有利條件，同時和開闢第二戰場的問題息息相關。盟軍究竟將在何處登陸開闢第二戰場，誠然無從知道，報紙上的消息至多不過是一種可能的懸揣，但意大利之爲軸心中較弱的一環，先摧毀法西斯蒂的意大利使之退出於戰局以外，必在盟國參謀本部的考慮之中。意大利之將爲盟軍進攻的次一目標，亦有

間接的跡象可以追尋。三月二十七日美國各大報紙傳出消息，羅斯福總統的紅人、民主黨的要角、原籍意大利的紐約市市長拉加第亞，即將辭去現職加入軍隊，在盟軍攻入意大利之時拉氏將出任古領區的行政長官。這個消息即使說並非百分之百的事實，至少代表美國國內極有力量的一派人的見解。控制地中海與進攻意大利實質上一而二，二而一。

一二

地中海在英帝國的傳統政策中，本來就認爲有關帝國生死存亡的戰略要地之一。赫敦(Edward Hutton)在十九世紀以後的地中海問題一書中，曾經要言不煩地說過：「顯明的，在承平時期的我們的交通，我們在歐洲和近東的政治勢力，以及我們的威望，都有賴於地中海上的自由與安全。任何國家欲控制地中海或阻止海上交通者，不僅予英倫，且予英帝國以威脅，因而立即引起地中海問題。」法西斯蒂意大利的勃興，它高調恢復古代羅馬帝國的光榮，漸漸威脅到英國所堅持的地中海上的自由與安全。那位儼然想承凱撒大將衣鉢的黑髮首相，公開說地中海是「我們的海」(mare nostrum)。一九三六年他更指出英國說：「地中海在英國是一條捷徑，在我們是一條生存線。」在意大利加入戰爭的前兩個月，法西斯蒂的發言人蓋達(Gaeta)便暗示說：意大利不甘於長爲地中海上的「潛伏的囚徒」。自從法國艦隊實行停戰以後，英國在地中海上的勢力尤其岌岌可危。英國之不能久守克里特島(Crete)，固然一部份出於英德兩國空軍力量的懸殊，同時也明白表現至在地中海方面，英國海軍不得不放棄傳統的戰術，採取守勢的防禦。這種新局面，使英國不能不放棄由英國本部朴資茅斯港(Portsmouth)至蘇彝士運河長三千五百哩的捷徑，改而採取由西非通過開普敦(Cape Town)而繞道紅海長一萬五千哩的長路。單就這一點，使英國的作戰努力上增加了不可估量的沉重的負擔。英國在地中海上的頹勢，直至英國第八軍在北非反攻獲得決定的

勝利以後，纔漸次好轉。這番的勝利，不僅在於使意大利的殖民帝國成為歷史上的陳跡，尤其重要的，必把意大利在地中海上的戰略布置全盤推翻。意大利在地中海上的海空根據地，可以結連成四條線，一是自本土的斯庇齊亞(Spezia)經本特爾利亞島(Pantellia)在利比亞的特黎巴里(Tripoli)；二是自特黎巴里起經都布羅克(Tobruk)、愛琴海中的勒羅斯羣島(Is. of Leros)而伸至多得坎尼斯諸島(Dodecanese)；三是自本土的泰倫多(Taranto)至西西利的奧古士大(Augustinus)；四是自西西利的墨西那(Messina)至突尼斯的旁角(Cape Bon)。北非帝國的瓦解，把國防意大利必不可缺的許多外圍的戰略要點，先後落入了盟軍的手中。在此以前，進攻意大利本部還不過是一種計劃，現在卻成了現實。四月十六日墨索里尼不得不以總司令的名義宣布西西利與沙丁尼亞及附近各島嶼為戰區。這種喪自己威風的話而出之於好大喜功的墨索里尼之口，實在也是歷史的惡作劇。如果說過去意大利是地中海「潛伏的囚徒」，而今卻是真正道地的囚徒，聽待法官的裁判了。

四

在盟國勢將以全力從事的地中海之戰中，意大利的光景是很慘澹的。在軸心國家中，意大利的資源最貧乏，而且工業化的程度最淺。現代機械化軍隊的戰爭效率是以工業的基礎為高下的。意大利國內所需的糧食、原料尤其是燃料，都有賴於國外的輸入，其中如煤輸入量占全部消費的百分之八三，汽油有賴輸入者占百分之九四。如果以歐戰爆發前一年也是比較正常的一九三八年為例，那年意大利由國外輸入的貨物達二千四百萬噸。其中由陸地輸入者只有四百萬噸，其餘二十萬噸悉由海上輸入，其中通過直布羅陀海峽者一千六百萬噸，通過蘇彝士運河者二百萬噸，經過黑海、阿得里亞海或地中海沿岸者二百萬噸。海上的封鎖窒息了意大利的經濟生活，削弱了它的作戰效率，它便有一個時候數量上曾占優勢的意大利海軍，在泰倫多，在瑪泰本

(Matsapan)接連二次的失敗而終於潛匿不敢作正面的招架。意大利工業和民生所需的一部分不得不靠納粹德國陸路的輸入，這也就是墨索里尼為什麼必須向希特勒屈膝的真正原因。這是黑灰首相為維持其法西斯蒂統治所付的代價。

一九四一年六月中墨索里尼的加入戰局，原在獲得「不費本錢的勝利」(cheap victory)，他也同希特勒一樣，深信在法國崩潰以後，英國一定會鑒於大勢已去而向德意求和的。英國的繼續抗戰，推翻了墨索里尼一相情願的如意算盤，棋錯一着，不祇煞費氣力所建立的海外帝國盪然無存，而且迭受打擊，創深痛鉅，如今連本土都直接遭受入侵的威脅了。在戰爭中意大利陸軍為英國所俘獲者至三月止為二十七萬人（三月三十日英國陸軍部公報），海軍商船的損失至本年二月止共四百餘萬噸（四月一日英國海軍次官在衆院報告），此外還要加上比塞大，突尼斯戰役中的重大損失。在這種情形之中，意大利士氣之低，也是不足為奇的。同樣，為防衛其本土，即使德國並不使用威脅利誘的手段，法西斯蒂的當軸亦勢必要求德國的「合作」，請德國的保護。報紙上關於德國秘密警察滲入意國各地以及德國將接收意大利海軍的傳說，也許有渲染過當的地方，但意大利之倚賴德國的程度與日俱深，將因地中海戰事激烈化而變本加厲的一個基本趨勢，實是千真萬確的。

因此，此後的控制地中海的戰爭，不特是對意大利作戰，也是對德國作戰。德國在意大利境內已經和繼續在建築許多的空軍根據地。在這次戰爭中，我們可以看出空軍，尤其是有陸上根據地的空軍在戰役中所能發揮的戰術的效果；我們幾乎可以說，取得優勢制空權，是取得勝利的具體條件之一。如果過去的經驗可以作為參證，那麼控制地中海之戰的表現形式，大概會出之以大規模的空戰——取得確實的制空權。意大利本土的空襲，自將為這裏應有的文章。

五

控制地中海之戰事曾經不止一次決定歷史的命運，第一次是希臘的攻取特洛伊城（Troy），第二次是雅典人戰敗波斯艦隊於薩拉密士（Salamis），從此東西文明分道揚鑣；第三次是羅馬的消滅迦太基，奠定了羅馬強盛的初基；第四次是一七九八年納爾遜在尼羅河之役中

北非勝利的重 要

張印堂

過去列強之爭土奪地，目的有三，或為土著人工之低廉，或為原料出產之豐富，或為生活氣候之適合，以增長其經濟之實力，以擴張其政治之範圍。非洲之有「殖民地大陸」之稱，即由列強爭奪所致，於十九世紀末葉掠奪最烈，幾經分割，始成了戰前的局勢；所以北非實已成了列強的附庸，一切的變更，都是隨着列強鬭爭的結果而轉移的。惟就目前而論，北非之為歐陸大戰之序幕，其第一重要卻不在此，而仍為爭奪之目標者何？蓋以其地位特殊，得失關係重要也。所謂一地地位之重要者，即平時或為交通之驛站，或為捍衛交通要道之屏障，戰時則具有軍略地位之價值，成為進退之據點，北非一帶於此次歐陸大戰中之勢在必爭，其重要即在此。今為明晰起見，特將北非一般之地理情況與其重要性，分別介紹於后，以供讀者之參閱。

一 北非之地理形勢

北非在行政區劃上，概可分為四部，即英領埃及（名為自治），義領利比亞，法領突尼斯，阿拉吉爾與摩洛哥及國際共管之坦吉爾是也。此次北非戰場當以義法兩國所領各地為最重要，故以下所論範圍亦限於此。

法國在北非之領土至廣，大於英義之和，惟英國以扼守蘇伊士與直布羅陀，地中海之東西門戶，而中間又佔有馬爾他島，故其與法義

摧毀拿破崙的艦隊，種下了這位不世出的霸王的覆亡種子。目前展開的新的地中海之戰，會不會再度發生決定歷史的影響，成為意大利崩潰甚至軸心全盤失敗的起點，那就要看今後事實的推演了。

五，九燈下。

兩國在北非之屬地，平時關係密切，頗有控制之勢，值此戰期，軸心據之，英國自難坐視，是以盟方之爭奪義法北非乃意中事也。

北非各地當地中海之南岸，位東北信風帶，乾燥雨少，夏炎熱而冬溫暖，僅北部沿海一帶冬季稍有雨水，以是內地大部為茫茫無人煙荒涼滿目之沙漠，間有少數水草區。陸上交通不便，惟於空運軍兵之降落殊為便利，為飛行之天然基地；故盟軍佔有義領利境後，於麻士巴與麻克勒間即發現有降落機場一百二十座，法領北非境內機場之多，由此可知。所以盟軍佔領北非機場之後，不但便利北非的戰事，更可出擊地中海上之敵艦及軸心在義境內之供給地，如熱內亞，米蘭，那普勒斯，都靈等，裨益歐陸戰事至鉅。

（1）阿拉吉爾 阿拉吉爾之北部三省，乃為法國之直屬行省，而南部沙漠則由殖民行政所管轄，面積近一百萬方英里，約當法國本部之五倍，惟其膏腴之地，除沙漠內少數水草區外，盡限於沿海平行之狹長地帶，名曰「忒爾」，Tiers。其他肥沃之水草區多散佈於沙漠內之山谷中。阿境居民土著共約六百餘萬，其中柏伯爾人約佔四分之三，餘為阿拉伯人。境內歐人共八十餘萬，義人佔絕大多數，法人次之。沿海一帶水量較多，富產穀物。內地水草區則多產洋橄欖，煙草與酒類。此外牲畜之輸出年值二萬五千萬佛郎。鐵產以鐵，磷酸鹽，鋅，石油等為最重要。總之阿境產物大抵皆為法國工業上之必需品，

且爲其所最感不足者，故於法國之利益殊爲重要。現北非全部既爲盟軍所據，而直受其損失者，當爲軸心德國，自無待言。

(2) 突尼斯 突尼斯位阿拉吉爾之東，爲法之保護國，面積八十八萬方英里，居民二百數十萬，大部爲強悍好鬪之柏伯爾及阿拉伯人，以種穀牧畜爲生。境內歐人僅二十萬，其中義人竟佔半數！突尼斯北與義國之西西里島，僅一衣帶水之隔，寬僅一百三十英里，又以地臨義領利比亞，故過去義國對之時爲覬覦。突境輸出亦以穀物與酒類爲最。

(3) 摩洛哥 摩洛哥地位偏西，瀕臨大西洋與地中海，自一九一二年始爲法之保護國（外有小部名伊夫尼，爲西班牙之保護國）。摩洛哥面積十餘萬方英里，居民四百五十萬，其中猶太人佔大部，歐人僅十五萬。昔日爲柏伯爾及阿拉伯人所據，自八至十四世紀，曾蹂躪葡西兩國，時入侵略，危及西歐，儼然有制服耶教歐人之勢！但終歸失敗，淪爲法之保護國。摩境輸出以磷酸鹽爲最，戰前法德兩國根生作物所需之肥料多取給於此，故於德法之農業發展殊爲重要。

(4) 利比亞 利比亞當法領突尼斯與埃及之間，面積四十二萬五千方英里，居民非人百餘萬外，義人三萬六千，僅及法領突尼斯境內義僑之三分之一！境內大部爲沙漠，沃土僅限沿海一帶，原爲土耳其所領有，自一九一二年始由土割讓予義，此次大戰，土守中立，便利盟方近東地位至大，來日軸心戰敗，利比亞之隸屬問題，頗有注意之價值，或將劃歸土有不無可能，以示盟方對土國嚴守中立之謝忱。

(5) 坦吉爾 坦吉爾位直布羅陀海峽之南岸，面積僅二百方英里，與英之直布羅陀軍港，隔海相望，近在咫尺，爲地中海之門戶，形勢重要，得之不但可以爲進窺摩洛哥之據點，更能控制大西洋地中海間之交通，故英、法、美、義及西諸國在該地各有相當之政權，均不欲任何他國對此重地佔有優勢之地位，故由國際共管之，惟以毗鄰法屬摩境，以法之權利最大，故管理坦地之國際代表團，向以法人爲

首席，以是坦吉爾一地名雖爲國際共管，實亦無異於法屬北非之一部也。

二 北非軍略地位之重要

(1) 北非濱地中海上之重要港口 北非北濱地中海，西臨大西洋，海岸雖長，但形勢平直，良港較少，因此現有之少數港灣益形重要。北濱地中海之港灣，其重要者僅塞港，亞力山大，多布魯卡，班加西，第黎波里，拉古勒特（爲突尼斯之外港），比賽大，阿拉吉爾，布吉，與阿蘭等十港，其中具有軍港價值者，僅亞、班、比、與阿蘭四港而已，比港係法國地中海上第二最大之軍港，其重要僅次於都倫。現十港已盡入盟軍掌握矣，而阿比兩港之收獲，於盟方之遠襲歐陸，貢獻尤大。

阿蘭港爲阿拉吉爾之唯一軍港，距阿拉吉爾與直布羅陀東西各二百五十英里，爲盟軍入直布羅陀在西地中海登陸非洲最近而且最安全之口岸，於北非盟軍之增援上至便。盟方佔據北非地中海東西二段沿岸諸港之後，直接既陷北非殘餘德軍於孤立包圍之地位，如敵人不降則必有被殲之虞，又能與馬爾他與直布羅陀二港取得連絡控制軸心地中海上之一切活動，間接更可增進進攻歐陸之途徑，並能首先打擊軸心最弱之義國，奏效必易，即英相邱氏所謂「打擊軸心下部最弱之肚腹」是也。

(2) 北非西臨大西洋岸之主要港灣 北非西臨大西洋之港口要者有四：即羅巴特，卡薩布楞卡，毛里多與達喀爾是也。以上四港均爲盟軍所控制，其中達港尤爲重要。達港爲法帝國中第三最大港口，僅次於馬塞與哈佛南港，爲法屬西非之第一軍港，於海空均甚重要，能供最大船艦停泊之用，由此起飛去南美巴西需時僅六小時，爲橫跨大西洋最近之點。達港之爲盟方控制，不但北非大西洋岸長達一千七百五十英里，可以高枕無虞，即軸心潛艇在大西洋上之活躍，亦必因之大見減削，反之便利盟方海上航運至鉅。再羅巴特與卡薩布楞

卡之佔領，於盟方在東大西洋空防警戒，起落供應上便利尤多。且卡薩布楞卡乃摩洛哥區之經濟首府，居民二十五萬，商業繁盛，並具軍港之設備，為英美供給北非軍運之最近港，佔此港後，即可免除繞行南非好望角至北非與近東之迂徐困難。查自英國南澳普屯港繞好望角至北非與近東之航程遠在一萬一千一百七十英里，若經直布羅陀地中海僅為三千〇七十英里，近了三倍以上，若經由羅巴特與卡薩布楞卡二港，長僅一千二百英里，航程之縮短幾近十倍，航程縮短一倍，海運之能力便隨之增加一倍，其於戰事供應影響之大，於此可知。

三 北非之經濟重要

由突尼西亞看德國崩潰

北非平時經濟價值，以出產無多，原屬有限，惟值此戰期歐陸封鎖之下，北非政局與戰事之轉移，於德國影響至鉅，影響歐陸農產尤甚，例如德國佔領下之法境，戰前年需磷酸鹽肥料共約四百萬噸，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係入口者，而來自法屬北非者竟佔百分之七十以上；再如由達喀爾輸德之植物油年約五萬餘噸，足供戰時德國一千萬居民一年之食用，影響之重大可知。此外北非所產之小麥，大麥，酒品，果實，蔬菜，魚類等食品，輸入法德者亦夥，外如摩洛哥所產之上等鐵砂及鉛均為德國鋼鐵業所急需，且自開戰以來，曾為德國之惟一來源。由此觀之，北非全部之依附盟方，不獨予軸心一軍事上之打擊，實亦為其一大之經濟損失也。

龔德柏

戰爭需要物質與精神。所謂物質，是作戰各種工具：如飛機，坦克，大砲，車輛，船舶都是。所謂精神就是圖志。有物質而無精神，物質是不會發生充分效用的；反之，有精神而無充分物質，亦只能守勢作戰，而不能作大規模的攻勢，殲滅敵人。

有精神而缺乏物質，可以中國為例。中國作戰六年，全靠精神力，而物質力實在可憐得很，所以始終不能驅逐敵人入海。有物質而無精神，在這次戰爭中，法國首先表演投降，現在德國人又在那裏精彩的表演。這幕完結，卻輪到日本人了！但日本人是否也照法德各國人一樣，現在我還不敢斷言。

法國陸軍是世界最強，即其敵人也是承認的。但法國人這次作戰，毫無圖志，把國家的運命，完全付託於馬奇諾防線，所以馬奇諾防線一被突破，全軍瓦解，不可收拾，不到六星期，即舉國投降。這一個有物質而無精神的實例，太出奇了，所以世人還不能完全認識。

我因為受到馬奇諾防線的教訓太深刻了，所以我從那時起，對於戰局的判斷，常常把精神放在物質的前面，而加以估計，因此得到正確的結論，譬如這次突尼西亞的戰局，在上月中旬，許多人都認為德國將抵抗很久時間，但我判斷他可能很快投降的（見本誌第五期）。現在事實證明我的判斷是正確的！

我何以敢判斷德國人會很快投降？德國人不是法國人，若拿法國人的例來判斷德國人，豈不危險？其實，我是拿史達林格勒的德軍來判斷的。因為攻擊史達林格勒的德軍，應該是精銳。這種精銳軍隊，經蘇軍一包圍，陷入絕境，遂全軍投降，連元帥鮑盧斯也甘作俘虜，而不自殺。這不能不認為德軍精神的崩潰。史達林格勒的德軍是這樣，誰能保突尼西亞的德軍不這樣呢！

我判斷突尼西亞德軍會很快投降，有些人當然要認為危險。因為非洲軍團是德國精銳中的精銳。他們是隆美爾由精兵中挑選出來的最

精之兵。他們曾經摧枯拉朽的擊潰英軍，進到亞力山大港西邊，使蘇彝士的形勢岌岌可危。去年十月底英軍雖把他們擊退，但損失有限，他們的力量還未消滅，他們退到突尼西亞，係戰略的退卻，而不是潰敗。到了突尼西亞，他們有良好的地勢，尤其比塞大是優良的軍港，既是山地；又有法國人的強固工事；他們的背後又有海上交通；空中交通更是永久可以維持。這種種情形，苟要抵抗，不知能抵抗多少時間。若以倭寇守宜昌的方法來守比塞大一港，恐怕一年也攻不下。所以許多軍事專家，都斷言不能容易攻下；但事實的表現，則與軍事專家所豫期的相反，而我這非軍事專家倒說中了。試觀美軍向比塞大進攻，德軍就放棄比塞大，向東北角逃竄。美軍於德軍退出兩小時後，始發現比塞大已是空城，乃前往佔領。是比塞大要塞，並未放一砲，即落入美軍之手。德軍於退出比塞大後，若利用崩角山地，還可支持若干時間，但僅五日即全部投降，連總司令阿敏上將亦在其內，還有十幾位將軍。這種神速的投降，實在是出於一般穩健戰略家的意外了！

德軍這樣神速的投降，軍事專家未料到，而我卻猜中了，這不是我比他們高明，不過我把德軍精神算在裏邊，而軍事專家卻把精神忘記了，只算物質，所以有此差別。我這樣說，並不是誇我自己有先見之明，而是我要再作進一步的豫言，說整個德國，也不會抵抗很久，歐洲戰場，很快就會結束！

由史達林格勒德軍的投降，既可以看出北非的崩潰，由北非的投降，何嘗不能看出整個德軍的崩潰。因為崩潰是精神的消失，精神消失是整個的史達林格勒是這樣，突尼西亞是這樣，那末，整個德軍何嘗不是這樣？據路透社阿爾及爾十一日電：從被俘德軍身上搜獲之文件中，得悉北非德軍在崩潰前士氣之頹喪，一九四三年四月愛特少將所發表之命令中，有下列數段：「若干軍官，在緊要關頭，根本未能貫徹命令；若干部隊長官，作戰未能盡力，其名字皆已查出。」在命令中復稱：投降為可恥之行爲，吾人將對其家族報復；並於戰後對其

本人施行報復云云。由這文件中，可證德軍整個精神崩潰，他們一心一意在這機關投降，以保全其生命。至於戰後報復不報復，那是後話，現在根本上顧慮不到。恐怕下令說要報復的愛特少將，也在投降之列。因為他的下令說要報復，不過想多支持若干時間，及到大勢已去，也只得隨眾人投降。「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愚夫人，」這是歐洲國家面臨崩潰時的一般狀態，豈能責愛特少將獨自偷生？所以目前的德軍，已到整個崩潰的境地！

德軍在一年半以前，未遇到強敵時，如生龍活虎一般，當着披靡，何以目前就墮落到這種地步，整軍投降？因為德國是侵略國，他們必須所向無敵，才有前途。在他們未遇到敵人的時候，自信他們的侵略，是一定成功的，他們爲縮短侵略期減少自己痛苦，當然奮勇作戰，所以銳不可當。但在前年冬季，就遇蘇軍反攻而挫敗，那時侯，還希望日本有所成就，以救援他們，而日本卻使他們大大失望。去年攻史達林格勒不下，他們的悲慘失敗，已完全註定。不論任何德人，都完全意識到，他們多抵抗一日，不論自己生命有無危險，而德國國民也多受一日痛苦。他們爲保全自己生命，與減輕德國人痛苦起見，投降是最好的政策。只有希特勒則不顧其投降。所以在史達林格勒，他們由元帥到士兵，整個投降了，在北非，他們由上將到士兵，也整個投降了。這種投降，不是限於史城與北非的德軍，而是全部德國人結束戰爭的手段。在這種情緒下，希特勒就是說戰後報復，他們都知道希特勒及其黨徒活不到戰後，對於他們的報復，當然沒有理會了！

德國人既是要以投降手段結束戰爭，那末，德國目前雖在歐洲據有堅固的陣地，使英美不容易進攻，但英美只須在歐洲大陸，能獲得立足點，由這裏向德國進攻，我想一切堅固陣地，都是無用的。德國軍隊不是投降，就是撤退，英美可以堂堂進軍而入柏林。至於在歐陸獲得立足點，以目前形勢看，也並不是很困難的事。所以歐洲戰場，是快到結束的時候了！

總之目前的德國人，已是喪失國志了！他們雖有堅固陣地，他們不願讓守。對於這種喪失國志的國民，若還以前年開始攻蘇時的眼光看待，那就會差之毫厘，謬之千里。我希望軍事專家，看德國的事，

要把精神力已喪失一點，計算在內，方能正確！

五月十四日稿

三論中國人的組織力

范任

中華民族用仁與禮組織了自己，同時也用仁與禮組織了別人，他的立國精神對內對外始終是一致的。

我們不敢說古代的中國人就有現代的民族思想，但是他們的「華夷之辨」極嚴，我們不能否認他們有相當的民族意識。我們知道，社會科學界很少有絕對的真理，許多重要的學說都只是民族背景的反映而代表真理的一面或一部。即以民族觀念而論，德國爲日耳曼人的舊居，德國人攪雜着異族的血份較少，所以德國學者認爲血統語言爲構成民族的要素，純血的種族便是優秀的民族。法國恰相反，法國原是多數種族雜居的場所，後來因爲長久的共同生活而互相同化而形成一個民族了，所以法國學者認爲共同意志是民族的構成要素，優秀的民族必定有其統一的靈魂。我們中國民族的背景與德法兩國的都不同，他的最大特色就是他很早就有一個完美的燦爛的文化，而其四周的民族則都沒有。比方，中國很早就有「聖人」出來，制定倫常風俗，「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而夷狄則「無父無君」，「貴少賤老」，「反先王之道」，「強而無義」，「獸聚而鳥聚」；中國「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台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醕，治其麻紛，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制，」而夷狄蠻貊則或「被髮文身」，或「雕題交趾」，或「被髮左衽」，或「被髮衣皮」，或「衣羽毛穴居」，或「不火食」，或「不粒食」，而且又

「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又「無諸侯幣帛饗養，無百官有司」。我們已經說過，倫常風俗，文物制度，都是禮，因此中國人與異族的不同是禮的不同，更嚴格點說，是有禮無禮的不同。春秋之義，「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近乎中國則中國之。」可見中國的華夷之辨，不在血統，不在語言，不在共同意志，而在乎禮。如果德國的民族學說是唯「物」的，法國的民族學說是唯「心」的，我們也可以說，我們祖先的民族學說是唯「禮」的，禮是文化的表現，而文化又是人的產物，因此我們又可以說唯「禮」的民族觀也就是人本的民族觀，它不像唯物論的民族觀那樣扁狹，又不像唯心的民族觀那樣空疎，這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天才底瓶造，最低限度也可以與現代德法兩國的學說鼎足而三。

與「華夷之辨」同樣重要的一個觀念是「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前者本於禮，後者則本於仁。大凡一個民族少和異族接近，便很容易養成「夜郎自大」的習慣，否認異族的人格，而終於形成民族的自私，德國今日的日爾曼族至上主義未必不是受了過去少和異族攪雜的影響。反是，如果一個民族多與異族接觸而吸收其血統與文化，則其眼界擴大，易於承認異族的人格，古代羅馬人之能發現超越種族的人之要素而逐漸擴張其法定的人權至於被征服的人，主要原因是由於他和異族接觸頻繁的結果。關於這一點，古代中國人與古代羅馬人有些相似。王制裏所謂「五方之民皆有性也」，本可以有兩種

解釋：一個解釋是「因天地寒燥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谷，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這種性是「不可移易」的，所以我們不能勉強他，要「修其教不異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另一種解釋就是「天命之謂性」，人同此大，即人同此性，既人同此性，則雖然是戎夷，也可以理喻，可以德化，所以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所以「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所以聖人「施及蠻貊」……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尊親，而且，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國」，都成了聖人，可見蠻夷戎狄，不特可以感化，還可以出聖人，所以我們要「修其教」，「齊其政」，以培養他們的品德，發展他們的天才，提高其人格。

由於唯「禮」的「夷夏之辨」的觀念，便產生防止「變於夷」，防止「蠻夷猾夏」的態度，與「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的行為；由於「五方之民皆有性」的觀念，便產生「用夏變夷」，「有教無類」的態度，與「修其教」，「齊其政」的行為。前者是威服，後者是德化，但不論是威服或德化，都發生了組織的效能。我們綜合中華民族組織異族的手段，重要的不外下列數種：

第一是征伐。中華民族向以和平主義見稱，我們論其與異族的關係，劈頭就提出征伐，也許有人會覺得奇異。但是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我們知道，一個優秀的民族，在未創造文化之前，一定先要爭取足夠的生存空間。任何民族都是如此，我中華民族又何獨例外？「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擒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伯天下」，蘇秦所說的這一聯串的事實，大抵都是有民族關爭的意義的；此外，周公封魯，太公封齊，在初期幾乎沒有一天不和異族關爭，而春秋戰國時代，邊區諸侯如秦，如晉，如燕，如趙，也沒有一天不向異族爭取空間；而周公「兼夷狄」，孟子歌頌不遑，管仲「攘夷」，「孔子許爲「仁者」，可見我們的祖先對於異族是非常崇尚武德的。到後來，一

則因爲民族已有相當的空間，二則因爲列國諸侯相互間極盡戰爭之殘酷，所以祭公諫父纘有「先王耀德不觀兵」之說，孟子纘有「力服」「德服」之辨，劉向說：「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自是，中國乃真養成「文化是侵略的，武力是保守的」作風。但是再到後來，矯枉過直，中華民族反而「文化有餘戎事略，銅蛇荆棘不勝愁」了。我們劈頭就提征伐，一面是尊重史實，另一面也就是要提起盲目的和平論者的注意，不過中華民族的武功固極偉大，其武德尤爲偉大，中國於叛逆，向來只罪首，「罪人不孥」，何況從犯，所以劉向所謂之「加誅」，不過是誅集會，有時甚至於「叛而伐之，服而舍之」，連集會也不誅。中國人從來不像——至少可以說很少像——古代歐洲若干著名的民族，每征服一個異族，便將其人口屠戮淨盡，或擄掠迫爲奴隸。通常他戰勝了一個民族，總是從寬發落，教化之，撫育之，使之樂爲我用，齊魯之於夷，秦晉之於狄，都是很好的先例，久而久之，他們自然會接受中國的禮制，薰染了中國的仁愛精神，自身既有了組織，同時也變爲中華民族之一部了。所以征伐也是組織異族的一種手段。

第二是招徠。招徠是用精神感召或物質利益引誘異族的人，個別地或成羣地到中國來居住，逐漸變成中國人。本來，中國的文化高，生活優裕，這個事實就足夠吸引異族的人傾向中國；而中國儒家所主張的仁政又將「柔遠人」，「懷諸侯」列入「九經」之中，他們所指揮的招徠的手段是「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是「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周禮裏有所謂「遠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我們試想，文化低的異族本來就覺得中國是樂土，你再這樣招待殷勤，他們自然是「既來之則安之」了。他們既已「安之」，我們又「齊其教」，「修其政」，則他們自然就接受了我們以仁禮爲精神的組織。周秦以來，四周的民族這樣歸化到中國的很多，有些人如金日磾，僕固懷恩，李克用等曾替我們立過大功。但是也有些如晉

之五胡，唐之安祿山等曾爲禍於我國，所以有許多先見的人如江統就發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警語，主張「徙戎」。然而，由於自然環境與傳統的立國精神，中華民族彷彿是天賦了同化四周異族的神聖使命，所以江統一類的人，儘管疑懼，儘管反對華夷雜居，而歷代君主依然致力於招徠，四周的異族也依然踴躍歸化。站在民族組織的立場上說，這始終是中國史上一個極重要的現象。

第三是開發。在古代中國的四周，有許多蠻荒之地，其人民這度着無文化無組織的原始生活，中國人憐憫他們，便有許多仁人志士自願到他們那裏去，向他們輸灌「中朝」文化。這一類的例子，最著名的在古代有箕子到朝鮮，太伯居吳，在近代有阮氏到安南，鄭氏到暹羅，朱舜水到日本。那些可憐的人民見着「中朝人物」，儼然天神下降，或奉之爲王，或尊之爲師，一切政令或教諭，對他們如撥雲霧而見青天，莫不奉行惟謹。就是這樣，中國文化流注到蠻荒的地域了，無組織的人羣也有了以仁與禮爲精神的政治組織與社會組織了。到後來，爲着加強中國文化的吸取，他們又不斷派人到中國來留學，我們也不斷地派人去宣撫。其結果，就文化方面說，那些小國的一切文物制度，簡直是中國「具體而微」，朝鮮在古代有「君子國」之稱，可見其受中國禮教的陶冶之深；就民族關係方面說，他們或者變爲中華民族之不可分離的一部，古代的吳楚都是這樣演化的，或者成爲中華民族的拱衛者，如朝鮮，如安南，如暹羅，直到近百餘年纔在政治方面脫離了中國的範圍。

第四是操縱與羈縻。這是指那些受中國文化較淺而具有獨立規模的異族而言。中華民族對付這些隣國的方法，當然也不外軍事和外交兩種。軍事結果已見前述，現在單說外交。中華民族外交的主要方式有二：一個是「以夷制夷」，使相隣的各國，互相攻戰，互相牽制，而坐收漁翁之利，這種外交政策是現代英國所最慣用最善用的。其結果良否，完全要看自己的國力如何。如果國力強盛，則頗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漢代呼韓單于休屠王之歸順，西域三十六國之平服，都是

這種外交政策的成功；反是，如果自己國力不強，而專靠利用外力來保存自己，則鮮不受「拒虎進狼」之禍，宋的亡國，就是這種外交政策的失敗。另一個外交方式就是羈縻政策，通稱是中國君主與異族結爲婚姻。這種辦法在歐洲也常運用，但是歐洲人的姻親觀念沒有中國人的深，所以產生的效果也不如在中國。漢以前，大抵都是中國的諸侯王娶異族女子爲妻妾，往往因此得着異族的奧援；漢以後，大抵都是中國公主或宗女「下嫁」異族首領而使之寧貼。這種政策，在政治上或成或敗，沒有定準，但在文化上卻往往有很大的成就，因爲異族首領大都以娶得中國的公主或宗女爲榮，婚姻關係足以促進其向化之心，假使這下嫁的公主或宗女如唐文成公主能運用這種心理，則其所收到的效果不在仁人志士開發蠻荒之下。

第五是同化征服者。我們已經說過，中國自宋以後，過於「右文」，常是「武功不競」，所以在政治上兩度亡於異族，這在歷史上誠然是絕大的悲劇，因爲每次亡國，犧牲都極慘重。然而，自民族立場而言，中國每亡國一次，便同化一個異族，擴充一次版圖，這又不能不歸功於仁與禮的立國精神。已經有人注意到：異族之入主中國，完全是憑武力，所謂「馬上得之」，他們要想統制中國就非用中國人不可，比方，符堅之於王猛，石勒之於王賓，得之則興，失之則亡，於是論者多以爲華族的組織力比異族的組織力強。實則這不是種族的問題，而是能否抓得住仁與禮立國精神的問題；假使一個人能把握立國精神抓得住，如元之耶律楚材，清之乾隆，則雖然是異族，也能在中國維持其統制權，否則，他如果抓不住仁與禮，如項羽，如李密，則雖然是中國人也不能統制中華民族。又有人認中華民族之同化力完全出於人口的量，以多數同化少數自然易於成功；實則這還是文化的質的問題，假定征服者文化高，則少數的人也可以同化多數，這種例子在世界史上屢見不鮮。過去在中原建國的各異族，其人數固然比中國人相差遠甚，但是，我們相信，他們縱然人數比我們多，其結果一定也要被中國人同化，因爲以仁與禮爲中心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卓越的文

化之一，他們既沒有更卓越的文化來代替，便非接受這原有的文化不可，否則便不能長治久安；他們既接受了原有的文化，也就是機械式地加入了我們以仁與禮為精神的民族組織。異族統治者之在中國，其接受文化之多少，與其統治權的久暫是成正比例的，其統治權的久暫，與其同化程度之深淺又是成正比例的。比方，蒙元沒有能徹底接受我們的仁禮精神，所以在中國未能長治久安，終於被逐出王墓，滿清能徹底接受我們的文化，所以他們在中國的統治權也維持較久，其結果也便是徹底被同化，「滿族」已成為歷史上的名詞了。

同化，這是中華民族發皇滋長的一個極要的泉源，上述組織異族的五個不同方式都趨向於此。或者有人可以說，同化並不就是組織。但是我們的意思是：就民族立場而言，同化是組織的最高境界，因為普通的組織只是機械式的，經過同化的組織則是機體式的。機體式的民族組織，在過去很少民族能夠做到。希臘人專注重智慧的發展，其民族內部始終沒有過完善的組織，所以一百多年的內戰終於使希臘覆亡；羅馬人的組織是很堅強的，其所征服的異族也非常之多，所擴張的國境也非常龐大，但是這複雜而龐大的帝國，全賴權力與法制去支持，其統一是一是外燦的而不是內發的，「那只是一個無筋無脈的大軀體，完全用行政的繩索綁紮起來」，（見杜芮 Dury 著羅馬史）一經打擊，便崩潰而至於不可收拾了。所以以希臘精神立國，可成而不可大，以羅馬精神立國，可大而不可久，惟有以中國的仁與禮的精神立國，纔既可以成，又可以大，又可以久，這當然值得使我們中華民族自豪。

我們相信，中華民族由於特殊優越的天然環境以及特別悠久的歷史經驗所孕育所培養出來的這個仁與禮的精神，匪特在過去曾使我民族滋長繁榮，撓而不折，將來還可以使我民族發揚光大，領袖羣倫；匪特在過去曾使東亞各民族由蒙昧而進於文明，將來還可以使全世界的民族由小康而進於大同之治。此次世界大戰，正是仁與禮，禮與亂的一個劃時代的戰爭。中英美蘇之聯成一條陣線並非偶然，因為美蘇

在他們博大優厚的自然環境裏也漸漸變成了一種仁愛的精神，英國因與異族接觸特多，也漸漸開始認識並尊重異族的人格，惟有具有這樣的精神與認識的民族纔能聯合起來，肩負起推進人類文明的使命，也惟有具有這樣抱負的民族纔能聯合起來，掃除文明的障礙，膺懲人類的罪愆。中華民族曾為此次義戰的急先鋒，將來盟國勝利之後，他將貢獻其仁與禮的精神以改善國際上民族的關係，殆屬毫無疑義。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中華民族在執行其建設世界秩序的使命之前，必先檢討自己，建設自己。仁與禮的精神固然是人類的階元，萬世不變，但在實施方面，眼前尚有無數的問題。我們已經說過，仁與禮的實施，是要以義為原則的。「義者宜也」，就是「因時制宜」，所以禮記裏說：「禮，時為大」，又說：「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根據這個原則，我們對於當前的許多道德信條，社會制度，凡是由舊時代遺留下來，如「三綱」，如「五倫」，如「六藝」等等，都要予以徹底的估價，全盤的檢討，決不能抱殘守缺，補苴罅漏，更不能盲從曲解，牽強附會。我們知道，中國固有的許多理論政策，倫常制度，雖皆出於仁與禮的精神，但是大部分都是針對漢以前的情勢剏制出來的。自魏晉以後，生齒日繁而猶禁巧抑末，邊患日急而猶黜武崇文，其結果，衣食不足，倉廩不實，禮儀反促成虛偽，士氣銷沈，國防虛弱，仁愛也只是口頭禪。這已經有不能因時制宜之憾。現在情形更不同了。現在，我們所接觸的民族已經不是未開化或半開化的部落，而是文化程度極高的列強，他們所用來和我們競爭的已經不是弓箭或鋤犁，而是飛機大炮和萬能的機器。這種新遭遇將決定我們的生產方式和社會組織，生產方式和社會組織又得決定我們的行為標準與道德信條。我們常說，自然演進，先物質而後精神，文化革命，必先精神而後物質。因此，我們的當前急務，是要第一，將仁與禮的宇宙觀人生觀，過去用神學與玄學解釋的，改用科學整理出來，因為不如此便不能滿足現代人的需要；吸引現代人的信仰。第

二，建立以民族爲中心的新道德，以代替以家族爲中心的舊道德，因爲不如此便不能集中現代國民的意志和行爲。第三，建立積極進取的社團與精密的權力的政治體制，以代替過去消極保守的血緣與地緣組織和支離散漫清淨無爲的政體，因爲不如此便不足振作精神推進建

古代政治上的揖讓與和平

尙書新論之一

中國自昔號稱禮義之邦，個人既貴無爭，政治亦崇德化，唐虞揖讓之盛，至今傳爲美談。但此所謂揖讓者，初非限於應對進退之節；而欲養成這種揖讓的風氣，則尤首在禮樂之修明。蓋禮以誠中，樂以和外，然後對於一切事物的表現，乃能從容中道，各協其宜。茲請先言禮與治化之關係：

皋陶謨云：「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此爲古代注重禮治的說明，蓋禮之與理，義可通假，物有條理，本屬天然，而其表現於國家者，則曰紀綱，適用於人事者，則曰禮節。五禮包括「吉凶軍賓嘉」各項儀文，殆爲人生日用所必具，故執政者務須各謹其用，保於有常，如或乖常，便當修而明之，俾無差謬。

舜典云：「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

由於禮之修與不修，可以判明諸侯的恭誠或虛偽。

洛誥云：「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

享是朝享，儀是禮儀，物有餘而禮不足，視爲與不享同，其重禮輕物之情，於此可見。並且天道是「殖有禮，履香粢」（仲虺之誥）

設。上述諸端，尤其是關於道德一項，也許有人以爲是忘本或爲新，然而，這正是「協諸義而協一」之義，正所以激發新的力量以發揚我們固有的仁與禮的立國精神，正所以針對新環境，使我中華民族繼續過去的光榮，組織其自身，並組織其他民族。

（成惕軒）：「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

畢命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靡，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於外，驕淫矜侈，將由惡終」。

職是之故，古人竟對一舉一動，不敢稍涉非儀，致滋咎戾。

顧命云：「思夫人自亂於威儀，汝無以釗（康王）冒貢於非幾」。

虞設「秩宗」（見舜典），周立「宗伯」（見周官），至以典禮爲其專司，禮之有關於治化而爲政府所重視也如此！然自古言禮者，必及於樂，禮以定民志，而樂則以暢民情，記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有樂無禮，國將流於淫放，有禮無樂，亦必失之拘迂，一舉一動，相互爲用，故聲音之道，實與政通。

（益稷）云：「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察）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所謂察治忽者，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必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必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必困。聞聲知政，藉以明其治亂興衰之故，而有所振作，知所改圖，此樂之有裨於政治者。又樂與禮同用之於祭祀（關於禮的方面如所謂「和神人」（見周

官)「禮頌則亂事神則難」(見說命)等等)，而樂因有音聲和節奏的關係，其表達於外的現象，倍極熾盛與雍容。

益稷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賁賁，簫韶九奏，鳳凰來儀」；

又云：「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聞簫韶而鳳凰來儀，聆石磬而百獸率舞，樂之感物，既如其深切，則其安神和人的功用之大，自不待言，故祖考以之來格，羣后以之德讓，庶尹亦以之允諧，洞澈幽明，達於上下，此樂之有裨於人倫者。

而樂的重要作用，尤在其為政府的教育方針：

舜典云：「夔，命汝典樂，教胥子(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這是舜命夔教貴族子弟之辭，自「直而溫」至「簡而無傲」，屬於教育的原理，即視受教者的個性如何，因材施教，直者濟之以溫，寬者輔之以敬，剛者去其很虐，簡者戒其傲慢，補偏養正，使無過與不及之差。自「詩言志」至「律和聲」，則係教育的方法，蕩滌邪穢，陶冶性情，宜其志，永其言，和其聲。喜怒哀樂的流露，動靜言默的修持，一以樂為約束與範圍，而養之以中和之德，豐實以內，充溢祥和，於是鼓音律，音律協調，各有等倫，無相侵奪，薦之郊廟而百神克享，奏之朝廷而萬族以和，是為教育所發生和獲得的效果。

六藝之教，禮樂為先，一個人由幼至壯行，既以明禮習樂為修飾內行之本，一旦服官從政，必能心氣和平，爭端悉泯，而表現其謙退之風。你看虞廷命官互讓的情形，是何等的融和親切：

舜典云：「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禹拜稽首，讓於稷暨皋陶，帝曰，兪，汝往哉」。

又云：「帝曰，疇咨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於益暨伯禹，帝曰，兪，往哉汝諧。」

又云：「帝曰，疇咨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

又云：「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於夔龍，帝曰，兪，往欽哉」。

不求自顯，務在舉賢，退避再三，然後受命，這種遜讓的風度和精神，不知現代官場上那些「赴義不先、攘利恐後」的人，對之作何感想！抑惟具有前面那種遜讓的精神，纔能收着下列的功效：

堯典云：「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

益稷云：「禹曰，兪哉，帝光天之下(光其德於天下也)，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周官云：「推賢讓能，庶民乃和」。

和庶民，光四表，皆由在位者一念的克讓而來，這亦足徵提倡揖讓之風的如何重要了！

上述的禮樂之盛，揖讓之美，都是屬於國內政治方面的；而一個有讓德的政府，他的對外政策，一定反侵略，尚和平，所以堯典則曰「協和萬邦」，顧命則曰「變和天下」，再看古代列為八政之一的賓禮(洪範云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對於屬國和遠人，直待之如賓客，如所謂「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見舜典)的情形，即可想見當日壇坫之間，實在充滿了一種和平的氣象。而且在執行對外政策的時候，一再以「柔遠」為言(尚書稱柔遠者凡三一見舜典一見顧命一見文侯之命)，柔之為義，即用一種極和平的方法，使人潛移默化，心悅而誠服之，絲毫沒有強

迫和欺侮的意味！除了懷柔以外，有時還須盡其輔導的義務。

顧命云：「王（成王）曰，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於艱難，安勸大小庶邦。」

安而撫之，勸而導之，祇盡扶持的責任，絕無侵略的野心，這真深深地表現了泱泱大國的風度！同時，古人在政治上輕於責人，厚於責己，執政者的一言一行，即足以影響萬方的視聽，風俗的純渾。

太甲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因此，欲期「遠人」的嚮往歸依，首在反諸其身，而尤須注意左列各點：

(1) 尚德

舜典云：「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大禹謨云：「惟德動天，無遠弗届」；

仲虺之誥云：「德日新，萬邦惟懷」；

旅獒云：「明王慎德，四夷咸賓」；

梓材云：「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

(2) 治道

畢命云：「三后協心，同底於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

(3) 推誠

大禹謨云：「至誠（以誠感物曰誠）感神，矧茲有苗」。

(4) 勤政

大禹謨云：「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蔡仲之命云：「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

(5) 慎令

周命云：「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惟休」。

(6) 遏亂

武成云：「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

貊，罔不率俾」。

(7) 輕貨

旅獒云：「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

由此可知「三苗不殺」「西戎即殺」（見禹貢）等等事實，皆由德化的感召而來，絕非武力的征服所致！先哲謂言忠信，行篤敬，方可行於蠻貊之邦，亦正同此義。此外，古代優禮亡國的臣民，亦猶見其寬大之懷，敦厚之德。

微子之命云：「王（成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多士云：「王（成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於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於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於茲洛，爾小子，乃與從爾遷」。

以上是成周安置殷代遺臣和頑民的故事，作賓王家，垂休無窮；不念舊惡，惟德是用；有爾土，安爾事，宅爾邑，繼爾居，殷勤撫字，一視同仁，這種寬容博愛的精神，較諸現在那些黷武國家，侵佔他人的領土，奴役異國的人民，必欲置之萬劫不復而後已者，真是相去天淵，不可同日而語！

或者有人因爲古代重視和平的緣故，遂疑右文輕武，殆爲今日的中病之因，積弱之源。其實這種見解，未免似是而非，中國幾千年來的立國精神，雖以和平爲其最高原則，但於勤修文德以外，亦未嘗輕廢戎事，漠視武功，武成上面有過這樣的話：「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畏力不就是用武的最好說明嗎？八政之名，師居其一；六極之禍，弱在其中（均

見禹貢」；並且政府設有專掌兵權的司馬（周官云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備有陳列武器的東房（顧命曰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以大事爲有依（大誥云我有大事休蓋謂戎事也），視有備爲無患（說命云有備無患），其所謂「申憲郊圻慎固封守」（見畢命）的意義，即在謹圖防於平日，弭外患於未形；那末，一遇存亡危急之愁，爲了延續國命，保障和平，自然不諱言兵，亦決不辭一戰！我們祇要看看下列的記述，便可知道古代對於武德的尊崇：

大禹謨云：「帝（堯）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仲虺之誥云：「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湯）勇智，表正萬邦」。

伊訓云：「惟我商王，布昭聖武」。

不特崇拜個人的武德，而且着重實際的戰爭：

泰誓云：「我武維揚，侵於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於湯有光」。

武成云：「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途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君奭云：「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威劉厥敵」。

立政云：「其克詰（治）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

周官云：「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

康王之誥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張皇六師」，足徵規模的壯偉，「血流漂杵」，可見殺傷的衆多，「陟禹之迹」，「于湯有光」，這簡直是對戰爭的歌頌！至於過去的戰爭史實，如禹征有苗、啓征有扈、成湯放桀、武王伐紂等等，見於尚書的記載中，茲不贅舉。

不過兵者究係危事，必不得已而後用之，故古人對於動武興戎，莫不戰戰兢兢，特加戒慎。

大禹謨云：「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說命云：「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

萬一用兵，則須知己知彼，以期必勝。

泰誓云：「同力虔德，同德虔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即在確定作戰的目的，係以「弔民伐罪」爲歸，必須深得輿論的同情，羣衆的擁護。

仲虺之誥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後來其蘇」。

武成云：「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勳，用附我大邑周」。

太甲云：「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後來無罰」。

東征西怨，如大旱之望雲霓，簞食壺漿，若釋子之依慈母，有了這種熱烈嚮附的民心，自可決定戰爭前途的勝利。但是殘暴一經撲滅，戰局即告終了，便當速予復員，以恤民困。

武成云：「厥四月，哉生魄，王（武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兵禍絕息延長，民生務貴養息，戰爭祇是覓取和平的手段，和平則爲戰爭最後的目的，「止戈爲武」，「佳兵不祥」，這一點，卻又與現代帝國主義者的專恃武力，不講和平，迥然有別。

從上列的敘述，看到古代政治上的揖讓與和平，我不禁發生一點小小的感想，就是現在俗尚浮薄，士習奔競，沽名釣譽，但便私圖，攘往熙來，寧知揖讓？考其所以致此的原因，實全在於禮樂的廢弛和崩壞，威儀之盛，已漸失於渙官，淫靡之聲，或更勝於鄭衛。這樣，人慾如何不見橫流？民德那得日趨敦厚！所以，蔣委員長於民國二十

三年，即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特別着重禮義廉恥的實踐篤行，以期挽救人心，轉移習俗。同時，對於樂教的推行，亦復非常重視。他說：「禮是立身處世的根本條件，無論古今中外，實不可以須臾離。我們所謂禮，要做到無論飲食起居，言語舉止，無時無地不是有規矩，守秩序。……樂是我們救國教民一種基本的學術和修養，好的音樂可以陶冶性情，振作精神，慰藉勞苦，和樂心志，使人生活調暢，情趣優美，無形養成個人高尚的人格與社會純正的風俗，其重要不特關係個人的修養，且可影響於社會國家之興替。」於此可知禮樂價值的崇高及其功效的宏大了。我們今從施政教民，應當「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提倡雍雍穆穆的雅音，養成規矩矩的態度，舊染汚俗，咸與維新，然後纔能禮樂興，俗美化淳，蔚為劃時代的盛治。至於酷愛和平，更是中國自古以來一種極好的道德，孫中山先生曾謂：「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說：「中國如果強盛起來，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對於弱小民族要扶

如何實施憑券購物制

龍大均

持他，對於列強要抵抗他，我們今日在沒有發達之先，立定扶傾濟弱的志願，將來到了強盛的時候，便要把那些帝國主義來消滅，……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種天下為公的博愛精神，真是發揮到了極點！但在大同世界尚未實現以前，首須實行民族主義和恢復民族地位，如果民族主義不能實行，民族地位不能恢復，根本國家就喪失了獨立自由的資格，無從立足於世界列強之林，還談到什麼大同之治呢？而一談到民族主義的實行和民族地位的恢復，又首須注意國家的武力建設，以堅強的力量求得絕對的安全，古人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也正是這個道理。蔣委員長更很明顯的告訴我們：「現代國家的生命力，就是教育經濟和武力」，我們現正從事歷史上五千年來所未曾有過的抗倭大戰，一方面是為爭取民族的生存和獨立，一方面是為維持人類的正義與和平，由一隅的戰火釀成萬國的烽煙，其舉義旗，預操勝券，正向未來的大同社會步步推進之中，而其最根本最切要的先決問題，還在積極鞏固自己的國防，充實當前的武力，為全民作保障，為萬世開太平。

關於憑券購物制應否在我國實施一問題，我在本刊第三十九卷第二號已經討論過，並表示肯定的意見。自然，那篇短文還沒有充分地把這個問題解答明白，最近看見有些人提出反對的言論，以為「普遍實施這個制度，不但不能節約消費，而且結果反會增加消費；因為人民的所得不變，而物品的價格較低（這派人是主張低價供應的），從前不能購買的人這時候也可以買了，從前本不需要某種東西的人，這時候也可以代旁人買了，結果無形中增加了一筆消費，這當然是不利的，況且以中國的地闊人多，統計的殘缺，基層政治的不健全，我們

誰能擔保沒有浮報私吃？誰能擔保供應無缺？」（見新經濟第八期一四四頁）。這番議論，看來似乎很有理由，可是仔細思想一下，這些理由實在完全踏空，因為他認定什麼東西都實行憑券分配制，連生活不必需要的物品都包括在內，所以人民因購買力增加，亦就需要增加消費增加了。要是明白憑券購物制的運用，僅以最重要的日常生活必需品為限，這些物品，對於國民健康的維持，無論過去和現在都同樣是必需的，自己和他人都同樣是非購買不可的，那麼，上面的反對言論，便成為「無的放矢」了。自然，在多數民衆消費不足的國

家，實施憑券購物制，也許結果會增加消費，然在這種情形之下，使多數民衆能滿足生理上正常的需要，而避免發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這正是合理分配，這正是維持一個國家戰關力所不可少的措置，怎能說：「這當然是不利」呢？何況實施憑券購物制，本可拿平時最低的生活程度作標準，而壓制享用過度的闊人生活，其結果絕不會增加全體的消費量，那是無可疑的。總之，像這樣的反對論調，並沒有針對着這個制度的本身，而是只說明實施不得其法，便會產生與預期相反的結果，不但不節約消費，而且反而增加消費。於此可見實施技術的重要。至於實施後，有沒有「浮報私吃」，能不能「供應無缺」，這都要跟着辦法如何而定，更不待說了。所以當然要解決的，不是應否實施，而是如何實施的問題。

限於篇幅，我不能在這裏就如何實施憑券購物制，作個詳細的方案，可是，關於施行的步驟，竊以爲當有如下之措置：

(一)實施的主體 這是辦事的機構，事前必須有充分的調整，使之組織嚴密，方能指揮靈活。在東方復刊號，「如何實施加強管制物價方案」一文中，我曾提出機構改造的建議，主張設物資部專司重要民生必需品之生產、管制、徵購、儲藏、與大量定貨，而社會部則統率各城市的社會局、社會服務處、以至消費合作社或零售商店，辦理憑券配給。物資部專管民生必需品的供應，社會部專管民生必需品的分售，而這些分售機關（合作社或商店）則憑所收入的購物券向物資部主管機關照數領購下次分售的物品（自然應有一些多餘）。這樣分工合作，互相對核，既可避免作弊，更能增加效率。

憑券購物制自然要使用一種購物券，印發這種券當由物資部集中辦理，但怎能發給消費者使用而不發生流弊呢？最好由地方銀行代發於鄉保甲長，通知消費者來領，同時由地方政府及法院派人監視，並由警察維持秩序。每一個城市可分設數個「憑券購物警察局」，由地方政府、法院、銀行公會、商會等機關，和團體派人組織之，其職務概不支薪。如逾一定期間，尚未領到購物券的，可持身分證向「警察

局」伸訴請求查明補發。「警察局」應隨時派員抽查戶口，核對發出購物券的實數，以檢舉浮報冒領的罪犯，依法嚴懲。自然，每一個城市的社會局亦可添設一個「考核科」，將發出與收回的購物券總數和當地領取身份證的居民總數，及各區領購與分售物品的帳目，互相核對，而發覺誰是作弊的罪犯。物資部的主管機關亦然，如此逐層考核，作奸犯科，勢將沒法漏網。懲一儆百，誰敢不奉行法令呢？

(二)實施的客體 這是指實施這個制度的物品而言。在準備施行之前，第一個問題便是選擇那幾種物品。爲着凍結民衆的購買力起見，實施的範圍最好力求普遍，但由於管理費用的浩大，與物品供求情形的差異，仍不能不有所選擇，而選擇的標準，首當着眼於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必需品，（那是不論貧富，爲着維持健康，都非購買不可的。）其次，當注意其供應的數量，要是一種物品來源甚爲豐富，而且沒有囤積居奇價格狂漲的現象，除非另有目的（例如美國因限制汽車輪胎的消耗而實施汽油憑券分配制），自沒有實施憑券購買制的必要。例如英國，麵包和馬鈴薯都屬於限價的物品，而無須憑券購買。反之，一種物品對於日常生活雖極爲重要，但因來源過少，不敷全體消費者的分配，自不能施行普遍憑券購買制，例如在英國，牛奶、橘子、雞蛋等物，只限於孕婦、乳母、病人、和六歲以下的兒童，纔得領取特別購買券，而非人人都得有此口福。所以選擇實施的客體，自當視乎物品的效用與供應如何以爲斷，運用之妙，貴能適應環境。就實際的辦法而言，各國所選擇的物品亦不盡相同。上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實施憑券購物制的僅有白糖一種，法國僅爲麵包與白糖，英國則擴大到白糖、奶油、人造奶油、脂肪、肉類、糖漿、茶葉、乾乳酪，而德國所施行的其範圍較此更爲廣闊。這次世界大戰發生，英德等國實施這種制度，幾乎包括普通食用品和衣物的全部。美國參戰雖遲，然實施憑券分售制的物品從去年五月起便逐步增多，初僅汽油、白糖、咖啡、次爲皮鞋，而從本年三月底起會擴大到肉類，及罐頭、瓶裝，或乾藏的食品共三百種，換句話說，百分之九十五以

上的食物，已採行憑券購買制了。

(三)實施的程序 憑券購物制的「物」既已選定了，進一步要研究「券」的問題。關於購物券的運用，各國已實行的計有下列五種：

(1)單一式 每種物品採用一種券（形式如公債票），而每券印成兩部，甲部為基本票，上記號碼，領用戶主姓名，住址，全戶人數，每次購買量等項，乙部為消費票，由數十枚小方格所合成（形如公債票的息票），上印號碼，使用日期，物品數量，用時由購物人簽名，並填寫住址。每購物一次，即由售物人剪下一枚，並彙集成摺，憑此種券所代表的物品數量，向主管機關領購下次分售的物品。

(2)混合式 格式同前，惟憑券一紙，購者得於數種物品之中選擇其一，例如燃料分售，購者得選擇木炭、煤炭、或木柴。

(3)計值式 格式同前，惟每券代價若干元的物品，不限分量，祇限價值；例如英國對肉類的分售，即採用這個辦法。

(4)特記式 消費者須將已用到不堪再用的破舊物品繳呈主管機關，經驗明屬實，然後發給購物特許券。德國現行皮鞋、膠輪、以至外套、衫、褲、被單、地氈等物的分售，即採用這個方式。如目的在於節約消費，則這個方式最適用於用，惟辦理手續過於麻煩，是其短處。

(5)計分式 這種購物券每券可印作兩部分：甲、為基本票，其內容與單一式的基本票相同。乙、為消費票，其形式很像郵票，每套可多至一百九十二枚，每枚消費票印上一個數字，可分為壹、貳、伍、捌等四種（每個數字即表記分數），另印上干支字樣（代表使用有效期間，例如甲壹，甲貳，甲伍，甲捌，這是說在甲期間（某月的第一週）要使用這些票購物，共計十六分可購標記十六分的物品（數種物品湊足十六分亦可），全家各人購物券的分數，亦可湊合作購物之用。逾期不用，則成為廢紙。何種物品，各值若干分，甲，乙，丙，……代表那個月份的第幾星期，均須由物資部隨時公佈，而各零售商店或消費合作社更須在門外用大木牌標帖這些佈告，使人人對於實施的辦法，都能夠充分了解。物資部對於某種物品認為來源短少，

應節約其消費，那麼，即宜儘提高這種物品所值的分數；反之，則應減少。並且遇物品供應不敷需求的時候，亦可酌將每組消費票的有效使用期間加以延長，這就等於在一定期間減少物品的供應量。對於消費者那方面，得於若干種規定的物品中，自由選擇其所需要的，並在其購物券所能使用的分數限度之內，於一定期間，購領其應得的數量。凡是供給艱難，需求衆多的物品，其在購物券上所值的分數亦較多，所以選購分數較多的物品，其購買總量將較少，反之，選購分數較少的物品，其購買總量將較多。政府運用這種制度，很有調劑物品供需的效能。

以上五種方式，自以第一和第五種較為通用。在英國，主要食品採用單一式，補充食品和衣物，均採用計分式，在美國，白糖和咖啡採用單一式，而肉類和罐頭食品等項則採用計分式。施行前一種制，消費者須在其住址附近的商店或合作社先行登記，施行後一種制，可以無須這項手續。

無論採用那種方式，在購物券上面均須附印「警告」數則，例如：此券不得出售或轉讓與他人，惟同戶之人得聲明代為使用。拾得購物券須立即送交附近的「憑券購物督察局」。凡服軍役，離境在一月以上及死亡者，均須由本人或其繼承人將所領購物券向「督察局」繳銷。凡偽造、塗改、冒領、冒用購物券者，或違反憑券購物法規定者，處以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根據「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第五條）。這些雖是細節，然必須公佈給民衆「家喻戶曉」，並要嚴厲執行，那麼，誰還敢「浮報私吃」呢？

實施憑券購物制本是國民消費軍隊化的一種辦法，一個城市的居民就等於一個集團軍隊，應在給養方面，作全盤統籌的計劃。上述「計分式」的辦法，本是拿破崙一八〇九年在軍中實施的制度，現在已給各交戰國普遍施行於民間了。我們應有「國民生活軍隊化」的決心，那麼，如何實施的問題也就不難迎刃而解了。

四月十五日。

限價政策之檢討

姜鵬翊

一 物價問題的嚴重性

戰時各國，物價一般的呈現着上漲的趨勢。此次世界大戰期內，參戰各國的物價，都開始上漲，以英國而論，一九四一年三月較開戰前即一九三九年八月高漲百分之五三，美國的物價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即美國開始參戰後二月，較上年同月期間增加百分之二十。即軸心國家，亦是如此，德國一九四一年三月的躉售物價指數較一九三九年八月增高百分之一〇·三，日本同時期較戰前昇漲至百分之三十五。物價上漲的原因，主要的不外下列二項：一通貨膨脹，二是生產減少，尤其是一般消費品生產減少。這二項都是刺激物價上漲的氣焰。但是英美是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平時對於物資多少有統制的準備，所以一臨到戰時，對於物價的控制亦比較容易。

當前作為我國經濟問題的癥結的，無疑的要算是物價問題了，物價問題的嚴重，影響着戰時經濟的基礎，而且妨礙着國民經濟的發展，人人都感受着物價暴漲的威脅，同時社會的購買力也愈趨低落。雖然有少數人為物價上漲而歡躍，藉物價的上漲而獲取更多的利潤，但大多數的人卻因此而感到生活的沉重壓迫。

我國物價的變動，始終是成直線式的上漲。戰爭爆發的初期，全國的物價一般雖較戰前為漲，但其上漲的程度是比較緩和的。大體說來，這時期內，物價是受匯價的影響，外匯市價的跌落，便進口物價上漲，凡外來原料成品一受匯價的波動，首先開始迅速狂漲。物價一經上漲以後，即不易下跌，其上漲的趨勢則較匯價的下跌尤為堅定而持續。自歐戰發生以後，物品的囤積操縱開始抬頭，初時以糧食為中

心，繼而漫及於一切日用物品，物價漲風遂扶搖直上，而游資又正從外匯的投機中退縮回來，羣趨於物資的囤積投機上面，各地物價於是狂漲不已。太平洋戰爭發生之後，外來物資來源缺乏，益以外逃資金的大批回流，使物品囤積愈厚其力量，囤積之風日趨囂張，而物價也愈漲愈高。同時通貨與物價互相競賽的循環現象，亦愈演愈烈，這種現象很易造成深刻的經濟危機。

戰時物價的變動，基於商品自身價值變動的法則，勞動生產性因為受到戰爭的破壞而低落，使商品價值增大，同時表現於價值的生產費用也較戰前增加，這樣商品的價格不得不騰貴。另外，戰爭的大量消耗，使物資的需求特別增大，而供給方面則生產的速度不及戰爭消耗所需求的速率；而況生產的主要方向又在軍需工業上面，一般消費品的生產又迫着相對的減少，這種供求的失衡，使商品價格的騰貴，超過其價值增大所應有的程度。

這些戰時物價上漲的因素，在我國當前的物價變動上也同樣可以說明，不過我國戰時物價上漲，尚有它的基本因素，這裏我們將那些基本因素稍予以敘述：

第一是由於通貨的增發。普通引起物價上漲的主要因素，總不會超出通貨膨脹這個範疇。戰時各國，因為要應付大量軍費的支出，除靠租稅與公債以外，主要是仰仗於發行鈔票來應付，市面上的通貨數量遠超過社會所需要的數量，於是物價上漲，幣值下降。軍費支付的數目繼而跟着物價高漲而擴大起來，發鈔數目又隨而增加，物價亦相繼而更形高漲，如此循環下去，不可避免的要形成惡性膨脹。戰時國家雖然因為要應付財政巨額的支出，都要走到通貨膨脹的道路，但是

這種惡性膨脹，是要破壞戰時經濟體系的，因此各國都極力設法避免。如美國自從參戰以後，國內的信用膨脹即行擴大，但其應付之方是以增加稅率，對於主要物資予以控制，一方以增稅公債或強制儲蓄的形式使增發的通貨依然吸收到政府手中，他方將物資予以控制使其價格穩定。通貨的增發由發生至回籠的過程，在時間上存在相當的間隔，因此紙幣的價值便不免低落，紙幣的相對價值一低落，便不得不影響到物價。然紙幣能夠經過一個時期終於會回籠，則物價雖然受到紙幣相對價值低落的刺激而上漲，但它不會成為飛躍式の上漲，可以達到它的相對穩定狀態。物價一經相對穩定，則物價與通貨這種互相競賽的惡劣現象可予以遏止。我國抗戰以來，尤其是近年來，無可諱言地是通貨增發了很多，但這些增發的通貨，大部不會以租稅或公債促其回籠，經過一度流轉之後多數變為投機性的工具，流到那些握有大量商品的囤戶手中。我國所發行的公債，全由銀行承購，銀行以折價的利息購進債券，交存國家銀行作為儲蓄的保證準備，而其所領得的鈔票又作為商業放款或商業投資的資金，而銀行的商業放款與投資又大都由囤戶的囤積上活動，獲取囤積所得的利潤。所以發行公債由銀行承購適足以作為膨脹貨幣和信用的基礎。我國當前的通貨所以成為嚴重，就是因為它之去而不返，它落在囤積者的手裏，初以貨幣去購進物品，物品經過一個時期的囤積，再去換得更多的貨幣。通貨積聚在囤積者手中，不能回籠，刺激着物價向上高漲，而物價高漲的結果，使通貨的需要更加增多。隨着幣值跌落而致量的增加，使囤積更展開其活動的領域，使供求更不平衡，使幣值更形下落。我國目前通貨流通的全過程就是如此，這使得物價無節制地上漲，形成它的嚴重性。

其次，物價形成嚴重問題的第二个原因，是游資的趨向於物品囤積，使物資的供需表現其極大的差度，因而刺激物價無底的猛漲。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因此其社會的資金始終是帶着投機的傾向，戰前因為受外資輸入外貨傾銷的影響，民族資本不能發

展，社會上的資金大部變成游資，其活動的範圍以通商口岸尤其是上海為其根據地，其活動的對象則是以公債標金地產作為其勢力的伸展地，抗戰以後，形勢一變，游資的集中地點，不復以上海一隅為限，而蔓延至大後方各主要城市，所追求的對象也改變了目標，暫時以外匯為投機之鵠的，繼而是在物品的囤積上活動，在物品的囤積這點上來說，初則追逐於各項外貨，自糧價開始波動以來，就以糧食為中心而漸次展開於各項日用品必需品乃至凡百土貨，幾乎無一項物品不被囤積。再說游資的構成來源，亦比戰前來得擴大，戰前游資的主要來源是農村流出來的資金以及軍閥官僚所剝削得來的民脂民膏。戰後其來源的主要部門更是多方面的，有從戰區流出來的工商業資金，有從國外逃亡回來的資金，有導因於通貨發行的增加，因為通貨之不能回籠，流入於商品所有者手中，這樣充實了游資的基礎。有淵源於銀行的信用膨脹，造成游資的一個活動源泉。游資的本質是充滿着投機性的，它總是朝着更多的利潤這方向跑，物品的囤積可以刺激物價的上漲，可以獲得豐厚的利潤，因此游資遂奔趨於囤積居奇，造成物價不可底止的上漲。

上面所述促成我國物價上漲的兩個主要因素是互相聯繫而又互相影響着的。我們可以綜括的說一句，通貨的增加表現出物價的上漲，又充實游資的力量，成為游資的一個構成部份。同時游資聚集於囤積居奇上與風作浪，使物價更趨上漲，而物價的上漲則又使通貨的數量增加。所以我們說，游資的趨於囤積物品與通貨的增發二者是交互影響着的，而物價的上漲則又是二者間的一個紐帶。

明白了引起物價上漲的原因，再來一為檢討其在我國當前的經濟機構中怎樣起着腐蝕的作用，嚴重的妨礙着國計民生問題。

首先，我們要指出，物價的高漲是影響着生產的發展。一般工業，尤其是民營的小工廠，因為物價的上漲，使生產成本日益增高，往往生產品一出售後，再欲恢復其原來的生產規模，因受原料人工漲價的影響，已是不可能了。這樣，生產規模越來越收縮，從而促使生

產日趨於停滯。甚至有些廠家，感受再生產之不易，並受囤積利潤的誘惑空掛着工廠的招牌，而實際從事於原料品的囤積。如是一方感着生產之不足，他方加強囤積的力量。這有一點，就是通貨的增發未曾流注於生產事業，而向着商品的囤積流走。這便刺激起來的物價漲風，更使生產受到窒息。有些人認為物價上漲可促進生產，提高貨物售價，實為達到增加生產唯一有效之手段。這完全是沒有了解問題的全貌。通貨膨脹所促成的價格騰貴，不一定對工業資本沒有利益，不過當其進入惡性階段時，物價波動太速，使原料的漲價過於成品，這便使再生產不易，而使生產量趨於萎縮。是工業生產的利潤實際上為商業投機者所竊取，而工業生產者則受其損害。因此我們說，物價上漲迅速，足以妨礙後方的生產，生產的減少是會深刻影響抗戰之經濟基礎的。

第二物價高漲的結果，使國民所得的分配愈趨於不平。一面是地主大商人他們恃着物品的囤積，利用物價高漲以追求作非常的利潤，直接起着物價上漲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們造成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惡化，在這上面，建起他們黃金的迷宮，生活之極度放浪，享受之盡其修飾的能事，破壞着抗戰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則是工農、士兵、公務員、知識份子的生活之日趨惡化，起着極大的恐慌。從表面上觀察，好像工廠在戰後的收入較戰前為增加，實際按物價上漲的速度以分析，其所收入不及戰前。而公務員的薪給與物價指數對照起來，則其落後的程度，直無從比較。這樣在囤積居奇所促成的物價高漲之下，更強化國民經濟中的分化過程。

第三是社會購買力的降低。照理講來，物價高漲可以增高社會的購買力。但在我國，則人民的貨幣收入與物價的漲度相較，遠落甚後。上面一再指出，中國社會資金未曾用於生產事業，它作為商業資本盡其游離的作用，商業資本的過度發展，造成社會分配的極度失衡，固然，少數發國難財的人，他們的購買力是日益增高，生活享受之奢侈揮霍，造成社會之糜爛氣氛。而大多數人士則收入遠落於物價

後面，因此物價的高漲只有逼使社會購買力日趨下降。儘管少數人的購買力怎樣增強，怎樣在浪費其財力，也挽回不了社會購買力衰落的趨勢。社會購買力的低落，直接影響於生產的沈滯，從而打擊着國民經濟的健全發展。

二 限價之提起及其實施經過

物價之跳躍式的飛漲，實為當前我國所發生之最嚴重的經濟問題。不但國民經濟的發展為所妨礙，抑且影響於抗戰的前途。時賢憂之，紛紛提起對策。政府對於物價的應付方針，年來雖亦提出若干辦法，可是大都是枝節的應對，沒有一個具體的控制物價的辦法產生。因此，雖曾施行過一些管制物價的政策，但都沒有收到其應有的效果。如二十八年二月頒佈的非常時期評定物價及取締投機操縱辦法，設立平價機關，就政府指定的日用物品，評定其價格，但因評訂方式係屬於議價還價，是以議而不平，平而不行，毫無強制的效能，因此了無成效可言。其後又施行平價購銷政策，設立平價購銷處，自行購運日用必需品，以平價貨物供應市面，但所表現的則是商業意義大，平價意義小，而所供應的範圍又很狹，對於整個市場中的物價毫未管制，一任其自由起伏，故對於物價的控制可說是未曾起着作用。在糧價方面，於三十年七月正式將全國糧食管理局改為糧食部，對於穩定糧價，調劑糧市，控制糧食這幾點上是盡着相當的成績。但這也僅限於糧食而已，一般的物價仍然是處於放任的狀態。自蔣委員長手訂加強管制物價方案，經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一次大會於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通過後，對於物價的管制可說是正式進入具體的解決途徑，方案的重要方針，計有實施限價、掌握物資、增進生產、節約消費、便利運輸、嚴密組織、管制金融、調整稅法、緊縮通貨、及寬籌費用十大項目，方案發表後，全國上下，莫不一致擁護，認為是對於統制物價的一個根本方針。

十一月二十七日十中全會又通過實施管制物價之決議案，決定實

施限價，並以糧鹽價格為平定一切物價的標準。到十二月十七日，蔣委員長乃通電全國，自三十二年一月十五日起，對於民生重要必需品，如糧、鹽、食油、棉花、棉紗、布疋、燃料、紙張等物，以至於運價工資一律實施限價。限價的範圍，普及於全國，首由各地重要都市開始，再次第普及全國城鎮鄉村，限價以三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各地市場各該物品之原有價格為標準，務須達到同一地區、同一時期、同一物品只有一個標準之目的。實施限價以後，應嚴禁黑市發生，取締囤積居奇。蔣委員長這一舉措，對於物價的統制工作，可說進入一个新的階段。

各省市政府在此號召之下，對於各項物品，進行限價工作。重慶方面，於一月三日成立物價及運價工資等評議會，逐項加以評議，在二萬五千四百七十四種物品中，經評定者計有一千三百零六種，復經市府核定者，共有九百零二種，其中物價六百五十六種，工資二百十二種，運價三十八種。其他各主要城市，如成都、西安、蘭州、昆明、貴陽、桂林等地亦紛紛議定限價，且一律於一月十五日實施。

二 限價實施後物價之波動情況

現在我們且來觀察一下限價實施時的情形及其以後物價的動態。以重慶的限價情形而論，一般講來，各項主要物品的價格大都被限高了，限價保持於市價同一的復不少，價格被限低的，大概是些必需品。

限價實施以後，無可諱言，市場上的物價波動，還沒有受到遏止的效果而呈現穩定。首先是表現於山米市價的波動，山米是沒有核定限價，因此其上漲亦最烈。重慶在一月十五日實施限價以前山米的市價是六百二十元至六百五十元一市石。一月十五日就到了七百元，二月五日竟達八百四十元，二月十五日到九百元，一月間竟上漲了二百五十元一市石，其上漲程度至可驚人。至被限價了的物品，市價漲過限

價的有小麥、陰丹士林布、豬肉等，小麥限價為二百九十元一市石，一月十五日漲至三百元，二月十五日又漲至三百四十元。陰丹士林布二、四五〇元，一月十五日即漲至二、八〇〇元。豬肉每市擔限價為一、二七五元，一月十五日即漲一、三七〇元，二月五日一、六〇〇元，二月十五日更上升至二、五〇〇元，二月十五日的市價與限價相較，幾高漲達一倍。統觀限價以後，各項物品的市價未有下降的，保持限價的已經很不錯，至各項有關民生的食品及必需品則市價有漲過限價的。這種情形，不僅重慶一地為然，其他實施限價的各城市，情形亦頗類同，如成都上熟米限價為五百二十元，到三月十五日即上漲至六百五十元。除市價漲過限價這一點情形以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物資的逃避不見的現象又復在這限價聲中出現。如成都都在三月十五日前後，市場上陰丹士林布及黃糖皆絕跡不見，施行限價以後，不獨仍有各項主要物品的乘機狂漲，甚至有「逃避物資」，「黑市流行」，「改變衡量」，「偷工減料」等等現象存在，至堪痛

心。限價以後的物價波動，不能再藉口任何原因以為解釋。因為限價時所議定的價格大都是將限價前的各該物品的原有市價提高了的，當時將價格限高了的用意，還是在於防止以後的物價波動，在於保障工商業的利潤。限價以後而還有物價波動的狀態出現，這決非詭辯所能解。有人認為限價施行之時，適值農曆年關，因此物價例有每年一度之季節性上漲，這話似乎言之成理，但實際則大謬不然，以山米的波動而論，山米原是未曾核定限價，不在管制之中，故得乘限價之際猛形狂漲。即以糧食價格之季節性上漲來說，糧食之季節性通常在五六月間變動性最大，但現在山米價格的上升則迫在限價通令頒布之時，一月間的波動由六五〇元至九〇〇元，一市石上漲達二百五十元之鉅，此種漲率決不能以季節性一點所能解釋。如果說，山米不在限價以內，故其價格可以聽其變化，此言可謂完全違反政府管制物價的本意，且正因為山米不受管制，故奸商得乘機擾亂糧食市場，從而刺激

起其他物價的上漲。又如重慶蔭丹士林布限價後一月之中上漲達三五〇元，這與季節性毫無關係，但竟也如此的猛漲，可見以季節性的上漲作為解釋物價的波動，顯然是說不通的。要找出限價以後物價的波動原因，我以為這還是得有實物資本者在其間作祟，還沒有對囤積居奇者徹底根絕。囤積居奇的風氣如果一日不予掃除，則限價前途的展開，頗為困難。

從限價實施的短時期中，我們可以看出它的本身尚有一些缺點存在，這些缺點今後是必須克服的，它的改善，至少，可以加強限政的效果。

第一、限價必須更求其合理 價格的限定是不容易的事，首須顧到原料與製成品價格間的協調，如果原料價格限高，而製成品價格被限低，則生產事業將無人經營，生產勢必趨於萎縮。例如棉花每市擔限價三、〇〇〇元，而棉紗每包的限價則為一二、五〇〇元，淞市紗廠紡紗一包約需用棉花五擔，則棉紗每包的成本應為一五、〇〇〇元。是棉花的原料價格較棉紗的製成品價格為貴。這種限價情形顯然是不妥當。其次，各地間的價格須要使其協調，各地間同一物品的價格因其來源運輸以及需供等未能一致，故事實上亦不能強求其劃一，但如果使各地的價格相差太大，則亦容易使商人將物資移轉，造成各地間物資的需求失衡現象。故如何調整各地間的價格，實為改善限政的要務。這裏，最重要的似乎應該顧及產地與銷地的物品價格的成本利潤，而分別予以合理的規定，保持各地間的物品價格平衡，使貨暢其流。

第二、限價機構必須使之一元化 實施限價須要健全之執行機構及高度之行政效率。現在各地關於限價之執行機構，類多未曾統一，而各種物品價格的管理又都隸屬於各不相同的機關，以致步調不一，辦法分歧，今後為求其行政上的統一及時間的迅速，以便力量集中，求限政得以貫徹，必須使管理機構成為一元化。

第三、山米的價格必須納入於限價的軌道中 山米的價格，不受

管制，其自由起伏，實為費解。現在食米除公務人員的平價米外，有普通市民憑證購來的官價米，但官價米一項淞市業已取消。淞市一地有所謂河熟米應市，此項河熟米是受限價了的，而其品質殊為粗糲。此外就是所謂山米了，山米是不受限價，始終是在自由狀態，故此次限價實施以後，其價格首先發生波動，而且其上漲亦最烈，現在一般市民食山米的很多，山米價格的猛漲，無疑的會影響於他們的生活。山米是農民於徵購以外對於糧食的自由出售，但農民並不是直接出售於消費者，仍須通過於市場，其價格仍須決定於市場的價格，現在糧食市場中所有的一切食糧，皆規定其限價，何獨於山米一項為例外？為對於糧價的廣積穩定起見，對山米一項應該納入於限價的軌道之中，不能再任其自由起伏，而便利於奸商的乘機操縱。

四 當前物價問題的根本對策

限價實施已經有二個多月，在施行的過程中，還有許多隱憂存在，而物價愈限上漲的情形又普遍的存在，這在限價初期施行之時，以我國缺乏管制之經驗，這現象是難免不發生的。針對其缺陷，以求收得限政的切實效果，政府正擬進行物資登記與限量分售，重慶且已實施憑證購肉，憑證購油，以及煤鹽限量分售等辦法。

在加強管制物價方案中，實施限價為其第一步，第二步即為掌握物資。現在限價這項工作，未能切實生效，則進入第二步掌握物資乃為必然之事。當今所能施行的憑證購肉購油辦法，即為對於掌握物資這項工作開其端緒。掌握物資何以可求得加強管制物價之效，但是怎樣去着手從事於進行掌握物資呢？這是一個問題。用無償價沒收徵用呢？還是出之於徵購物資的一途。以無償價來沒收徵用，在目前政府恐還不至於出此，至徵購物資，則須視其用什麼方法，如徵購物資出之於增設籌碼之方式，則反而刺激物價的上漲，如以債券給付方式，則以其不能兌現而將無人肯繼續生產，且徵購時定價與成本之間怎樣相協和，亦是問題。有人主張以徵購物資來作為統制物價的方法，以為掌

提到資產，自然就掌握到其所生產的物資，掌握到物資自然就掌握到其出售的價格。筆者認為這辦法還是近於理想，第一是對於工廠資產的徵購。這裏所稱的資產徵購是否對於生產手段的徵購，如果是屬於生產手段的徵購，會不會在現在這私有生產佔優勢的時候，妨害到生產的全過程呢？會不會發生生產減少現象以打擊生產事業的進行呢？這是應該考慮到的問題。第二、對於商業資產的徵購更難有把握，因為商業本身全部屬於流通過程，並不生產實物，但實際上現在各種物資經過流通過程在那些商業資本者的手裏，而這些商業資本者又大都為零星的個人，所以要從商業資產的徵購上去把握實物，也不容易做到，如果說徵購商業資產可以從徵購商業資本的股權着手，但如何將股權變為實物，這也是問題。從以上這些問題看來，以徵購資產去掌握物資，事情是複雜而難於進行。筆者的意見，與其徵購資產，毋寧從吸收游資上面去着想。現在物價的刺激力，囤積居奇是其主因之一，而囤積的主崇則為游資，但游資是散漫而流動，不容易去把捉得住，不過游資的一部分總在銀行手中，在銀行中的一部存款，政府可採取存款保值而以實物償還的辦法去從事徵收，即政府將銀行的一部存款吸收，以此項資金去把握物資，而存款滿期時，政府可按其存款的數目，比照滿期時的物價以實物償還。不使存款人因幣值的影響而遭受損失。至對於存在銀行以外的游資，可採取發行物資公債的辦法去吸收，即政府發行各種物資債券，票面上印各種物資數量，如米布等類，人民承購時，按當地市價繳款購券，至抽籤還本時，本息全按其票面的物資種類償還實物。如此徵購物資可不必出於增發通貨，而游資也可以使之踏上管制的道路，以祛除囤積居奇的禍根。政府以通貨增發減少，銀行創造信用的能力也可因此而收縮，物價可漸趨於平抑。政府能夠掌握住物資，然後才能對所有物資的使用和消費給以有計劃的支配。物資能夠集中管理，然後調整供需關係，方可對物價給以適宜的規定，如此物價問題方可獲得進一步的解決。

上面所說的掌握物資的辦法，不過是統制物價的一個辦法，談到

統制物價的根本方策還在於（一）穩定幣值，（二）增加生產，茲申述之：

（一）穩定幣值 穩定幣值是平抑物價的一個主要政策，貨幣不過其商品的真實基礎，而任意增發，其結果必要刺激物價上漲，這在前面業已有所說明，但幣值如何能夠使其穩定，下列幾點必須要實行。

（1）緊縮開支 我們所謂緊縮，不是無條件地主張公私事業一應收縮，而是主張一切公私企業中的不必要的事業應該緊縮，尤其是政府機關的去繁就簡，裁撤駁枝機關，汰去冗員。現在能夠做到減少國庫一個錢的支出，即等於少發出一張紙幣，而物價也就減少其一種刺激力。

（2）增加稅收 我國各社會階層對於戰爭費用的負擔，是非常不公道的。中下層階級負擔大部的戰費支出，而富有階級反因通貨膨脹而取得暴利，因此須重徵富有者以各種租稅，使富有者不能逃避其對於國家的責任，這應成為不刊之論。這不但為國家的財政收入着想，而且還為了穩定物價。富有者在國庫中積聚得的財富，如果不去重徵其稅，則無異增加他們的浪費，提高他們的購買力，以刺激物價的上漲。而且成為社會必要流通量的紙幣，必須以納稅的方式由流通過程中脫退，重行流回到國庫。這樣，通貨才不致過度的膨脹而有所節制，其價值也不致絕對地低落。對於增加富有者的租稅負擔，主要的應該開徵下列幾項：一、一般財產稅，二、土地增值稅，三、遺產稅，四、奢侈品稅，五、高額所得稅，六、過分利得稅。至於逃稅的現象，那須由政治力量去設法防止。

當徵收租稅時，有一點應該提出來說的，就是必須區別工商業二者的所得稅與過分利得稅。現今工商業二者的福利，其程度之深淺難易大有區別。我們不能將生產物資的工業與買賣進出坐博贏利的商業等量齊觀，工業界現在有虛盈實稅現象的存在，即物價高漲的結果，工廠的一切生產工具和生產手段無形中都增加其價值，此項增值的結果，使賬面上成為盈餘，而按其成本來說則此種盈餘成為虛盈，

稅收機關如以其虛盈而徵其實稅，顯然其結果欲使生產事業退縮，這一點必須切實予以糾正。

(3) 厲行節約 怎樣堅持最大的經濟節約，以祛除最小的通貨膨脹，實為當今經濟問題上的主要課題，要使抗戰經濟基礎趨於穩定，惟有從事於社會節約運動。所謂社會的節約，不但包括禁止浪費，禁止那些有錢的人過着荒淫無度的生活，而且還指着一般正常消費的節約，真欲達到所謂節衣縮食的地步。同時生產的節約亦是緊要的事，生產上的節約，不僅是指機器工具的減少消耗，對於器材的節省，與提高生產效能減少生產上的浪費，而且還要做到使生產機關丟掉那些官僚作風，認真的減去管理上的浪費現象。當今戰爭的持久與困難的加深，要求着全體人民實行經濟節約，從個人生活，工作方式，以至社會組織，全都需要實行最大的經濟節約。在蘇聯，在英美，他們有那樣的優越生產力，尚且都在各方面實行經濟節約，何況我們這社會生產力落後的國家，還不加緊從節約做起。我們的生產規模是那樣狹小，生產力是那樣有限，還不認真的減少消費，消滅浪費的現象，使社會的消費與有限的生產相適應，減少市場上的需要，亦可以降低物價的刺激性。

(二) 增加生產 戰爭是對於物資大量消耗，而這些物資的消耗又都是絕對的，即其不能繼續再保持其原有的實物資本形態，與貨幣作對等交換，因此社會生產力如果不相當着這種損失而提高，這將招致供求的失衡，因而表現於商品價格騰貴，連帶貨幣的增加也成為必然的了。而對着當今戰爭消耗的巨大，增加生產無疑的是切迫之圖。但是增加生產不是空口一句話所能了事，必須把握到下列幾項要點：第一、生產須要全盤計劃化，政府對於生產事業應該要統籌計劃，何者要急於舉辦，何者可以稍緩，對於一些帶有奢侈性質的消費品生產應該停止進行，現在最主要的生產事業，應該放在重工業上，各項採礦工作應盡量開發，同時對於民生必需品的生產應儘可能地增加，期使物資的供應無虞匱乏，只要生產的計劃能盡全國資源於統一指揮之下，

我國的經濟力量即可增強，物價問題方能得到一個根本解決。第二、獎勵生產，必須要顧到生產事業中的合法利潤，只要合法利潤能有保障規定，生產便可提高，生產提高則物價便易解決。第三、祛除生產前途上的一些障礙，如對於民營工廠應盡量鼓勵融通其必要的資金，調整其稅率，改善交通運輸，使原料的供應與成品的輸出，能夠迅速流動。第四、增強社會人士對於生產的熱忱，積極發動各工廠舉行生產競賽，用各種方法獎勵生產競賽的優勝者。要使全社會瀰漫着熱心生產的潮流。第五、訓練生產技術人才，我國技術人才實在是很貧弱，尤其是熟練工人的不足，怎樣加緊訓練熟練技工，以增進生產效能，這也是當今增強生產事業上的一個重要課題。總之，只要生產增加，供應便可增加，只要供應增加，市場便可安定，只要生產產品源源不斷的増加，供應能夠保持平衡，幣值即可以穩定下來。

此外，應運用政治力量以收物價管制的效果。對於平抑物價的基本工作之一，便是制止囤積居奇，囤積在物價的波動上表現出極大的推動作用，上面業已一再指出，此次限價未能奏效，在限價中仍有物資逃避以及黑市的存積，這也顯然是囤積居奇者在背後作祟。要制止囤積居奇的操縱行為，我們認為主要的要緊着政治力量，以嚴厲的辦法來對付，始克有濟。政府必須要放棄過去的那種姑息寬容的態度，同時在政治機構中也須下一番澄清的功夫。要加強抗戰的經濟基礎與貫徹抗戰的勝利前途起見，是不能聽憑這些少數敗類作這種蠹賊的行爲。要求物價管制取得其應有的結果，政府惟有運用其權力，徹底消滅囤積居奇。

平抑物價不是枝節地所可應付，我們須認清物價上漲的主要因素何在，從這裏再去着手以謀對付之策。我們認定物價上漲的主要因素是由於幣值低落，以及游資之聚集於物品的囤積上面居奇，因此我們以為穩定幣值，增加生產，是穩定物價的根本方策，再輔以掌握物資，進而分配物資，以謀物價的全盤管理，同時復運用政治力量去消滅囤積居奇的行為，如此物價問題才能得其歸趨。

我國戰後財政政策和金融措施的商榷

楊湘年

一

上次大戰之後，不但戰敗的德奧，傾家蕩產，水盡山窮，勝利國家的經濟，尤其是英國，也都感受嚴重的打擊。美國處境特優，似乎是天之驕子，雖曾經享受過一時的繁榮，可是一九二九年股票風潮之後，也是一蹶不振，陷入經濟衰落的泥淖。由此人類得了一個教訓，現代戰爭的影響，總不免兩敗俱傷。絕對的勝利，本不是那末簡單。

這次世界大戰，範圍之廣，破壞之烈，遠勝於上次大戰。於是不能不令人焦慮到未來的痛苦。所以在戰事方酣的目前，英美各國，已有很多人着手研究將來的善後問題。在經濟方面，最近美國有召集盟國代表，討論戰後國際通貨的消息。此外美國財長摩根和美國經濟權威凱恩斯並發表有關於戰後世界貨幣的方案。這種種努力，對於未來世界經濟方面的貢獻，自屬十分重要。但各國各有本身的問題，更須事前加以研究。本刊復刊號張天澤先生「從復興民族說到經濟建設」一文裏，曾提及戰後財政政策和金融措施一點的重要，不揣譾陋，撫陳管見，作為初步討論的資料。

政策的抉擇，必須顧到現實環境。在討論我國戰後財政和金融之前，我們對於國際和國內的背景，先得作一假定。我們站在盟國的立場，深信世界整個戰局，最後勝利，必屬於民主國家。盟國領袖，已迭次宣布作戰的主要目標，在於澈底打倒暴力侵略行為，并在大西洋憲章裏，指出國際經濟合作，是世界長期和平的途徑。所以戰後國際形勢，在過渡期間，縱不敢斷定絕無齟齬，而世界的輿論，必然擁護

和平，摺棄武力主義。在經濟方面，定必以合作互助為原則，不容任何國家孤立存在，至於近二十年來流行病似的經濟國家主義，更不許有抬頭的機會。本國方面，我們奉三民主義為主臬，經過這次抗戰的試驗，信念必然更為堅強，鏗而不舍地，向着三民主義的理想繼續邁進。在上述的國際和國內背景之下，我國戰後的財政和金融，應該怎樣，才能使我們的國民經濟，步入康莊大道？

二

由於戰費的龐大，預算的不敷，我國戰時財政，早已走入通貨膨脹的圈子。物價水準，預算數字，和印鈔機的轉動，已開始在那裏競賽。假定戰局再拖長二年或三年，在最後勝利降臨的一天，這個競賽，勢將進入驚人的高速度階段。這是我們戰後財政的危機。

實際上也許未必如此嚴重。第一點是戰勝者，和戰敗不同，毋須負荷賠款的重擔。並且物價方面，種種穩定性的勢力，也有出現的可能。國際和國內運輸的恢復，社會秩序的穩定，生產設備的補充，和效率的增加，物資流通之後，囤積居奇的自然絕迹，都是有平定物價的作用，而可能把那個愈轉愈快的惡性循環打斷。但是我們不可過度樂觀。我們戰後的財政，雖沒有賠款的重擔，而肩背上另有別種重大的負荷。我們要迎頭趕入現代國家的隊伍，就得要迅速地大規模建設，那鉅額的建設經費，很可能使平抑物價的勢力，消失其作用，而再度引起物價和預算的追逐不已。我們固然決心要建設，但同時應考慮如何應付這財政上的難局。

在通貨膨脹已經進入惡性階段的背景之下，我們須信奉平衡預算

的原則。上次世界經濟衰落的時期，凱恩斯等經濟學者，主張以赤字預算政策，刺激物價，救濟失業，因時制宜，當然很有價值。但我們的赤字，已經發揮過度的作用，新穎的刺激劑，於我們不僅無補，而且含着很大的危險性。平衡預算，包括節流開源之意。戰時預算，當然以戰費為最大。在戰後倘能把這一項支出，加以緊縮，必定大有裨補。國防的重要，大家都承認。雖在戰後世界和平的空氣裏，也不可安而忘危。可是現代國防，不僅軍事一端，我們最高領袖也曾說過，勝利的因素，三分軍事，七分經濟。就軍事而言，也須綜合人力，物力，教育，科學，衛生各因素，才能臻為上乘。軍有大量的士兵，並無多大意義。今後應當注重部隊的質素，在數量方面，不妨縮減。如果能加強學生的軍事訓練，并逐漸將募兵制改為徵兵制，那麼有事之秋，舉國皆兵，在和平時代，即無須養着龐大的常備軍。戰後軍事復員，固然問題很多。除了一部份征調入伍的壯丁，凱旋之日，可以解甲歸田者外，定有很多以兵役為職業的軍士，必須得一適當的出路。各省軍事首長，尤須承認「國家第一」的最高原則，澈底了解縮軍的意義。在戰後民族復興的氣象之中，我們可以深信，過去軍閥時代陳腐的割據思想，決不會再度出現。同時由於各種經濟建設的實施，一大部份退伍士兵，備有供獻他們勞動的機會。所以祇要有決心，緊縮軍費是可以實現的。

不僅軍事應該捨棄重質，今後一般政務機構，都應注意效率。復興時期，政務的範圍勢必擴大，要絕對的削減經費，恐不可能。但如果採取「效率」政策，提高工作效率，裁併聯枝機構，以現有公務員的人數，處理加倍的公務，未嘗不可間接地達到節節的目標。近數年來，生活費用高漲六七十倍，而公務員的待遇，至多不過增高十數倍，從各個公務員的立場說，實是絕大的犧牲。但從另一方面觀察，一般機關的狀況，似仍不免有過去官僚機關傳統性的人浮於事底現象。某報社評會謂，目前駢枝機關過多，於是預算相形短絀，而各機關員額愈多，於是經費更形不敷，同時大家覺得無事可做，可謂刻畫

入微了。戰後政府的活動，不限於衙門，而將深入經濟事業的各部门，不但範圍廣大，而且性質繁雜，更不可不注意工作效率的強弱。今後的理想，應為官廳機關效率化，而須竭力避免國營事業衙門化。要實現這理想，一方須加強考核機構的能力，以資督促。同時各機關的首長，對於人事配備，應恪守人盡其才的原則，使各人有所可做，以防止工作精神的消沉。經費總數，應嚴格限制，以杜絕駢枝機構，和濫用冗員之弊。但對於各個公務員的待遇，應切實加以調劑，不可長此聽任他們犧牲。粥少每由於僧多，肅清駢枝和冗員之後，自可有僧有粥，公私兼顧啦。

建設經費，是切不可省，但也不可漫無限制。翁文灝部長曾說：「建設必須要資本，資本的大小，是要國民收入能負擔，不能超過國民收入的程度。我們不能不顧國民的生活，奪其所有，而致不能生活。……莫洛脫夫在最高蘇維埃演說三個五年計劃的實施經過，他說：「第一個五年計劃，每年用在新建設的資本，是三百九十萬盧布，蘇聯的人口是一萬八千萬，平均每人每年為這新建設所負擔的錢達二百七十七個盧布之多。第二個五年計劃，每年的新資本是一千零三十萬萬盧布，每人每年的負擔是五百七十四盧布。第三個五年計劃，每年的新資本是一千八百萬萬盧布，每人每年負擔達一千盧布。姑假定每盧布折合國幣一元，要中國國民每人每年負擔一千元，有沒有這個可能？不必計算，可以率直的回答，沒有這個可能。在抗戰前，中國國民每人每年平均的收入，估計為四十元至二十元，就按四十元計算，還和一千元相差得很遠。所以中國講建設，特別龐大的計劃，事實上是不通的。」翁氏語重心長，可為侈談建設者痛下鍼砭。正因為建設經費，具有有限度，建設計劃須得有一個重心。重心的意義，非謂重心以外，不必建設，而謂重心事業，應比其他事業在數量的成份方面，和時間的先後方面，相對地處在優先的地位。關於重心的主張，國人感受外侮的重太刺激，很多人建議以國防所需的重工業做為重心。認為大炮和牛油，不可兼得。在建設初期，人民的享受，自

不能希望過奢。德蘇兩國人民，戰前節衣縮食，致力於國防建設，可做我們的參考。等待國防基礎鞏固之後，再把全力從事於民生的提高。也必須有了大炮之後，才可保持人民的牛油，不被敵人所掠奪。

另一部份人主張以民生為重心。認為國防當然重要，但國防的因素，不單純是武備問題。鋼鐵之外，糧食，衣着，燃料等等都很重要，而最主要的因素，是國民的質素。我國武備不如敵人，而抗戰已足足六年，歸功於人的因素，可為明證。從物質條件來看，大部份人民的生活，已處於饑寒線下。倘戰後再叫人們苦熬一個時期，恐怕多數國民的質素，將衰弱得不堪設想。這當然不合民主國家的理想，何況人民的孱弱，即是國防的弱點。所以戰後建設，應以民生工業，和我國大多數人民恃以為生活的農業，做為重心。

從財政的觀點，我們對於建設經費和行政經費，不可以同一種眼光去評判。行政經費，着限於政務的執行，而不注重報酬之有無。建設經費是一種資本支出，既是資本，就應該追求其利益問題。舉辦建設事業而不講利益，即等於浪費國家的資本，亦即等於消耗國民的儲蓄。我們是缺乏資本的國家，應當格外重視資本的運用。如果善於利用資本，收穫優厚的利益，那麼外國資本，也有源源而來的可能。不然，就難以引起投資者的興趣。所以我們對於建設事業的評判，應該注意收益能力的優劣，不但收益要優厚，並且為了便利財政上的週轉起見，更須收效迅速。對於需要資本過大，而成效遲緩的建設計劃，都應當加以考慮，不宜貿然進行，徒增財政上的重負。國防工業，以鋼鐵工業為基礎。而據沙爾特(Sir Arthur Salter)陶乃(R. H. Tawney)和康德爾夫(J. B. Condliffe)等外國經濟學者來華考察的結果，都認為我國鋼鐵資源不充足，重工業無發展的希望。我們雖然不能深信其為絕對正確，但鋼鐵儲藏不是我國特長的資源，尚屬可信。從另一方面看，戰後的世界，傾向經濟合作，尤其注重國際貿易的發展，所有關稅壁壘，和其他障礙貿易的設施，恐怕都在打倒之列。

在這種國際自由競爭的背景之下，英美德法日鋼鐵，勢必輸入我國市場，我們既不能富有鋼鐵資源，技術又比較幼稚，設備的規模，在短期間內更難趕上先進國家，因此國產鋼鐵的生產成本和品質，必難和舶來品競爭。至少在近期内，收益的希望，必定很成問題。並且一般重工業的資產結構，固定資產所佔成份很多。據勃立司(B. H. Bliss)的調查，煤礦業的固定資產約佔百分之七八。四，鋼鐵廠百分之七二。四，化學工業百分之七〇，銅礦百分之六六。四，油礦百分之四八。四。反之，輕工業的固定資產成份很小，例如皮鞋工業為百分之一三。一，電料工業百分之二〇。六，棉紡織業百分之二九。五。所以如果以重工業為建設重心，所需資本必定比較鉅大，對於我們的財政，是否適宜，也很值得考慮。

至於民生工業和農業，我們對於原料，人力，土地，各條件都是相當優厚，技術亦容易解決，舉辦較易成功，不怕外貨的競爭。並且人民生活，枯樵已久，期待大量的衣食住必需品，猶如久旱之望雲霓。有了四萬五千萬人的偉大消費市場做後盾，生產品的出路，毫無問題，合理的利益，自然很有把握。我們戰後財政，以平衡預算為原則，所辦建設，自須選擇收效容易的事業做重心。所以上面兩種主張，後者比較適宜。雖然用長期眼光來看，各種建設都有相當收穫，孰先孰後，似乎沒有多大分別。但在我國財政困難的背景之下，因為要保持預算的平衡，以避免走入惡性通貨膨脹的圈子起見，建設經費，不能過份龐大，超過人民的負擔能力，并且所辦事業，須在短期內成功，而有合理的收入，以供財政上的彌補。我們也承認重工業的重要，所佔建設經費預算的成份，應按着建設計劃的推進，和財政狀況的改善，逐漸增多。不過在初期建設，我們還以民生工業和農業做重心為宜。我們固不可因財政困難，而放棄建設，更不可因建設的重負，而陷財政於危險境域，不幸而財政崩潰，建設就根本無法進行。我們須先從適宜於財政的建設途徑邁進，才可逐步達成我們的理想，而避免財政上的危機。

三

戰時金融的膨脹，是各國普遍的現象。戰後應如何措置，才有利於國民經濟，須因地制宜，很難有一定的辦法。例如上次大戰後的英國，自一九二五年恢復金本位後，金融向着緊縮的途徑。後來世界不景氣發生，經濟學家，考查其原因，認為國內工商業的衰落，是緊縮金融的結果。反之，當時美國的金融當局，以穩定物價為前提，由聯邦準備銀行利用公開市場方法，和寬大的放款政策，擴張貨幣數量，以支持物價水準。後來因工商業畸形發達，獲利特優，引起股票的投機，結果釀成一九二九年的股票風潮，不但打擊本國的經濟，且把整個世界，導入不景氣的漩渦。瞻望我國戰後金融的使命，為配合經濟建設的需要起見，當然不可背道而馳，向緊縮的途徑走。但是目前通貨膨脹的現象，已覺相當嚴重。冥想這惡性循環的圈子，日夜不息地轉動，等到最後勝利終於降臨的那一天，膨脹的程度，恐必遠甚於今日，那時不言緊縮，而再事擴張，其危險可知。簡言之，我們既須擴張，同時又要避免膨脹的弊害，這又是我們戰後金融上的難局。

這樣複雜的難局，恐怕必須從政治，社會，經濟多方面入手，才有打開這難局的希望。單從金融觀點說，必先有了健全的金銀機構，才能把握住金融的樞紐，那時才能擴張自如，同時發揮吸收人民儲蓄的力量，以減除膨脹的影響。所以我們戰後的金融，當以加強銀行機構為前提。這又可從量和質兩面研究。

現代國家的貨幣，除少數硬幣外，大部份是紙幣和銀行信用。在經濟發達的國家，銀行信用更佔多數。例如美國的銀行存款，約四、五倍於發行數額。我國人民的收支習慣，重視現鈔，而不習於銀行票據的使用。所以我國銀行「製造信用」的範圍，較為狹窄，換言之，金融機構的擴張力，並不強大。農業社會的人民，習性保守，對於日常收支，重視現鈔的習慣，不易放棄，當然是改革的障礙。但從客觀方面看，我們必先有了銀行，才能有銀行的顧客，在鄉鎮農村的人民，

既沒有認識銀行的機會，自難希望他們對於銀行信用，自動地發生興趣。據全國銀行年鑑民國二十六年統計，全國銀行組織，除國外部份外，計有總行一五二家，分支行一、五九一家，共計總分支行一、七四三處。按各省地域分佈，江蘇有四八七處，河北一九九處，浙江一七五處，四川一二五處，江西八二處，安徽八〇處，福建七四處，河南七三處，湖北七二處，山東六二處，廣東五八處，陝西五〇處，湖南廣西各四四處，山西四一處，遼寧一八處，綏遠一一處，新疆吉林各九處，雲南七處，甘肅寧夏各五處，貴州察哈爾各四處，黑龍江三處，西康一處，青海西藏則尚無銀行。可見吾國銀行機構，不但總數過少，并且分佈太不公平。抗戰以來，東北，東南以及華中各省，淪為戰區，全國的人力財力廣集後方，於是西南，西北區域的銀行，逐漸增加了許多。但照我國領土之廣大，人口之衆多，恐非有數十倍多的銀行分支機構，不夠成立一個完備的金銀網。過去銀行業設立分支機構，多數以利潤為前提。工商發達的城市，利益優厚，各行趨之若鶩，反之即無人過問。這種被動性的措置，實為造成目前銀行機構偏枯狀態的主因。銀行是經濟事業的一種，當然應該顧慮本身的利益。但是眼光應該遠大，不可過斤斤於近利，而忽視潛在的利益。因經濟環境，非比靜止物質，祇要努力經營，自然能產生經濟利益。吾國的土地，除少數沙漠不毛之地外，大都相當有經營的價值。過去因科學的落後，和資本的缺乏，大部份人民，迫於生計，不得不遷徙自然環境，密集在濱海沿江平原沃野的地區。這種畸形的分佈，實是吾們發展經濟的一大障礙。但是移民實邊，須以資本做先鋒，有了資本，而後能着手開發，有了生產事業，才能吸引移民。所以今後的金銀機構，在中國本部各省的城市鄉鎮，固然應當廣設分支機構，對於前此所忽視的邊陲區域，更須加倍努力，至少郵政通達之地，都得有銀行業的足跡。等到金融網完備之後，全國人民自能逐漸了解銀行的使命，進而和銀行發生關係，自動地放棄他們傳統的重視現金習慣。那時銀行信用的地位，必然駕乎鈔票之上，金融機構的擴張和吸收能

力，也必定大為增強，運用便捷。返顧目前各銀行的處境，備受人民用現習慣的支配，終日碌碌於印鈔和運鈔，疲於奔命，而猶覺得鈔券供不應求。鈔票一種發出之後，即被人民所吸收，市面游資充斥，而銀行吸收力甚微。一部份原因，固然由於物價水準高漲的影響，人民不得不多存一些備用現金。同時，其權利極優厚，銀行存款利率相形見絀，不夠引起存款的興趣。但是如果銀行分支機構普及全國，深入民間，那麼人民和銀行接觸的機會既多，定有一大部份的鈔票，可從儲蓄存款的途徑，流回金融機構。簡言之，現在的弱點，在於不能把握金融的樞紐。今後應該廣設銀行分支機構，爭取主動地位，引導人民的資金，流入金融系統，而不為傳統的用現習慣所支配，這才能克盡擴張金融的使命。

其次從質素方面觀察，凡百事業，合力則勢強，分散則勢孤，金融事業亦然。現代銀行制度，大別為「分行制」和「單位制」兩種。英國銀行，是分行制的表率，他們有「五大銀行」，就是米德萊銀行(Midland Bank)，勃克萊銀行(Barclays Bank)，勞合志銀行(Lloyds Bank)，威司敏司脫銀行(Westminster Bank)，和國家省銀行(National Provincial Bank)五家。每家各有二千處左右的分支機構，遍佈全國的城市鄉鎮，但是管理權完全集中在倫敦的總行。因為力量的集中，他們的基礎非常雄厚，冠絕世界。美國的銀行事業，因受各州法令的限制，和美國人民傳統的獨立思想，除少數例外，每一家銀行，各成一單位，全國銀行單位之多，也是其他各國所罕見，實是單位制度的典型。根據上次世界不景氣的經驗，英國銀行因資力集中，內容充實，並沒有倒閉的事實發生。反之，美國銀行，因各單位分散，力量單薄，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三年間，停業者共有五千四百八十餘家，後來復業的僅七百十餘家。足見分行制度的力量，優於單位制度了。我國中交農四大國家銀行，和郵匯中央信託兩局，以及上海、金城、鹽業、大陸、中南、浙興等諸大商業銀行，都是師法英國制度，分支機構頗多，也可視為吾國銀行業的主幹。不過據銀行年

鑑二十五年的統計，國內銀行，按總行計算，共有一百五十二個單位。內中資本在五百萬元以上者，僅十六家，而資本不滿一百萬元者約有八十七家。按資產總額計，超過五千萬元的銀行，僅二十一家，而不滿五百萬者有八十六家。所以就整個銀行業觀察，力量很是薄弱，不幸而稍有風潮，抵抗力量，很成問題。我們加強金融機構，應當質量並重，所有資力薄弱，規模狹小的銀行，應該加以合併，使力量集中在少數健全的單位。再由這幾家根深蒂固的銀行，廣設分支機關。如是而後，單位減少，而分支衆多，範圍推廣，而力量仍能充實，這才能負起戰後金融擴張的使命。

我們不但需要一個廣大而又堅實的金融網，更需要一個健全的金融心臟，這當然指中央銀行而言。我國中央銀行已經有相當完善的基礎。去年七月起，實行集中發行，中央銀行的力量，更形雄厚。可是理想中的中央銀行，不是單憑法令或政治力量所能造成，而要建設在國民信任心理的基礎上。英蘭銀行一直到現在，還只是私人資本的組織。但是它的歷史悠久，信譽卓越，不僅受本國人的熱忱愛戴，并且是全世界公認為現代最近理想的中央銀行。反之我們淪陷區域的傀儡中央銀行，縱有偽政府的法令做後盾，也無法號召國人的信心，絕對不能成為事實。所以理想中的中央銀行，應重視它本身的社會地位。不論個人或團體，凡要見重於社會，必須以服務社會做前提。中央銀行也不能例外，必須抱着服務社會的精神，切實負起調劑金融的使命，才能使銀行界和一般人民心悅誠服，一致愛戴。其次，坦白的態度，是博取同情最有效的方法。理想的中央銀行，應以社會的信心做後盾，對於本行的一切，除必須保守機密者外，不妨儘量公開，使人民認識它所負的重大任務。例如英蘭銀行的帳表，按週公佈於報章雜誌，以備人民研究它的內容。這不但無害，反可增加人民對於英蘭銀行的信心。此外對於本行內部的效率，自應力事提高，才能有效地發揮服務社會的使命。人事和效率，具有密切的關係。要提高效率，必須注重人事。首長的人選，更宜以事務官充任，才能保障效率的繼續

一貫，不受政治方面的影響。

以上說明加強金融機構的步驟，一面應從質量雙方，增厚一般銀行機構的力量，一面應以國民的信心爲基礎，建立一個衆望所歸，名實相符的中央銀行。金融當局有了這樣的健全機構，就可掌握金融，

爲職業學校青年呼籲

黃覺民

職業學校，在抗戰以前，招生極爲困難，一般青年，除非絕對無法進入普通中學，從不願投考職校。抗戰以來，因爲社會的需要，經濟的壓迫和政府的提倡，職校氣象煥然一新，頗有繁榮之概。最近教育部更進一步責令各種工廠附設職校，使職業教育與社會實際需要打成一片，實已踏上教育不與社會分家的初階。但是青年心理還是沒有改變，他們一有機會，總是千謀百計逃避中學，竭盡心力避免職校。

這究竟何故呢？一言而蔽之曰：職業學校沒有青年升學的出路。青年心理多是前進望上，由職校畢業之後，總想再求深造，但他們升學命運早經職校註定，無論怎樣掙扎，能夠不受大學摒諸門牆之外者，實鳳凰毛麟角。最爲不平的，莫如高級農、工、商、醫職校畢業的，不能算爲適當資格考入大學農、工、商、醫各學院。

或謂高級職校畢業生，可以升入同性質的專科學校，豈不也有一條升學的出路？殊不知這條出路雖經開啓，仍嫌不足以副職校青年的願望。青年人通常好勝，尤不願被人輕視。專科學校的程度既祇等於大學一二年級，他們總以爲進入專校不如進入大學那樣有前途。加以中外傳統觀念，都認中學生、大學生較爲優秀，職校生、專校生較爲低劣，顯然有優劣之分，高低之別，試問誰甘自處劣勢？而且現在專科學校爲數無多，許多高級職校畢業生雖祇求其次而入專校亦極難得，難怪有志青年，把職校看爲歧路一條，力求避免。

按事實的發展，隨時發揮她的擴張或收縮的機能。雖然現實的機構，恐怕不易完全合乎理想，但是我們應該向着理想走去，距離理想愈近，則愈有希望打開我們戰後的金融難局。

三二，四，二四，重慶。

至於大學所以不收職校畢業生，絕不是故意與職校畢業生爲難。誠以大學一二年級課程，係與高中普通學科銜接，祇便利於高中生繼續修較深的課程。職校生進去，在一二年級普通學科修習上，必感許多困難，教師授課亦有許多不便。以此之故，凡高職生欲考大學者，必須先自補習高中學科，先變爲高中生，然後纔有錄取的希望。而高職生在校時既不克未雨綢繆，畢業後勢必至臨渴掘井。結果非不敢應考便名落孫山。

我以爲近年來政府既嚴格限制中學的設立，努力推進職業教育，以適應國家社會的需要，以矯正中學畸形發展的流弊，便有連帶爲職校畢業生謀正當升學出路的必要，使青年樂於投考職業學校，造成「中國之命運」中所需要的建國技術人才。

那麼，應該怎麼辦呢？我認爲這問題不難解決，只要略爲改變大學入學考試的方法，只要略爲改變大學一二年級的課程，便可爲職校青年開闢一條升學的坦途。

我主張職校畢業生應准免考高中學科升入同性質的大學院系。例如高級農科學生入農學院，高工生入工學院，高商生入商學院，高醫生入醫學院，其他高級職校生都分別入同性質的院系。入學試驗，除二三門共同必修科外，應偏重於農、工、商、醫等專門科目。錄取與否，應以共同必修科及專門科成績合併平均爲標準。（對高中生的考

法可照舊)

這樣還只能解決職校生入學考試的困難，仍不能解決職校生入大學後第一二兩年難讀難教的問題。必須再將大學各院系的課程改於一年級起開始專攻，使專門學科與職校同性質學科銜接起來，不使他們繼續修習許多與高中同性質的普通學科，始不至入學而不能讀，入學而不易教。

又大學一年級起高中生與高職生混合教學，亦不是好辦法。在普通學科上高中生因根底較好，成績必比高職生為優；在專門學科上高職生因根底較好，成績必比高中生為佳。教學時，遷就高中生則高職生望塵莫及，遷就高職生則高中生不甘落後。人數較多的院系固然可採高中生高職生分組教學，授以不同教材的辦法；但在生數少的院系便行不通，縱行得通，也不經濟。最好由教育部指定若干大學院系專招高中生，若干大學院系專招高職生，則一切教與學的困難都可迎刃而解了。

讀者至此或會疑問大學一年級提早開始專攻，勢必降低大學生普通學科修養的程度。愚意吾國現行課程自小學直至大學二年，共計在校十四年，仍無一學之專一技之長，未免過於空泛。即大學畢業生也不過在三四兩年級受專門訓練，實在過於膚淺。我國學制自小學至大學僅有十六年，而以十四年即其中八分之七時間修習普通學科，來打所謂「文化基礎」，僅以二年短短時間修習專門學科，毋乃緩急不

分，不合我們急需專才的需要。

我亦承認廣設文化修養的價值，但不敢苟同以青年在校十四年之時間耗在建築文化基礎上面，更不敢苟同大學生非有十四年文化基礎，便不能順利修習專門學科之主張。愚意廣設文化修養是終身做不盡的工夫，學校祇要為青年打好足能進修的基础，讓青年畢業後在社會上再去增高繼續。學校裏的課程應當多集中於在社會上不易獲得的教材，以最經濟的方法，最經濟的時間，教育青年，使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專長。現有課程過於偏重廣博過於忽視專精，此我所以建議開闢職校學生升入大學之通路，此我所以主張將大學一年級即應開始專攻，不可於一二兩年再修廣泛的學科。

還有一個辦法鼓勵職校青年上進：就是此後一面嚴格限制大學的設立，不妨酌予減少；一面努力增設專科學校，使與各種職校課程取得密切聯繫。在專校與大學的鴻溝間，架上一條通橋，准專校畢業生升入大學三年級。如此，則大學入學考試，及大學一二年級教學，都不成問題。而大學三四年級專精課程，在專校畢業生視之，不特比一二年級者較為容易，且其成績大有反比大學生較優的可能。

如以上方法都不能打開現有大學的傳統門禁，也該創設各種專科大學，專收高職及專校的畢業生。寧可造成普通大學，師範大學，及專科大學的三軌平行制，萬無再蹈歐洲不平等不公道斷送職校青年前途的雙軌制覆轍。

六月星座神話

陳遵媯

六月下午八時中天之星座，有神話傳說者為獵犬，半人馬，室女，牧夫等座。

一 獵犬座(Canis Venatici)

星圖上，牧夫座之巨人，以皮帶曳獵犬二匹，追逐環繞北極之大熊與小熊；此獵犬在北者曰阿斯克利翁，在南者曰卡拉。此座位牧夫座與大熊座之間，多祿某列入大熊座內，逮十七世紀，黑腓利烏斯始

將其獨立列成一座，故無何特殊之神話足述。

惟此座首星，又稱「查理之心臟」，係哈雷所命名，用以祝福英王查理二世之故。（著名之哈雷彗星即果如正所預報而回歸者，宣統二年吾人所見之大彗星，即此哈雷彗星最近之出現，其後出現當在民國七十五年。）蓋王於一六六〇年五月二十九日回倫敦之晚，侍醫斯卡波羅注意此星之異常輝明，告諸哈雷，遂附此名。

我國所稱常陳七星中，有六星屬此星座。

一 半人馬座 (Centaurus)

半人馬乃自頭至腰爲人，其餘部分爲馬之空想動物，此象徵古人愛馬之故，非果有如此奇怪動物之存在，神話中亦以其爲人類之友。相傳成此星座之半人馬乃酒神得俄紐索斯寄父西累諾斯之子福羅斯。當赫叩利斯征服埃琉曼托斯怪猪之時，福羅斯與赫叩利斯甚相友善，飲以半人馬族特製之美酒。赫叩利斯沉醉之餘，誤矢射其友，正欲拔出營救之際，已觸長蛇之毒而逝。大神薛烏斯憐之，升爲星座。一說半人馬名開倫。

我國所稱之庫樓（一星），衡（四星），柱（十一星），海山（一部分），馬尾（三星），馬腹（三星），南門（二星）等，皆屬此座。

二 室女座 (Virgo)

據赫西俄多斯所說，此室女座之女子，乃大神薛烏斯與女神泰密斯所生之女，即天眞清淨之正義女神阿斯托累耶之姿。

嘗人類尚在黃金時代之際，野原無須耕種，河川流乳與酒，金色蜂蜜自樹下滴，人類飽食，不知結羣爭鬪之事，世界和樂，天眞爛漫，誠今日所謂天堂樂境。神仙亦喜居下界，阿斯托累耶亦爲其中之一，與人類相友善，鼓吹正義與真理。

黃金時代既逝，遂入銀之時代。四季生寒暑，人類不能不作耐寒暑之住宅，更驅牛而耕助，弱者漸爲強者所虐待。諸神不忍睹此慘狀，遂

漸回返天空，獨留女神於人間，以凜烈之音，日發正義與真理之呼聲。其後漸入銅之時代，爲虛偽，計謀，暴力之時代；山木被伐爲船，凌風破浪以侵他人之領土。地面所予之萬物，尙不足以滿人類之慾望，遂更深入地下，掘取煤鐵黃金等物，鑄造人之武器，友朋相鬪，兄弟鬩牆，無時或止。復耕種之牛，以供人類之食慾。阿斯托累耶雖日唱正義與真理，人類竟若罔聞；女神深感人類至此，無可挽救，終亦鼓雪白之翼，離此紅塵，高翔於天空而去。相傳其後阿斯托累耶女神列成星座，即此室女座是也。

一說室女乃農業女神得美泰爾；又謂爲其女，即地獄神普羅之妻柏塞夫內。普通星圖所繪之姿，非正義女神，常爲農業女神。

得美泰爾吹春風和雨，以潤野外綠芽青草，使其成長開花結實。秋之收穫，自然亦爲此女神所司之職。名畫彫刻所見之姿，乃拂長衣，垂黃金之髮，呈端莊母親之態度；有時手執稻麥一束與峨眉月形之鐮刀者。屬此星座之星，亦多時以農業有關之名稱，如「麥穗」與「葡萄收穫者」等等。

在古星圖中，認此爲正義女神阿斯托累耶者則繪手攜天秤與長劍之姿。

我國所稱內屏（四星），九卿（三星），三公（三星），諸者，左執法，東上相，東次相，東次將，道賢，平道（二星），角宿（二星），天門（二星），天田（二星），亢宿（四星）等，均屬此座。

四 牧夫座 (Bootes)

此巨人以皮帶牽獵犬二匹，追逐繞樞周圍逃跑之大熊與小熊之姿，神話中擬有種種之人物。例如不知生母卡利克斯托而圖獵殺大熊之阿爾卡斯，發明戰車之埃利克托琉斯，雅典王伊卡利奧斯等均曾相傳爲此巨人者；有時因近北極之故，有支持世界之意義，視爲擔天於肩之巨人阿特拉斯之姿。阿特拉斯乃愛阿培塔斯與克來密之子，率泰坦神族圖戮大神薛烏斯，遂得其荷九天於雙肩。

原名爲牧熊之人，普通可解釋爲『牧夫』或『車夫』之意。即以
大熊座爲車，此爲驅使牽車之牛者；有時以北斗爲車，此爲驅車者。
主星中名大角，希臘語爲『守熊之人』，屢用以代表此星座之
名，如神話所示，乃看守大熊小熊之人之姿態。星圖之像爲一高舉左
手，持獵犬座之二匹獵犬，右手執鞭追逐大小二熊之後。
我國所稱大角，天槍（三星），元戈，招搖，帝席（三星），梗
河（三星），左攝提（三星），右攝提（三星），亢池（四星），七

雲南民族之溯源及發展

范義田

——雲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之一——

第一章 西南夷各族之分佈大勢及其流徙雜居

第一節 歷史研究之意義

我們古代對長江上游以至南海濱之人民，其族稱非籠統泛濫，即
紛歧重沓；於各族之分析，諸書頗不一致，遠不如對北方大漠南北各
族之有條貫。此亦事實所使然：蓋金沙江兩岸及其南部，地勢險阻，
森林擁塞，不易身歷，一也；水交山錯，種落散居，不易分類，二
也；未有強族敵國，勢不相下，不求知彼（南詔已中國化例外），三
也。其籠統之稱，如曰百蠻者，率指洞庭湖以南；曰百濮者，率指大
巴山脈以西南；曰百越者，率指東南至西南之沿海一帶。其繁名細
號，則不勝列舉。凡遇廣大版圖，開拓土地，接觸新的族類時，往往
以「古已有之」之稱號呼之。如「濮」之一名，始見尙書牧誓：「庸
蜀羌髳彭濮」言其隨武王伐紂。而濮者，巴氏之族也。按諸當時周國
之地理及其政治勢力可能影響之範圍，則庸濮諸族，自當屬於秦隴川
鄂一帶之種落。再以關於周秦漢三代之歷史記載考之，巴氏屢助兵攻

公（七星中之三星）等，皆屬此座。

我國以北極星爲中心，至赤緯北五十四度止，稱爲紫微垣，此垣
內稱爲紫微宮，其中有五帝內座，爲天體中最尊之所。其南方跨至赤
道曰天市垣，而太微垣更在其南。連接北斗之開陽搖光二星，稱爲灣
曲，達於大角，再延長之，達於角宿，是爲二十八宿之起點，在我國
古代天文上，視爲重要之星。

戰，事證班班，而氏亦稱濮，則濮應指氏。（華陽國志巴志及後漢書
南蠻傳，言之較詳。）再以種落之資望言之，巴氏爲巴漢間嘉陵江流
域之大族，則所謂「左綿巴中，百濮所充」（左思蜀都賦）者，自亦
捨氏莫屬。而或以緬越演海文身之族，在晉唐時代，亦有文濮尾濮之
稱，即以其人爲尙書所載隨武王伐紂之濮；殊不知彼海濱文身者之亦
稱爲濮，固非此大巴山脈地帶之濮也。孔安國書傳曰：「濮在江漢
之間」，劉氏蜀都賦注曰：「巴中七姓有濮，即左傳廩人所率之百
濮，」皆是也。又如上引牧誓之「彭」，明人楊慎釋爲即漢時西南夷
之徙，亦曰斯曰檢，諸字同一聲音，卽一種夷而隨呼異名。其說對於
種落之分佈地理，固極相合；然僅就字音解釋，何如參諸種落之生活
狀況，而以「髳」者，卽漢書地理志蜀徼外之「旄牛夷」乎？髳亦作
髦，詩小雅角弓：「如蠻如髦」，疏曰：「牧誓：『庸蜀羌髳彭濮』，髳
髦音義同。」字又作髦，通典謂：「髦牛種，越髦羌」是也。（羌人
畜牦牛，故以稱其族。）

吾人於古籍分類之每多紛繁混淆，既不能起當時之種人或獲其骨

種，而詳究其血緣，則澈其與現在各族之關係；固當注意其歷史地理諸因素，其生活狀態及經濟發展之迹。而種名之或以音譯，或以義稱，自亦引為旁證，尋其相副之線索。如此而窺見各族之來源去跡，則對於民族及土俗學上之實地考察研究，誠不為小補。然不可執文字學上字音義考證之偏，而遺忘更重要之歷史發展事跡之尋求也。

第二節 漢唐以來各族之大體分佈

漢之西南夷，包括今雲南及貴州，西康之境。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傳，按經濟生活狀況，分西南夷為三部份，實古代最卓越之種族分類的歷史家也。(一)其第一部份：自夜郎以西至滇，滇以北至邛，——今自西康西昌(邛)南達滇池之東面部份，接貴州境(夜郎)——其人椎髻，耕田，有邑聚。(二)第二部份：西至桐師以東，北至牂牁，——上述部份之西，今自保山(桐師)至大理(牂牁)一帶，北接西康會理，東南接滇中——其人皆編髮，隨畜移徙，無常處，無君長。(三)第三部份：自牂牁以東北至徒笮，再東北至冉駹，——今自保山雲龍(焉)至大理，迤東北接西康騰越江大渡河之間，——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此其大略也。事實上，各族犬牙錯處，固不至如是之整齊劃分；惟種族間之融合分化及發展變遷，每以經濟生活為更根本之條件，有大體上一致之共同經濟生活，而血統、語言、宗教習俗等，乃因以互相影響而形成新的團體組織。顧史記除言明「自牂牁以東北皆氏類」而外，未言其他為何種人也。茲就西南夷四大族：僰，氏，羌，獯，以言其自秦漢以來之大體分佈情形，蓋如下述：

一、僰族與羅——自湘黔之交西向延佈，及於雲南東部，並向西略分南北兩系，以建溪種之交。戰國時楚之黔中郡，漢之夜郎國，南北朝以來之烏蠻部(或稱烏蒙)，皆有羅羅之種。凡曰黔、曰夜、曰烏、皆以其膚色言，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所記：「其人多深目長身，黑面白牙，性好潔，如唐書之所言；」而明清以來亦謂之黑夷者是也。其所以稱為僰族者，以自漢至唐，僰姓世為羅羅部族之大首領，因以首領之姓，代表羅族，而其部屬支分，亦多從僰姓也。說詳第二章。

二、氏族——曰巴氏，曰白氏，曰爨。其家族大姓為楊姓，故又稱楊或蒲。主要分佈地為漢中鄂西四川；向南延展，及於雲南。其族為秦漢以前漢化最早而數量最大之族，知書識、從漢姓。漢時巴蜀人民，半出氏種；其時西南夷中以漢為姓之族，又自晉自唐時滇池區域之西爨白蠻，其主要成份，亦為氏人。今洱海區域之明家，即漢族中之漢氏混合種，其一部份，則晉時自隴西遷來之白氏也。當另為專文詳述其源流。

三、羌族——在氏族之西，與氏族居於鴉魯江流域，自四川西部，延展於雲南西北部。漢時於笮都(今四川漢源縣)置南都尉，一居旄牛，治徼外羌；旄牛，即蜀西之羌也。武侯平南中，移旄牛勁卒萬餘家於蜀(見華陽國志)，此又滇蜀界上之羌也。

四、獯夷——其族在安南暹羅緬甸濱海之地，後逐漸向北滋蔓，及於雲南南部。東漢時，一部入居永昌之西南一帶，其酋長為氏蠻之混合種(漢族)哀牢王。至唐宋之間，又一部北移，延及元江流域之南方一帶，與僰氏諸種雜居。永昌者，漢武帝既平昆明夷，(在洱海一帶，非滇池之昆明)，渡瀾滄江以通之，從南越相呂嘉之族(呂不韋之後)實其地，置益州郡；其地為「僰昆明」之屬，僰氏兩族雜居之。其後至東漢光武時，哀牢王率其部屬內附，明帝永平二年(西元五九年)設為永昌郡；哀牢王所屬有僰夷之族，華陽國志稱其人脛臂刻文，自生民以來，未嘗通中國。至於元江流域一帶，景東、鎮沅、元江以南之地，南詔為僰生節度地，唐季(西元九世紀時)有金齒白蠻(一稱金齒夷)漸來據之，其人自宋以前，未嘗通中國。(引見方輿紀要)是僰夷一族，自印度支那半島，北入雲南南部也。漢以前對於印度支那半島之族，東南連閩越一帶，均稱百越；故亦稱永昌徼外之僰夷曰閩越，以別於閩越，亦以別於氏族之濮也。(僰夷族與南詔國與大理國之統治及文化之啓發，亦當另為專文一述之。)此外，有必須注意之一問題，則「氏獯族與僰夷族名稱之分辨」是也。——氏獯為大陸民族，其中大部份為古代漢族中之氏漢混合

種；擺夷爲海濱民族，與閩越交趾之民，同屬百越一系。然一般研究雲南民族者，往往囿於過去記載對兩族名稱之混淆，而不能明白其原因，沿其誤而轉以誤人焉。考擺夷與濮之稱號，其見諸歷史者，在秦漢以前以至晉唐時代，均以指氏族及氏蠻混合種；（說見第二章）自宋以後，元明人之記載，乃以並稱擺夷。他如原爲氏族稱號之白衣，白蠻，白夷等，亦均同時以混稱氏族（明家人）及擺夷，淆而莫辨。茲特舉要分別略言之——

（1）「擺」者，秦漢間之蠻國，號僅，西南夷之「西蠻之長」，皆卽氏族。宋時，氏族蜀家人段氏，建大理國；段氏爲蠻人，號稱蠻王，大理國亦稱蠻國，字又作白王及白國。而擺夷服屬於大理國，頗受大理風俗文化之漸染，固其爲蠻國人民，故竟呼之爲蠻人；且蠻之與擺，聲音相近，混爲一稱，亦勢之自然。故擺夷之稱爲蠻，自宋時變入家建大理國時代始也。

（2）「白衣」者，以稱氏人之服飾。氏有青氏，有白氏，就其服色以爲稱號，見通典。南詔豐佑時，明家大將段會遷率兵陷交趾，其軍號稱「白衣沒命軍」。至擺夷及緬越之族，其以文飾爲稱號者，曰：金齒，漆齒，齒齒，黑齒，赤口，繡面，雕題，花角，花脚，及僂耳，墜鼻等。文身齒齒等俗，爲海濱人民生活所形成之標識；其人無有以白衣之習俗見稱者。又擺夷亦見稱爲白蠻，白夷，亦卽由其見稱爲蠻而來；間有於白蠻，白夷之上，加金齒以別之者，如「金齒蠻夷」，「金齒白蠻」是。

（3）「濮」者，多屬氏蠻之混種，而擺夷之族，晉唐時亦有文濮，尾濮，閩越濮……諸稱，因其與濮族雜居，並曾受濮族酋長之統治，（如濮王，哀牢王）故亦以濮名統之。文濮者，卽文身，繡面，花脚之類；閩越濮者，明其爲百越族之一系。而尾濮者，則又衍爲妄誕之傳說，謂其人生尾，欲坐，必先掘穴納尾，不則尾折而死，故又稱折尾濮云；（見通典）按華陽國志言哀牢夷之俗，衣後著十尾，（南中志永昌郡下）後漢書亦言衣着尾，（西南夷列傳哀牢傳）濮人

生尾之附會，當出於此。所謂衣後着尾者，蓋裙之多數縱幅，僅縫合其上緣，其下任其飄散如流蘇，如南洋土人之著草裙者，乃熱帶人之服式，與常囑橫櫛而赤口齒齒之俗，固有關係也。

第三節 晉時各族之流徙雜居

秦漢之際，各族大多隨畜移徙，且由於山嶺重沓，部落組織甚小，輕於流動。史記西南夷傳，言滇池以西，其人民「無常處，無君長」；又言「西南夷君長以百數」。以是變遷流徙甚大，各族交互相間，錯雜百出。如新唐書南蠻傳載：「戎州有昆明蠻，亦曰昆明蠻，以西洱河爲境；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戶二萬內附，其人辯首左衽，俗與突厥同，逐水草畜牧。」唐之戎州，爲今四川宜賓縣接滇黔交界一帶，距洱海甚遠，其曰昆明蠻以西洱河爲境者，指其族之舊時根據地而言，是羅羅族在隋唐之際自洱河東徙之例也。他族之仍保持遊牧生活，或營粗放之農耕者，當可類推。

增加各族雜居程度之原因，除其種落自由的遷徙外，以戰爭之關係爲最大。茲分南中之戰爭及中原之戰爭兩種影響言之：

一 由於南中戰爭之影響

蜀漢後主建興三年（西元二三五年）諸葛武侯平南中，移青羌萬餘家於蜀，（見前引）又以南中賈賈青羌，北伐中原，（見後出師表）此則指出境者而言。而南中平後，建寧太守李恢，遷永昌濮民數千於雲南郡建寧郡界，以實二郡。（見華陽國志）唐時，玄宗天寶中，南詔閣羅鳳，以兵脅西蠻白蠻，徙其部屬於永昌、景東等地；於是東蠻烏蠻，又徙居西蠻故地。德宗貞元十年（西元七九四年）異牟尋破西戎（卽吐蕃），遷施蠻、順蠻、磨些諸種於拓東。（施蠻卽氏族蜀家人，又另文述之；施順磨些諸種，時分佈今鹽源、永寧、永勝一帶。拓東，今昆明。）貞元十一年，異牟尋開北方賧（今永勝地），徙洱河，白蠻，羅落，磨些，冬門，尋丁，峨昌七種蠻以實其地。文宗太和六年（西元八三二年）豐佑掠驩國民（緬人）三千徙拓東。南詔建國，以兵定四鄰諸族，分徙各族之衆甚多，詳樊綽蠻書及新唐書

南蠻傳中。

二 由於中原戰爭之影響

晉時五胡之亂，引起北方人民向長江流域之大流徙，而東晉時據長江上流之武昌，形成重鎮，其勢駭駭驚駭而上，於是由於北方人民在湖南北之大量拓殖，遂推壓湘黔西部之土著諸族，益向西方流徙。其一，為湘黔蜀之交，僚人（即苗族）之大量湧入四川境內：蜀中本無僚人，東晉李勢時，（李勢，蜀國王李雄之子，）諸僚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犍為、梓潼，佈在山谷，十萬餘落，自漢中達於邛笮川谷之間，所在皆有是也。（華陽國志及後漢書南蠻傳均載之）其二，為南蠻向滇西南之遷移：蠻書載：「永昌郡，晉末羣蠻竄居其間，遂與中國絕，南詔吳牟尋破羣蠻，虜其人以實內地」，是也。而苗人之雜居雲南各地，亦當與入川之羣同時。華陽國志及新唐書南蠻傳，亦每言及晉時南中羣夷作亂，蓋晉於劉石亂後，對南中已失其統御之力，羣族互相侵吞角逐，自必一時風起雲湧，有如中原矣。由於中原人民歷史上之大流徙，而影響西南各族之大波動，加以境內各族自動的或被動的移轉交流，遂形成雲南各族之紛紜錯雜，互見疊出之現象。而此介在川鄂盆地及印度支那半島間之雲貴高原，為古代森林擁塞之區者，至是人類復較前驟增，蔓延滋繁，佈滿川谷矣。

自唐以來，境內農業已普遍發展，內部各族，漸趨安定。如唐初置姚州都督府，南蠻郎將王善寶，昆明刺史曇福乾，（兩人俱南中土著）奏言：「所有課稅，自由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川。」（見通典）又唐左領軍將軍趙孝祖討勃弄，（今姚安至祥雲等地）上言：「其地人衆殷富，多於蜀川。」是皆當時農業已相當發達之證也。內部各地既成為農耕生活，交流現象，遂以減少，南詔大理均建立統一之國家形式，即植基於此；而政治組織之統整，益促進內部人民之定居程度焉。今四境邊緣，羅羅族則大部居北面金沙江兩岸，羌族則分佈西北西康境內，擺夷則散居元江及瀾滄江下游；而內部則除洱海區域一帶

之明家人，較為整然的分佈外，皆各族錯落雜居，此種大概局勢，即沿唐宋以來之遺跡，無大變動也。

第二章 蠻（羅）與氏（獈）兩主要大族之融合與發展

第一節 古代蠻、氏兩族之融合及其分系

一 秦漢前蠻、氏兩族之融合

（1）蠻氏之雜居——（一）氏族為我國古代西方最大之族，數量甚多，而種落極為散漫零星，主要分佈於秦隴川鄂之交。在渭水漢水流域者，居周秦國境內，接受漢族文化最早。而遠自成湯之時，已言「氏羌來享」；周時則為巴子國，與楚相鄰。周秦漢之開國，均資其兵力，從征有功者，復其租賦，號稱蠻民。其與漢族融化之程度，即此可見。大漢族之組織部份中，氏人實佔有重要成份也。（二）蠻族為古代湘湖間之西南方大族，奉上古五帝之一之顓頊高陽氏，為氏族首領，進而為其種族之始祖。其分佈地在氏族之東南，春秋戰國時，其在洞庭以西長江南岸者，已與漢同化，楚國人民之組織成份也。（三）蠻氏兩族之關係頗切，其雜居之處，北則江漢之會，南則湘沅之西，早有混合，戰國時楚既強大，同屬於楚，生活文化益趨進步融合。（由老莊之哲學及屈原之文學，可見楚國人民對中國文化功績之大。）而黔蜀西南一帶，氏則向南延佈，蠻則向西延佈，兩族復交結於金沙江之南，西迄伊落瓦底江，南迄元江下游，而散佈於雲貴之高原，為漢初西南夷之重要兩大族，即司馬相如通西南夷所稱之「南夷之君，西夷之長」者是也。其混合之情形，史記西南夷傳「蠻昆明」一詞，恰足以表現之（其說當另文述之）。

（2）尙書「唐虞羌蠻獈微盧彭濮」大別而為四族——尙書牧誓稱：「庸蜀，羌蠻，微盧，彭濮，」隨武王會師伐紂，已表現諸族在秦隴川鄂之交者，與黃河流域之華夏族——最早之漢族，已有頻繁之接觸矣。庸蜀諸種，應大別而為四族：以庸統蜀，以羌統蠻；言蜀人爲

庸，黎人爲羌也。以微狀漢，以彭狀漢：言小數之漢，大數之漢也。

(一) 庸與漢，均屬氏種；庸則以稱居漢水渭水及嘉陵江之間者，漢則以稱居江湖間楚與蜀之交者。巴氏在漢中者，爲周國之人民，同爲農業民族；蓋殷商時代，周爲西伯，得專征伐，而有所征伐，庸人均與有力，專徵其兵役而免其貨物租賦，故稱爲「庸」；庸者，力役之征也。通典謂：巴人有功免賦，每戶歲出寶錢四十，「巴人呼賦爲寶，謂之寶更」，「予意「寶」者，實即「庸」也。巴人免賦而口出「寶錢」四十，蓋有如漢代之「更賦」——人民之須成邊而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謂之更賦。——寶錢征集之後，以給出征有功之部落首領，今川漢之人，猶稱以財物互助相委者爲「約寶」，猶有古義也。庸之語源，當即出於巴漢間之氏人，寶與庸即一音之轉也。而其後以巴氏每與從征之役，已成習見習聞，民之應成邊或出征者，亦每雇以代行，故又轉而爲雇傭之意。巴氏之部族，又有漢，斯諸號，亦同樣轉而爲漢，爲庸；僕者御馬，庸者養馬，皆軍營中之事，氏人從軍，擅長調馬，即以其人名其事也。(寶庸僕庸諸詞，吾人可推定爲出於周秦時代氏族之語彙，我國之漢語漢文，原爲各族語彙之融合，觀揚雄方言可知。)而字之意義，流變甚大，或謂漢爲古代爲奴僕之族，似因因爲果，從流失源，如東晉時，謝家子弟尤彥秀者，稱封胡羯末，(見晉書謝萬傳)即因胡羯在當時爲勢凌晉室之種，固非彥秀子弟標族之族也。又古稱西方之族曰戎，字從戈，表示其人尙武。東曰夷，西曰戎；夷有東夷之一族，分佈今江蘇以北，沿海濱至朝鮮半島，則戎亦應指一族，而西方之族，以氏羌爲大，戎當即指氏族而言，戎與庸亦即一音之轉也。(夷戎諸稱，其後乃以泛指國裔人民。)(二)「漢」之數量最多，故曰「彭漢」，彭之義爲大，亦即百濮之謂也。(三)「盧」即蠻族，其族甚大，而因「微盧」者，其主要分佈地爲湘黔以西一帶，至羅居江漢之間，與周接近者，種落甚少故也。(羌種之黎，已略見前節，且非本文主題，故不多贅。)

二 蠻族之南北兩系：「黑濮」與「羅」

(1) 南系「黑濮」——古代蠻族分佈川鄂之交湘西一帶者，與氏族之「百濮」雜處，相與融合，亦以濮爲號，而分散於黔桂滇諸省之南部，以別於系出巴氏之濮(百濮或白濮)，亦號黑濮或烏濮，新唐書南蠻傳稱南詔爲「烏蠻別種」者是也。(南詔爲蠻與氏同化之濮族，當另文述之。)烏濮又作烏浦，亦稱烏潯。漢靈帝時，鬱林太守谷永，招降烏浦人十餘萬，開七縣(後漢書南蠻傳)；又廣西橫縣東烏潯山，古烏潯蠻所居，亦曰烏蠻山是也。另於下文氏蠻混合種之「濮」下述之。

(2) 北系「羅」——蠻之北系稱爲「羅」，其部族之主系也。春秋時，其部族有稱羅國者，地當川鄂之交，與荆楚爲鄰，並有同種關係。楚國爲熊姓，周成王封熊繹於楚，熊姓未得國時則姓芊。而羅姓熊，荆姓芊，俱爲與楚同姓之國，古代華夏族之南方一系——顯頤高陽氏之屬也。(見)所謂同姓者，即氏族社會時代，由同一氏族之發展，或若干氏族之聯合，而構成同一種族也。南中之羅族，自漢以來，有與姓世爲酋長大首領，據南朝宋時之蠻龍顏碑(碑額曰：宋故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南州刺史耶都縣侯蠻使君之碑。)稱其先爲顯頤之後，楚相令尹子文之裔，後南北轉徙，自河東(今山西南部)展轉入雲南。而戰國末年，楚將莊蹻入滇建立滇王國，漢武帝時，滇王降，受王印，史記西南夷傳稱其爲楚國之後；又其時滇東之部落，自夜郎以西，靡莫，勞漫之屬，皆與滇王同姓相扶，又滇與西部之昆明，亦相爲依附。是曰濮，曰濮者，均爲楚之同姓，當即荆之一系，爲荆字之音轉。又漢國南方之部族固有句町，其西方有姑繒，町與繒，亦與荆爲同音之字，亦當同族也。(句町諸部落國俱見漢書西南夷傳)而「羅」爲蠻族最早在江漢之交建立之部落國，又爲其族通有之稱號，唐宋時，黔中爲羅殿王之部；元明以來，在金沙江南部一帶者，皆稱羅羅。羅羅，古亦稱盧盧，「盧」即羅之別稱，其族所居之大水即稱瀘水，(金沙江爲瀘水，南盤江上游亦稱瀘江。)蜀漢時，越巂太守馬忠率郡夷，郡夷皆嚠視，(見華陽國志蜀志)嚠視，

即前述黑夷深目之特徵；而武侯「自越巂渡瀘」，地當金沙江在會理之一段，江名爲瀘，即以盧族分佈其地而得名也。盧之義訓爲黑，故其族所居之大水，在黔中者又曰烏江曰黔江也。此北系分部之主要地，爲滇黔之北部；而分佈南部者，除稱黑濮外，亦有羅婺，羅黑之稱。羅之分佈江漢之間，與巴氏雜居混合者，亦同其名號曰巴直。（巴與直皆爲氏族之部族首領，戰國時蜀王之弟爲直侯，與巴通好，見華陽國志巴志。南詔及大理時之人名地名，多爲巴或直爲號。）至於部落名稱，則不分東西，不區南北，皆稱爲「蒙」，轉爲「耶」，爲「芒」，爲「明」。蒙、亦楚之大姓也。（大姓、卽部族首領。其部屬亦大都從首領之姓，故一個部落之人民，多同爲一姓，今麗江及明家分佈之區，其跡猶顯然存在。）

（註）楚大夫屈原之謫騷，述其先世曰：「帝高陽之苗裔兮」。史記楚世家曰：「楚之先世，出自帝顓頊高陽。」班固幽通賦，述其先世曰：「系高頊之元胃兮，氏中葉之炳靈。」注：高頊，原高陽氏顓頊；「應劭曰：中葉，謂令尹子文也；「漢書」：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子文初生，棄於夢澤中，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秦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騷體頤神以靈爲班氏之後，其所記世系略爲「少昊顓頊之玄胃，才子祝融之渺胤，子文銘德於春秋，班固繼蹤於李漢，蟬蛻河東，逍遙中原，班彪刪定漢記，班固述修漢記，爰暨漢末，榮邑於蜀，因氏族焉。」其世系之大體，略同於班固之幽通賦。羅羅族之首領大族，自不必皆同爲楚世家一系之發展，然其與楚同屬一種，而爲古代華夏族之南方一大系，則跡象甚顯。顓頊高陽氏，爲殷以前氏族社會時代接近長江之民族首領，其後氏族間互有兼併或聯盟，擴大而爲種族，故皆以顓頊爲其始祖也。

三 氏族之東南、西北兩系：「巴」與「白氏」及巴氏別系：「百濮」

（一）東南系「巴」——氏族之東南系曰「巴」，主要分佈地爲四川東部及湖北西部。周封同姓姬於其地，爲巴子國，「巴」者其最著之部族首領也。巴氏族有巴氏、樊氏、鄢氏、柏氏、鄭氏五大姓，而巴姓爲之長；秦惠王併巴中，復以巴氏長諸部。（見通典）而其族之通稱，則曰「渝」又曰「渠」；渠中分佈地爲嘉陵江流域，嘉陵江亦卽稱渝水，又稱渠江。東南系之巴，西北系之氏，均以嘉陵江爲幹線；巴之根據地巴州（今重慶）宕渠（今四川渠縣），氏之根據地略陽（今陝西略陽縣），武都（今甘肅成縣），俱在渝水之濱。又其族分徙散居之地，有北在渭河之間者，而渭水及河水上游支流，均稱沮水；有東在江漢之間者，而漢水之西，有並流之水曰沮水（自江陵入江）；有西南在洱河流域者，而洱河稱牂牁水，一作渝水。渝、渠、沮、直，一音之轉，卽司馬相如西南夷所言「略斯榆」之斯榆種也。其族在蜀楚之交，沿大江居者又稱「樊」，湖江西上，分散演蜀間金沙江兩岸。樊，當讀爲荆棘之棘，揚雄方言曰：「江湖之間，謂木之刺人者曰棘，」就其人之語彙而稱其族曰「樊」，與稱荆稱楚，同一例也（荆與楚皆爲刺木）。巴氏與羅族接居之族，亦與羅有融合，秦漢之際，巴中七姓：羅、朴、督、鄂、杜、夕、龔，卽有羅姓。（見後漢書南蠻傳）巴氏與羅族混合而稱爲羅，亦猶蠻羅族與巴氏混合者稱巴直也。

（二）西北系「白氏」——氏族之居西北秦隴蜀之閭者，大都通稱「白氏」，「氏」，亦卽渝渠諸音之轉，「白」當卽樊之音轉也。樊之語源「棘」，或釋爲羊矢聚，乃南方耐水之木；或釋爲棗，乃木之有刺者；渠則盛產秦隴之間，禮記王制：「西方曰棗，東方曰寄，」是則不專在西南者稱樊矣。而秦漢以前，古有大月氏居敦煌間，與氏爲同種，漢初迫於匈奴，西徙罽賓；（今阿富汗）其在敦煌時，與白種之烏孫族接壤雜居，與烏孫種互有血統交融之成份；烏孫種之中雜有黃人之血，月氏種之中亦雜有白人之血也；史記正義引萬震南州記：大月氏「人民亦白色」是也。其族西徙時，留居者稱小月氏，與

氏羌雜處，今甘肅青海間，則「白」之稱號，或亦兼以膚色而言歟？嘉陵江上源有三，皆有白水之稱，宋書曰：「白水自西傾山至陰平界，氏居水上者為白水氏。」西南夷傳之「冉駹以東北，白馬最大，」此即武都白馬氏，濱臨源出西傾山（在甘肅臨潭縣）之白水之氏族大部落也。而自隴西以南以至滇西之縱長地帶，均有其族流徙分佈其間焉。魏書氏傳曰：「自汧渭抵於巴蜀，種類實繁，或謂之白氏，或謂之故氏；」其在川滇之西者，亦同樣稱白，如白馬氏之南為白狼國（見後漢書南蠻傳；在今四川雅安縣西至西康巴塘之間，氏羌混合種。）再南金沙江之畔為白國北方賧（今永勝）；洱河之南為白水，為白崖，（今瀾滄化地；元江上游稱白崖江。）白崖，即明家人傳說歷史中，自漢至唐初之「白子國」國都所在地。而大理國主段思平，釋年運志稱其先為「武威郡白人」是也。（年運志，原稱為「白子通玄峯年運志」，為明家人傳說歷史之藝文記載。）

綜上以觀，氏族零星散佈之跡，甚為廣泛，古謂之「百濮」，後漢書南蠻傳言其「移徙交雜，不可得詳別，」信不誣也。

（B）巴氏之別系：「百濮」（蠻之融合於氏）

（A）百濮族之氏蠻混種及其開化：巴氏族之分散沉湮以西者稱「百濮」，蠻與之有互相混合；其系出於蠻者別為「黑濮」，謂之「烏蠻別種」；其系出於氏者別為「白濮」，於此特稱之為「巴氏別系」。左傳：「巢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此「百濮」顯係一專屬之名詞，而非泛指百種蠻夷，以狀其多。疏謂：「建寧郡南有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其說甚當，蓋唯此，而後漢人為其統率之首領也。建寧，以前解之者以為在湖北石首縣，然此則言為郡，自指蜀漢及晉時之建寧郡（治今曲靖）而言。漢時滇池之南（亦即建寧郡之南），元江流域有濮國（後封句町王）王姓毋，其族即左傳「百濮」之類也。「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為氏族部落之特徵，亦為其最早即與漢融化之原因。蓋其族居於江漢大水之濱，氣候甚熱之溢地，特具水濱及熱帶人之氣質，浪漫謳歌，

冒險遠游，其散佈益廣零星，益易於與鄰融合也。百濮自湘黔向西散佈，元江流域以南，至怒江伊洛瓦底江之間皆有之；為漢以前滇黔南部開化較早之族，而西南夷中最先之土著：氏蠻混合部族也。其所以最先開化者，以我國對於南越（今兩廣及安南北部）及交趾之開通與文化輸入，遠較對滇黔為早；濮族與南越有水道之便，海濱之通，常附屬於南越，故中國文化，最初乃自南而入；及至漢武帝自巴蜀南通越道，西通越嶲，於是雲南北部之進步，始突過南方，而有晉南北朝時西蠻之高度漢化及大部族國焉。其開化先後之跡，可於各部族附屬受封及設置郡縣之年代見之。西南夷傳載：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夜郎始倚南越，南越破，乃入朝，置牂牁郡；（武帝元鼎六年——西元前一〇一年）夜郎為南夷最大之國，有牂牁江（今北盤江），通番禺，故與南越關係甚密，文化之進步亦較南中各地為早。其次則滇王受封於武帝元封二年，（西元前一〇九年）同年置益州郡；其南則句町國受封於昭帝始元四年（西元前八三年）。至東漢時，明帝永平二年（西元後五九年）以哀牢王為屬國，置永昌郡；章帝建初元年（西元後六七年）封昆明夷酋承為破虜傍邑侯；（地當今大理蒙化一帶）蜀漢建興三年（西元二三五年）始置雲南郡。（今大姚祥雲大理一帶）——此武帝未開西南夷以前，南中文化，先由越南輸入盤江及元江流域一帶，而南部較北部開化較早之大概跡象也。

（B）濮族（氏蠻混種）在漢代以來之部落國家：濮族建立之部落或國家，在北部者有夜郎，楚國，西蠻，南詔；在南部者有句町，哀牢。（一）夜郎與楚國——夜郎國為蠻之羅，氏之楚錯處之地；其西北之楚國，則為秦以前巴蜀兩國之交氏族之另一部落。東漢光武帝時，公孫述據蜀稱帝，而牂牁郡（地包括夜郎，西南抵句町，）大姓龍傳尹董諸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為漢，遣使從番禺奉貢於光武帝；桓帝時，郡人尹政，從汝南許慎，應奉受學，歸教鄉里，政官至荊州刺史。（見後漢書西南夷傳）夜郎文化進步之早，由此可知。（氏族在漢以前即葬用棺槨，與他族行火葬者不同，華陽國志有「盜

發夜郎王墓」之記載，故夜郎國主亦氏獠族也。(一)西蠻與南詔——晉時之西蠻，唐時之南詔，並拓地稱王，前則以洱海區域為根據地，後則以洱海區域為根據地；其文化已與中原合流，其族亦為氏獠之融合而漢化甚深，蠻書又稱之為「白蠻」。(後另分項述之)(二)句町與哀牢——滇之南部，漢族建立之部落國，則東之句町，西之哀牢是也。句町國(地當今通海至建水一帶)其王原稱濮王，姓母，見華陽國志南中志；句町當為荆之轉音，其族與蠻羅為一系，說已見前，而其王室母姓，當為氏種，(氏人從漢姓甚早，後另述之)唐時其地為巴甸，元初置為阿剌灣府，稱其地多蠻人；又有羅羅族，則大多以普為姓，普即濮也。哀牢國(在永昌，其境包括瀾滄江西至伊洛瓦底江一帶。)其酋長大姓為濮族，明人楊慎，亦以哀牢為濮人；通典載永昌徼外諸濮，有「黑蠻濮」一種，即黑白濮也；樊漢者，濮族之變種人也。新唐書南蠻傳稱南詔蒙氏為「哀牢之後，烏蠻別種」，是南詔王室蒙氏與哀牢王，俱黑濮也。(四)濮族與擺夷之關係——通典所載諸濮，又有文而濮、尾濮、折腰濮，赤口濮等；文身赤口為濱海熱帶民族之特徵，包括揮部擺夷及緬越諸種人而言；諸種並服屬於哀牢王，而其地之土著，要以濮族為最大，故於文身諸種，亦統之以濮名。內陸之族——濮人，與海濱文身之民雜居，生活風習，自亦互相影響；後人或誤以哀牢即為擺夷，因亦以濮或樊稱擺夷，其混淆蓋源於此。擺夷既自海濱北徙內陸，與濮雜居，唐宋時並受南詔國及大理國之文化影響，自亦深染華風及濮族之習俗。惟其族則非蠻非氏，而屬於北越一系；華陽國志南中志，述哀牢所屬諸種有閩越濮，是亦以擺夷為閩越之族也。

第二節 晉唐時代蠻氏兩族在滇池洱海兩區域之發展及演進

東蠻烏蠻與西蠻白蠻兩部之蠻氏關係

(一)滇池區域之白蠻——南北朝李善(六世紀初)，有東蠻烏蠻與東蠻白蠻兩部，分據滇黔之境。烏蠻白蠻之分別，近人之研究者，或以為其性質同於今羅羅人中黑夷與白夷(貴族與賤民)之關係，此

實大誤；烏蠻白蠻，乃梁元帝時，南中豪族蠻獠稱王，其統治下之東西兩部稱號也。東蠻烏蠻，屬於羅羅本系，其所役屬之奴隸階級：白夷，除本族外，並混雜各族分子而大概同化於羅羅。西蠻白蠻，則主要為蠻氏兩種同化於漢之部族，其漢化之深者，融為漢人；其尚有生活舊習之特徵遺存者，稱為白蠻。白蠻之中，民族蓋居重要成份，而實即漢族構成部份之一系，不過遠居邊裔，稱之者沿舊習不改，亦曰蠻耳。白蠻部族之形成，應溯源於晉以前之夷中大姓，諸葛武侯因其勢而為之成立「夷漢部曲」是也。六朝至唐初，白蠻部族所分佈之領域，已包括自其滇中本部西至洱海一帶。自南詔閣羅鳳分徙安寧至曲靖一帶之白蠻，於是白蠻已失其為獨立部族之「部號」，而僅以稱其種人，且幾於專以稱氏種，白蠻之稱號，蓋即由樊與白氏之稱而來也。至烏蠻一系，屬西蠻者已融入白蠻外，其東蠻遺裔，明清以來，猶有一部相當保守其原有之組織，自晉至元，烏蠻(或烏蒙)之稱號猶存。是白蠻之對烏蠻，乃東西並列之部號，非為烏蠻(羅羅)部族中之黑夷白夷，乃階級統屬之關係；蓋前者乃橫的並列部分，而後者乃縱的組織形式。東西兩部之共主蠻王，為西蠻白蠻部人，尤為顯然矣。清一統志謂：「白蠻一名白羅羅，與黑羅羅同，而為下姓；」是即以黑夷之被統治階級——白夷，誤為西蠻白蠻之裔也。一統志記白蠻之生活狀況曰：「飲食無論雀鼠蟲蠅蠕動之物，攫而燔之，攢食若茹，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為信；死以牛馬革裹而焚之。」其生活文化之落後，與西蠻白蠻誠大為懸絕矣。

(二)洱海區域之明家人(白蠻)——民族之在今西康之西昌，會理，鹽邊一帶，南延至雲南之大姚、姚安、祥雲，西至洱河流域以西者，在隋唐之際亦為西蠻白蠻部，其遺裔，即今之明家人也；其見於蠻書者，即專以白蠻稱之。漢時稱金沙江兩岸之氏種曰夷，在南者曰濮；其以洱海區域為中心，為今明家人之先民者，稱其部落為蠻，為夷，或為斯，或為榆。(已見前節)之三，另參專文述之。)蜀漢時，有斯兒部。唐時為柁州西南昆、徼外之松外諸蠻，及弄棟，勃

弄，白水，河東，洱河諸部。南詔立國，爲國都區域本部人民，其大姓爲將相。宋時爲大理國王室所自出之部民，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亦稱之曰漢蠻，南詔野史稱之爲白民，及阿白，白兒子，民家等名。其分部區域，自漢以來，多集中大渡河，金沙江，洱河與瀾滄江之間，即西南夷傳：「西自桐師，北至檳榔，曰僇昆明」是也。其同族之在滇池區域者，則屬上述之西蠻白蠻本部。關於明家人爲漢族構成部份之氏漢混合種，另爲專文述之。

二 烏蠻之變與白蠻之氏其變遷與發展

(1) 烏蠻大姓爲蠻，故蠻亦成爲烏蠻之種稱，即明清以來之黑夷。蠻姓世爲南中酋長，歷史甚早，其姓已見於漢代。南朝梁元帝時，蠻瓊既稱王於建寧，(今昆明)始兼統東西兩部。東蠻區域與西蠻區域之分割，據蠻書：「自曲靖二州西南，昆川，曲輒，晉寧，喻獻，安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蠻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蠻烏蠻。」(龍和城在安寧之西；步頭爲元江船行登陸處，據蠻書所記里程，約當今河口。)茲略自曲靖起，向東南斜進以至通海，畫一向南凸出之曲綫，綫之東南即東蠻，綫之西北即西蠻也。東蠻區域，自曲靖之東接連貴州境。(曲靖屬於西蠻)漢爲牂牁郡地，蜀漢爲興古郡地，晉爲建寧郡地。西蠻部之共王蠻王，其王室自述先世爲河東安邑人(見通典)。而烏蠻一系，分散頗廣，不僅限於東蠻部份也。例如：唐太宗貞觀初，以蠻歸王(蠻瓊之孫)爲南寧州都督，居石城(在今曲靖北)，襲破東蠻首領蓋聘。又石晉高祖天福二年(西元九三七年)，南詔爲楊干貞所篡，段思平借兵東方諸蠻，起兵石城；段氏建大理國，石城爲烏蠻莫彌部所據，元初置莫彌部萬戶。又師宗，邱北，彌勒三縣，唐時東蠻烏蠻彌鹿等部居其地。(以上引見方輿紀要)——是自唐至宋元，曲靖之東及東南與貴州接壤之地，猶有晉南北朝時東蠻之遺部也。而元之際，東川，鎮雄，烏撒，烏蒙諸部，即今滇東北與黔西北，有唐時烏蠻之裔散居之；(見方輿紀要)又邛部(今西昌)烏蠻有六姓，其中勿郎，豐琶，南

林三部，謂之東蠻；唐貞元(德宗)時，章牟屢結東蠻攻吐蕃，其部屬散處黎、懿、戎數州之鄙，宋時常倚爲屏蔽，以隔雲南(引通考)。——是今自西昌以西一帶，沿金沙江東下，以抵滇川黔之交，猶是唐宗以來烏蠻之裔也。方輿紀要載：「萬歷十五年，邛部土酋嶺氏微弱，部族黑骨普雄等酋爲亂，」黑骨之稱，蓋始見於元明，烏蠻之羅羅族，包括其階級組織之兩種成份：(一)黑夷，即亦稱黑骨頭，亦稱黑羅羅；(二)白夷，即亦稱白骨頭，亦稱白羅羅。黑夷，白夷，階級對待，而以貴族階級統部名，無白夷之奴隸，即失其黑夷之所以爲貴族。故以晉唐時兩蠻之烏蠻，白蠻，以當黑羅羅，白羅羅者，實屬非是。

(2) 白蠻包涵蠻氏兩族。而其普遍從漢姓者，以氏族爲主，漢晉之際爲「夷漢部曲」。——西蠻白蠻部，在漢爲益州郡治附近各縣，蜀漢爲建寧郡，晉爲晉寧郡，唐爲南寧州。戰國時爲莊蹻之滇國，開化最早。華陽國志南中志謂：「漢徙死罪及奸豪實之，俗奢豪難御。」後漢書西南夷傳謂：「滇池平地肥饒數千里，有鹽池漁田金銀畜產之富，民俗豪汰。」蓋中土人士，千里趨赴；而夷中大姓，多居其地；朝廷官守，多因其人。後漢章帝時，蜀郡王阜爲益州太守，與文學，遷其俗。蜀漢建興三年，武侯平南中，以南中大姓建伶(今昆明)人蠻習，孟獲爲其長，習官至領軍，獲官至御史中丞，其人皆漢化程度甚高；而蜀之名將李恢，亦建伶人，爲益州郡太守，助武侯平南功最大者也。晉時置南夷校尉，舉秀才廉良，(見華陽國志大同志)如建寧董敏，同樂(今陸涼)蠻寶子(皆晉時人)，同樂蠻龍顏(南朝宋人)，皆舉秀才者也。

所謂夷中大姓，即土著部族之酋長首領，蓋蠻族，氏族，漢人皆有之；武侯即因其傳統勢力而成立「夷漢部曲」也。華陽國志南中志載：武侯平南中，收其勁卒，而分羸弱配大姓，雍、婁、蠻、孟、量、毛、李爲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又勸令大姓出金帛，聘策惡夷爲家部曲，於是夷人漸服屬於漢，成「夷漢

部曲」。晉置南夷校尉，統五十八部夷族，都監行事；自四姓子弟仕進，必先經都監。又載：「南中與夷爲姓曰追耶，……與夷至厚者曰百世追耶，恩若骨肉，爲其通逃數，故南人輕爲禍變。」（與夷爲姓，蓋通婚或打乾親家之類。）此即土著人民與漢同化融合之過程也。曰白蠻者，亦即言其文化程度之進步；且氏蠻之族及血統融合之種，膚色亦較烏蠻爲白也。（今元江鎮沅等地之明家族白兒子，膚色尤較白。）「夷漢部曲」之大姓曰蠻曰孟曰雍者，其部曲，近人多言其爲蠻羅族，當屬可信；而毛李等及其他漢姓，則主要爲氏種或間有漢人，通典載：「氏人其俗語不與中國及羌胡同；能織布，善田種；各自有姓，如中國之姓，婚姻備六禮，知書疏，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白蠻之蠻氏諸大姓，皆同樣漢化程度甚高，如陸漢先主章武三年（西元二二三年）益州渠帥雍闓叛，觀其與永昌呂凱答書，頗有典則；（雍呂往復之書，見三國志呂凱傳，茲不具引。）晉惠帝太安元年（西元三〇二年）南中大姓毛詵，李叡，李猛等逐建寧太守杜俊，猛等遣書晉南夷校尉李毅，援引武侯北征盛業，尤彬彬有詞藻；（書見華陽國志南中志，茲不具引。）諸文書或即出於漢人之爲幕吏者，然正足以見其漢化之深也。

據蠻書：南詔蒙氏徙白蠻二十餘萬戶於永昌，使蠻酋鎮牟州，又徙白蠻居江川，徙白蠻於騰衝。又據方輿紀要：武定府和曲州，焚燒諸種蠻所居，蒙氏時，白蠻據此，段氏改屬烏蠻；又景東，鎮沅，元江，蒙氏徙西蠻白蠻蘇張周段等十姓戍之，唐末金齒白蠻據其地；又會川西南五十里，開羅鳳徙白蠻守此，大理時，羅羅據其地；又北勝州，異牟尋開爲北方賧，徙白蠻等七種蠻實其地。以上諸所謂白蠻，（金齒白蠻除外）皆爲漢晉之際南中「夷漢部曲」之後，有蠻族，有氏族，而其從漢姓之大族，保其語言舊習而不廢者，則大都氏族也。西蠻白蠻既被南詔分徙各地，烏蠻遂入居滇中。而迤西洱海金沙江之間，其自稱「白子」者，部族甚多，居地甚廣，介在羅羅，羌人，擺夷之間，而仍保其舊有之風習與語言，其大部份，皆即原在洱海區域

之氏族遺裔（明家人），而一部份，則晉時自隴西遷來者也。（華陽國志稱巴氏其人質直，徙他所而風俗不變。）

（3）「黑」與「白」所表示之族性及白蠻中蠻與氏之異點——（A）氏有巴氏白氏，漢有白濮黑濮，兩蠻有烏蠻白蠻，羅羅部族有黑夷白夷。黑白之號，除白氏之於巴氏，兩蠻白蠻之於烏蠻，蓋同時有膚色之分別外；一般皆以表示部族之性質：其（一），表示種族特性之深淺；其（二），表示部族階級之組織。前者適用於各族，後者惟指羅羅族中黑夷白夷之階級而言。黑與白所表示之區別如下——黑爲深色，白爲淺色：凡一族之核心部份，對於種族原有特質之保持，相當頑固與長久，而其外圍與鄰族交接之部份，則因兩族以上相互影響，漸吸收鄰族之生活習慣及血液，而固有之特質漸形淡薄；於是核心部份稱之爲「黑」，外國部份稱之爲「白」焉。而與漢人接觸之族，因接受漢人文化，其稱曰「白」，同時含有文明之意；有時則以「熟」或「漢」以代「白」：如果粟粟亦稱生粟粟，白粟粟亦稱熟粟粟，言與漢熟習也；擺夷有漢擺夷，與水擺夷對稱，言與漢同化也。至各族之核心組織，因其較爲保守，殘存固有之階級形態及經濟特質，故其統治者常表現爲貴族世系；其外圍部份，日向離心方面散佈，脫離原有之階級關係及經濟形態，與一般編戶平民無二，故更無貴族與賤族之區別焉。羅族中之黑夷白夷，即階級組織之殘存者也；清初滇中各地通稱之白羅羅，即脫離原有之階級關係及經濟形態，而進於編戶平民者也。漢纂載：「白羅羅，在雲南，澂江，永昌者，同於編民；在蒙自定邊者，尙保守；其在曲靖者，爲賤種；在江川，大理，姚安者，皆稱撒馬都；」故凡稱白羅羅者，不盡爲賤族也。羅族中之白夷，即在黑夷部族領域中，受直接之役屬，階級之組織形式，固如此也。其在雲南，澂江，永昌之白羅羅，江川，大理，姚安之撒馬都，即西蠻白蠻部族之系屬蠻族者也。

（B）白蠻中蠻、氏兩族之約略區分，茲略舉其大要爲（一），氏族從漢姓最早，戰國時，巴中已有巴、譚、柏、和、鄭五姓，秦昭襄王

時，有廖姓射白虎爲業，其免除租賦之寶叟，則有杜襲諸姓；是其以漢姓爲姓，已始於周時矣。漢時，夜郎大姓爲龍傳尹童，漢王姓母，永昌大姓爲陳趙謝楊。唐時見於蠻書之白蠻，悉用漢姓。諸漢姓中，漢與蠻當並有之，然十九皆氏種也。（蠻書對於漢人與白蠻，俱有分別。）蠻族之在西南部者，與漢族中隔氏種，從漢姓較遲；南北朝至唐，蠻姓最多，南詔以後無聞，已另改他姓；其在漢王國之地，建水蒙自一帶，即以族爲號，大都姓普，明初始改漢姓也。（二），兩族各

論

意

境

意境是一個不受時代的和地域限制的藝術因素，對於文學的每個部門都能適用。它是一個非常抽象幾乎「可以意會不可言傳」的名詞，人稱王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很可以從這兩句話裏悟出意境的道理。

意境是作品的靈魂，是作者天才的最大表現。它的由來多半發自偶然的靈感（inspiration），腦海中的海市蜃樓，稍縱即逝，在寫作的時候如果能夠抓住這個內發的火花，沈悶的局面立刻呈現出美麗的花園。

然而意境不一定實有其地，不一定實有其人，如紅樓夢的大觀園，如瀟湘館中的林黛玉，如希爾敦的西廂桃源（Shangri-La），如迭根斯的小耐兒（Little Nell），全是作者幻化出來的人與物。這例子在詞曲中尤爲多見，如柳耆卿的雨霖鈴：「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秦少遊的滿庭芳：「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歐陽修的生查子：「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張子野的青門引：「那堪更被明月，隔牆送過鞦韆影」；晏同叔的浣溪沙：「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朱淑真的眼兒嬌：「何處喚春愁？」

有語言，氏人之語，最古即與漢語接近，而兩族既同化於漢，蠻則廢其固有語言；氏則較爲保守，其自隴西遷來之一系，語言成份，乃古化中原漢語與土著語之結合也。

本文所述及之史記西南傳「蠻昆明」之種族，及明家人之與獫狁寶叟，其一部自隴西之南遷，獫狁與獫文之性質，白國（獫國）之傳說歷史，又南詔與明家之融合諸問題，當俟專文研究明家來源之文內一并說明之。

許君遠

綠楊影裏，海棠亭畔，紅杏梢頭；李清照的醉花陰：「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這些似乎是以言之有物，又似乎言之無物，耐人咀嚼尋味，使讀者想到塞外秋風，憶起江南春雨，簡單的詞句，卻蘊含着豐美的思致，這便是意境的妙用。

畫人難，畫鬼易，幻化出來的意境往往比寫實更爲引人入勝。不過我並不是說寫實作品不會有好的意境，王摩詰的「山中與裴秀才書」，蘇東坡的「赤壁賦」，杜工部的「登岳陽樓」，白香山的「長恨歌」，溫庭筠的「過陳琳墓」，薩都刺的「金陵懷古」（滿江紅），吳梅村的「鴛湖曲」，黃仲則的「都門秋思」，全非空中樓閣，而是實在情形的超實際化。在香港的太平天國文獻展覽會中見到一個常熟發掘的石碑，上面鐫滿對太平軍歌功頌德的文字，其中有「春樹萬家，喧起魚鹽之市；夜燈幾點，搖來蝦菜之船」之句，詩意充盈，二十個字寫盡了江南風物，同「雞花生樹，羣鴛亂飛」一樣能夠深深動人遐思。

紅樓夢之妙處大半靠著新奇的意境，其中黛玉葬花，椿齡畫薔，全是神來之筆，癡情愁態，呼之欲出。牡丹亭的遊園驚夢，西廂記的琴挑拷紅，妙緒泉湧，情詞並茂。聊齋誌異有好多篇意境新穎的文

字，「連環」清幽有鬼氣，「香玉」芬芳有山野氣。「陶庵夢憶」和「浮生六記」都是善於運用意境的代表作，其中包含着不少的秀麗的畫圖。

西洋偉大作品的例證尤多，先從戲劇說起，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烟雲繚繞，宛然神仙境界。葛雷高利夫人 (Lady Gregory) 的「月亮上升」，夜景清深，令人心曠神怡。他如王爾德的「莎樂美」，辛格 (John M. Synge) 的「海上騎士」，梅特林克的「青鳥」，伯利 (Sir James M. Barrie) 的「彼得潘」，歐奈爾的「天外」，把握意境，恰到好處。除了「仲夏夜之夢」，我們還不應該忘記「罷密歐與朱麗葉」，樓頭密約，兩情繚繞，她的恩義深，她的愛情海樣遼闊。天鵝報曉，還希望夜鶯晚啼，東方發白，怪它不是殘月微茫。把這一幕的對白同西廂記的長亭送別作個參照，「恨相見得遲，怨歸去得疾；柳絲長，玉繩難繫。恨不倩疏林掛住斜暉！」正是意境全同，思路也並無二致。

關於西洋小說，我願意佔去較多的篇幅。邀根斯的「古玩商店」，小耐兒抓住了千萬讀者的心，所以在他同祖父避難他鄉，教堂臥病，多少人給作者寫信，要求莫使小天使的生命夭折；但他寧願讓她魂歸天國，讓聖世涕淚縱橫。我們可以想像作者對於這一幕的安排，費過多大的苦心。「塊肉餘生」的主角大衛，同樣渡着一個悲歡離合的童年，父親死了從學校裏叫回家中，母親改嫁使他投奔姑母，仁慈的女僕柏高佛，聰明剔透的愛彌兒，一本書包含着多少可歌可泣的場面！

喬治·愛麗奧特 (George Eliot) 的「溪上磨房」，也是從小孩生活敘起，鄉村景色，搖曳生姿，全書以湯姆和他的妹妹瑪吉為骨幹，池邊爭糕鬥口，家貧罷學歸來，以及後來耽背孩子的闖入，瑪吉的受騙私逃，處處使讀者神遊異國，低徊往事。她的另一部小說「艾達姆畢德」 (Adam Bede)，價值不稍遜於前者，寫森林中的愛戀，情意殷殷，蕩人心魄；結尾烟雲浩渺，尤覺意味深長。莎洛特·布蘭提 (Charlotte Brontë) 半自傳式的「琴艾爾」，和愛彌爾·布蘭提的

「咆哮山莊」，都應該歸入我這個題目之內，前書的將告結尾的一章，曾博得全世界批評家的稱美，琴艾爾長的非常平凡，但是她也能如白雪公主，辛德里拉 (Cinderella) 或者海倫 (Helen of Troy) 等人在愛情場中獲得勝利。

其實在英國小說家中最能表演意境的還算湯麥斯·哈代，他的十幾部著作沒有一本沒有清新的意境！從最短的「在綠樹陰下」到最長的「還鄉」，都無例外。「還鄉」，「加斯特橋市長」，「苔絲」，「林中居民」，「離羣」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雙藍眼睛」……全以衛塞克斯 (Wessex) 為背景，但是同一地方的景物也是千變萬化，毫不單調雷同。讀哈代作品的人，對於他所描寫的鄉鎮村莊，誰不日夕思慕，心嚮往之？所以在這位一代大家逝世以後，多少人特地跋涉遠道，憑弔經過詩人筆下的「仙鄉」，但是他們所發現的不過是一片荒原，點綴着牛羊三五，看不到苔絲避難的廟宇，看不到加斯特橋的風光。郁達夫批評哈代，推崇備至，他特別指出在「苔絲」裏作者的匠心獨具，他說天氣的陰晴能夠影響到情人的心境！沒有文學修養的人，很難體會到這種意味，一語道着癢處的。

哈德遜的「綠廈」 (The Green Mansions) 是以祕魯的森林為背景，女主角是一個超人的人物，鳥語花香，風光旖旎，新奇的手法，使着讀者發生出塵之想。本奈特 (Arnold Bennett) 的「老婦譚」，二十世紀初葉文壇怪傑勞蘭斯 (D. H. Lawrence) 的「兒子和情人」，所以能夠成為最大傑作，每一個讀者會能瞭解其真正原因。

美國作家如伊爾文的「李伯大夢」，如哈特 (Bret Harte) 的「密吉爾斯」，如馬克吐因 (Mark Twain) 的兩部頑童小傳，正適合我們的徵引。加茲開爾的山色湖光，密西西比的朝雲落日，意味悠揚，絕非一幅着色圖畫之所能盡。安德森 (Sherwood Anderson) 的一本介乎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中間的「威爾斯伯·歐海歐」 (Winesburg, Ohio)，完全寫鄉村的瑣事，春花秋月，了無塵囂氣息。

「茵夢湖」是一部盡人皆知的名著，它的動人處還不是靠着那章

充滿春意的郊遊，和將告結束時田莊的造訪？烟波浩渺，令人黯然神傷。法國小說應該列舉的實在不少，我最愛好高第業（Theophile Gautier）的「莫班小姐」，全書充滿着詩情，充滿着春意。

西班牙的政治小說家伊班乃茲（Benito Pérez Galdós）的「血與沙」和「我們的海」，除掉人物的刻畫，便是他能任意境運用到最高點。幾個鬥牛場面，宛如親臨其境，讀者會隨着牛的顛撲奔躍而喘息，隨着主角的成功失敗而悲喜。後一本的女主角佛萊亞正是德國美麗女間諜馬塔哈麗的化身，無數人爲她顛倒，無數人爲她殺身。她雖然鐵石爲心，但不能擺脫情魔的纏繞，終於在客舍中着上男裝投入愛人的懷抱；事後洒然言別，不落痕跡，然而枕上餘芳宛在，一切寧在夢中！

童話的寫作尤其著重意境。兒童們所能瞭解的不是玄之又玄的男女愛情，也不是突兀離奇的穿插。它的最要條件就是意境。「白雪公主」，「快樂王子」和安徒生，格里姆兄弟的許多篇作品，都是好的例子，而「白雪公主」之所以被狄斯耐作爲卡通的藍本，當然還是以意境爲主。兒童文學之創作，寫到星球月球上都不要緊，但是最不能忽略的就是一個虛無飄渺，引人入勝的境界。我覺得中國的文學很有顯著的進步，童話的生產則寥如晨星，葉紹鈞的「稻草人」，算是少數中的一本，不過除了「稻草人」那一篇尚能粗具童話的規模，其餘全是糟粕。中國儘有兒童故事，這些故事很多可以改編成美麗的童話，獨惜從來不會有人在這一方面作過工夫。訓練創造意境，最好的方法便是試寫童話，體裁不一定如安徒生他們那樣謹嚴，像「阿麗斯漫遊奇境」，「彼得潘」，「小婦人」，「湯姆沙伊爾」，「愛的教育」等，都不曾越出兒童文學的範疇。

神話在西洋文學中佔着重要的位置，亞述王的傳說成爲詩人的歌詠對象。荷馬的「伊利亞德」，「奧德賽」，史賓莎的「仙后」，一直到歌德的「浮士德」，多多少少都沾染着超現實的氣氛。這篇怪誕不經，然而隨處都是快人的意境。儘管二十世紀作家給神話和「武士文學」敲了喪鐘，它們的真正價值未可一概抹煞。這一部門的著作

在我們的古籍中很可發現不少的寶藏，不過不曾被人好好利用，許多齊東野語式的傳奇反而藉着舊劇替他們保存，像「嫦娥奔月」，像「織女牛郎」……都是實在的例證。許多作家在「改」「水滸」，「翻」「紅樓夢」，他們倒忘卻這許多現成的美麗的民間故事，說來寧不是同兒童文學的埋沒一樣可惜？

爲了說明意境在文學作品中的價值，不惜徵引了這樣多的實例，其實所列舉的不過滄海一粟，尤其對於最重要的西洋詩歌，隻字未曾提及。對於這一點我倒想替自己辯解；我覺得意境便是詩的普遍化，把「詩」的因素播散到任何一種文學的部門全可以成爲最上乘的意境；而詩人本身更不能須臾離開意境。寫「古舟子詠」的古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在鴉片煙吃足大睡之頃，忽然夢得「忽必烈汗」的零句，醒來執筆，與會淋漓，但不幸被打斷了，一生續不成篇。關於王子安寫「滕王閣序」也有很多的附會，然而「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確是神來之筆，一刹那的靈感，成爲千古的監唱。

不過意境同作者的品格（Personality）有着密切的關聯，沒有廣闊的胸襟，絕不能創造高超的意境，「太史公周覽名山大川，故其文有奇氣」，「孟子也說他善養浩然之氣」：這全是「品格」的培養。沒有意境的作品，原因是不曾在這方面做過工夫。近人徐志摩和周作人的散文，獨具風格，和闡歷修養有着很大的關係。目下出版物儘管汗牛充棟，夠得上標準的十不及一。尤其是風靡一時的話劇，大半毫無技巧，毫無意境，專憑佈景炫人，靠着有經驗的演員支撐場面，我實爲觀衆的時間金錢叫屈。然而曹禺的「雷雨」，郭沫若的「棠棣之花」是值得讚揚的，仔細品味兩劇的優點，還不是以意境取勝？

大自然就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意境的源泉，一棵綠草，一枝紅花，西天的雲霞煥彩，入晚的月落星橫，只要運用得當，都能成爲盡美盡善的意境。意境不一定存在於高尚生活或象牙之塔，對於十字街頭的洋車夫，郁達夫不是寫過一篇美麗突兀的「薄奠」嗎？

中國作家慣好在開始的時候寫一首「西江月」，西洋作家慣好寫一首序詩。文章結束了，我願引三國志演義的西江月來作個「殿後」：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水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以意境論，我應該效法金聖歎批六才子，連呼「妙！妙！妙！」
三十二年四月，陪都。

論中國戲劇批評

田 禽

中國戲劇批評是伴隨着中國劇運的發展而發生的。事實告訴我們，由於劇運的活躍它也逐漸的有了進步，然而，我們也不能否認這進步是很遲緩的。

中國的戲劇批評，無疑地，它還沒有切實的達到百分之百的責任！這就是說，中國新演劇運動，無論在編劇，導演，表演，舞台裝置……各方面之所以有着顯著的進步，或說獲得今日這樣的輝煌的成果，可以說，完全是我們各部門的戲劇工作者（批評家似要應該除外）用他們的血汗一點一滴的，從不斷的實踐當中所獲得的勞績！即是說，一切的進步並不是由於批評家的督促和指導，而是基於若干戲劇工作者勞苦的，辛勤的實踐。

這樣說來，著者好像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何以呢？因為前一段既然承認了中國戲劇批評的進步性，而在第二段里好像又否定了戲劇批評的存在，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其實不然，因為我們在前一段已經明明白白地指出中國戲劇批評逐漸的進步乃是基於整個劇運的進步所促成的，這就是說，它始終是處於被動的地位，而並沒有盡到它應該盡的責任——指導戲劇的動向。

自「五四」時代一直到抗戰的前夕，新演劇運動當中除了一九二九年傳留下來一點批評的遺跡——向培良的「中國戲劇概評」外，還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戲劇批評的論文或書物，雖然中國戲劇批評裏面

的文章或多或少難免有偏頗之處，然而，到底他還不失為一位戲劇批評的先驅。

之後，雖說一般人都承認了戲劇批評的存在，不過，實質上，所謂批評文字，充其量也不過是一些胡捧與亂罵，還有就是一部份新聞記者作為補白的「新聞式」的批評了。

當代名劇作家陳白塵在他的「太平天國」序文裏說：「……至此，不能不令我感到灰心的，是我們的戲劇批評家，一個劇作者要想從戲劇理論家與批評家那裏得點創作上之指導，真比上天還難。他們的工除了鑑定一個劇作者屬敵屬友，而分別給以或壓或捧之外，好像就無所事事。而他所知道的彷彿也僅止是一頂高帽子與一套術語罷了。（倒是一些非批評家隨意說點反使你心服。）像我這樣一個自學式的寫劇人，只好在黑暗中摸索了，摸索得有個錯，（其實，並沒有真正指在錯處。）批評家就會嗤之以鼻或者給你擱頭一棒。於是他得意的很：——「我批評過了！」

「這樣的捧我也受過。但在劇本習作上，並沒有留心，尤其是歷史劇，我依然在摸索着。因為我想：如果沒有批評家，難道創作者就該自殺嗎？」

由於這篇序文，充分的透露出抗戰前戲劇批評的無能與卑鄙，而同時也顯示了一位劇作者是如何的企望着戲劇批評家能在創作上予以

指導！然而，可惜的是他們只做到主觀的「捧」與「罵」，而忽略了以客觀的態度寫出對於戲劇各方面，坦白的，誠懇的，深入的，和富有指導作用的批評文字。這樣的批評家可以說是沒有靈魂的批評家，因為他沒有說出他的內心話，而一味的在鑒定屬敵屬友上下工夫去了。

抗戰軍興以來，由於劇運的極度進步，說實話，戲劇批評也與戰前有了劃時代的進展。像劉念渠的抗戰劇本批評集，和轉形期演劇紀程，無論如何是值得一讀的批評文字，雖說裏面或多或少還有些主觀的色彩，和「委曲求全」的筆調，但，我相信那完全是由於作者有某種苦衷而不便過於忠實的寫出，這，在目前，我們似乎也不應該過分的苛求我們的批評家。總之，目前的批評是言之有物的，深入的，着實際，有助於新演劇運動的批評，這種進步是抗戰以前所沒有的，我們欣喜在戲劇上有了這樣的好現象。

記得是去年吧，重慶劇壇對於所謂「建立權威的戲劇批評」曾經引起了熱烈的討論與論戰，但，結果是以不了了之，這現象如果讓戴着有色眼鏡來看，也許認為這是無聊的舉動，或勞而無功的玩藝兒，然而，事實上卻不是這樣簡單，那次的論戰雖說沒有獲得具體的結果，但，它充分的引起了社會人士對於戲劇批評的重視，而同時也顯示出戲劇工作者對於建立戲劇批評的熱忱與必要，這，對於整個的劇運是有着重大意義的！

說老實話，戰時的新文化運動當中，表現得成績最好的要算戲劇，然而，我們的戲劇工作者並不以此自滿，進而以「恨鐵不成鋼」的精神來加倍努力！雖說在戲劇部門中，以前進步比較遲緩的戲劇批評，目前已有顯著的進步，可是，我們的戲劇工作者仍然沒有對它表示十分的滿意。舉例來說，張駿祥曾在去年戲劇節發表倡感一則：

他這樣寫着——「約翰，邁孫，勃朗有一次挖苦劇評家說：『劇評人好比指路牌，畫給人家指路，自己可從來不往他指的地方去。』」

「其實，就是這樣指路牌的劇評家也是需要的。我們的劇評家根本本不指——怕也指不出——什麼路，他像教會中學裏的老處女教師，專以捉人的過錯為樂。他攻擊的時候多，鼓勵的時候少，消極的抹殺常見，積極的提倡少有。」

這，與戰前陳白塵的序文所描寫批評界的情形大意相同。原因是，雖然目前的批評比較過去進步，說實話，確實還不能令人十分滿意。

記得有人說過，批評底功能是在供給批評家一種自我表現的工具。又說，批評不能只是記述個人的印象，應當着重於規律的構成。這話確是頗撲不破的真理，一位戲劇批評家既然具有表現的工具，就應該不只是記述個個的印象，或鑒定屬敵屬友，必須着重於規律的構成，經過深入的研究以後，再者筆，是就說，不是就說不是，決不應該昧着良心說話。這是批評家應有的最低限度的態度。但，為什麼批評家大都不能盡責呢？

說老實話，並不是他不願意盡責，事實上，是他不敢盡責！我們知道，凡是從事戲劇批評的工作者，大都是生活於戲劇圈裏的同志，如果他認真地去寫，必然得罪了和他天天會面的朋友們，因此，也許可能打碎了他的飯碗！批評家的確是「嗔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的。爲了生活，爲了不被驅出戲劇圈外，有時他不得不強姦自己的意志。其實，他何嘗甘心這樣呢？

作爲一個戲劇批評家，他必須盡可能的做到全能的戲劇家地步；然後他才可以順利的執行他的工作，因為戲劇是綜合的藝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不足以擔負起這一重大任務的。基於此，批評家首先應該在自我修養方面下一番工夫，充實自己，豐富自己，然後才能把握住問題的核心，不致只是應用一套術語或鑒定友敵了。這樣，才可以說服一般被批評者，否則，不圖痛癢的寫些皮毛的，觀後感之類的文章，冒充批評，徒然浪費筆墨，辜負了「批評家」這頂桂冠，對於戲劇，對於自己，可說是兩無意義的！充其量，不過騙筆稿費，作爲買

票的賠償（其實，他還未必花錢買票。）費罷了！

批評家必須充實自己是不錯的，不過，如果想使他真能做到「鐵面無私」的批評家，這問題并不單純，首先整個的戲劇界必須盡力的，認真的培植這種人材，并鞏固他的地位。因為人類都富有自炫本能，只須別人說自己好，不許別人說自己壞；事實上，不肯接受批評家對事不對人的批評，換句話說，他們不讓批評家說真話，談真理，他們只是喊口號，空談「建立戲劇批評」乃當前頭務！但，并不允許他認真的執行任務！因此，批評家為了生活，為了情面，就不得不讓步。所以說，如果大家認真的建立戲劇批評，批評家固然必須先從健全自己做起，而其他各部門的戲劇工作者又何嘗不應該如此？他們必須盡力來扶助他，與他徹底合作，認為他是新演劇當中不可或缺的一員，不要把他認為仇敵，這，對於戲劇批評的前途必有裨益！

我們常聽某甲對某乙說：請老兄批評一下我的演技如何？不要客氣，要說老實話啊！但，當批評家說了真話的時候，不是說人家不懂戲劇，就是罵人家胡說八道，甚至於當時會引起他或她馬上找人家理論，或飽以老拳的念頭。有的演員如此，其他工作者也可能部份的是犯了這種錯誤。在這種環境之下，一個沒有槍桿的批評家怎能冒險的

談真話？怎會建立起健全的戲劇批評來？

不錯，我們需要的是富於建設性的批評，但，所謂建設性的批評并不是只談長處或不指出短處，或說只是「捧」而隱瞞起一切的缺點。假如是這些，批評還有價值嗎？還有作用嗎？

所以，我們不能只要求批評家有修養，而同時更應該注意到（其他各部門的工作者）我們自己的修養是否健全？

老實說，我們不是根本沒有批評，更不是沒有夠格的批評家，問題是我們不肯接受批評？要不要批評家存在於戲劇的園地！

聖經上說：『你只看到你弟兄的眼裏有刺，而沒有注意到自己眼裏有樑木。』

無論批評家寫批評，或其他各部門的戲劇工作者讀批評時，如果肯平心靜氣的拿以上的一段引證多加反省，我想多少是有幫助的！

末了，我引用西洋某批評家的箴言作為結尾：『批評家之成功與失敗，是在他所有的真理底永久，以及他傳遞真理的技術。』

四，一八。渝郊。

關於劇本「安娜·卡列尼娜」

陳北鷗

一八七〇年二月托爾斯泰曾向友人表示想以同情心寫一齣描述不貞妻子的長篇小說。兩年之後，托爾斯泰在火車站的一個小站上看到鄰居的地主的妻子跳到鐵軌上自殺的事情，給托爾斯泰以極深刻的印象。於是決心來寫這部長篇小說「安娜·卡列尼娜」。

在托爾斯泰的遺留的底稿中，「安娜·卡列尼娜」的初期草稿祇有三個人物，那就是安娜，卡列寧和克賓（以後改名為佛朗斯基）。為

了力求盡善盡美，經過四年的勞作，托爾斯泰頭腦中逐漸獲得日益明顯的形象。每個角色的個性漸漸變得結晶化，經過了刪削、修飾、精鍊之後，全部的藝術完美的展在讀者的眼前。

「安娜·卡列尼娜」這部偉大作品搬到舞台上，也和小說的創作過程頗有類似之處。第一次在莫斯科上演的「安娜·卡列尼娜」是N. D. 佛可夫改編的。所改編的劇本中也祇有安娜，卡列寧和佛朗斯基三

個角色登場。當時因為劇本相當長，曾分爲上下兩部，兩天連續演完。

到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在莫斯科藝術座上演的「安娜·卡列尼娜」五幕劇主要是根據托爾斯泰的語言所改編的劇本。以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劇命運爲主幹，用連續對話的方法展開進展中的情節。沃茲尼生斯基擇取了小說中的精華，所有小說中的主要部分幾乎是沒有遺漏地都放到了這劇本裏了。所有省略的部分，從對話中大都都可以推測出來。同時更因為是莫斯科劇院中蘇聯最負聲名的聶米洛維契·丹欽柯導演，經過三百〇六次的排演，這個世界名劇的上演果然轟動了世界。

在蘇聯，「安娜·卡列尼娜」連演了七十七場之後，蘇聯以這個名劇參加了巴黎世界博覽會。在世界博覽會上，又博得了世界稱讚的榮譽。在巴黎博覽會上演這個名劇的時候正是八一三之後中國抗戰蓬勃發展的時候，日本雖然在上海和中國作着激烈的戰爭，東京那時候卻同時還由日本的進步的新協劇團上演這個名劇。蘇聯莫斯科藝術座公演這劇本之後得到了蘇聯政府的勳章。「安娜·卡列尼娜」的演員有得勳章的，有得獎牌的。主要的演員像飾卡列尼娜的N.P.赫美列夫和飾安娜的姐拉索娃都得到了勳章。他們倆都因為演這個名劇而被稱爲蘇聯人民藝術家，一直到現在還都是蘇聯最有名的演員。「安娜·

卡列尼娜」的劇本在莫斯科藝術座這樣公演之後，已經成了蘇聯藝術的紀程碑。

我們都知道托爾斯泰的小說具有偉大的豐富的内容，是心理的，社會的，哲學的藝術結晶。在演劇中會更清楚地表現出來托爾斯泰所描寫的場面，姿態，色彩，以及事件的連鎖。演劇雖然不能照樣地再現出小說中的生活，但是真實人物的創造，戲劇性的糾葛，複雜的軋轢的再現出，可能比其他藝術部門更清楚地有力地借舞台表現出來。

「安娜·卡列尼娜」的導演聶米洛維契·丹欽柯已經是蘇聯最有名的導演。他曾說：「藝術把「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主要人物就像現在一直還活着一樣的描畫出來。這些人物感動了我們的內心，喚起了我們的共鳴。托爾斯泰所創造的諸人物中不曾解決的問題，仍然是我們需要解決提出解決的問題，「安娜·卡列尼娜」的語言中最意味深長的是道德的問題。創造新道德是蘇聯演劇的任務。」

「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問題在中國也同樣地存在着。尤其是在戰時的新中國，應當怎麼地解決這樣的社會問題，是非常重要的。讓讀者 and 觀者在這偉大的世界名劇中去鑒賞托爾斯泰的藝術，去解答托爾斯泰擺在我們前面的問題吧！

三十二年，四月十日。